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赞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间，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发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伟大的、难忘的年代，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开始的。工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劲，为彻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征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大部分还是旧生活回忆，但其中已经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以往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传；而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五八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高涨的表现。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内容来说，是丰富的；就形式来说，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创作。关于它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还不能说是成熟的，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解决。但是作为天津工人阶级在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斗争，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描写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他们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一九五九年六月
序

国营天津棉纺五厂在日侵占时期叫双喜纱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后期，解放初期叫中纺五厂。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三八年抢占了地皮建成这座工厂，残酷地统治与压迫工人。国民党来了，工人的境遇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由外国的剥削者与压迫者换成了本国官僚资本的剥削者与压迫者罢了。但工人们并没有受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工人斗争虽曾遭受各种挫折，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紧密团结了群众，一直斗争到天津解放。解放以后，青年职工陆续返厂，他们对于工厂的历史不了解，一小部分老工人也对过去的斗争历史逐渐有些淡忘。在整风以前，我厂部分职工，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如过高的要求生活福利待遇，或者计较奖金，不顾参加社会活动，政治积极性不高，这部分青年职工当中，更为严重，个别的还违反劳动纪律。这些问题严重的障碍着他（她）们前进，也严
重的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对此，工厂党委会曾进行过多次教育，总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致在整风初期这些思想问题还严重的存在着。

在整风当中，市委指示，要在全体职工当中进行一次为谁劳动的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我们开始了工厂史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老工人回忆过去的艰苦生活与斗争，进一步激励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青年职工了解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无比优越的工作条件是前人的斗争换来的；使青年职工痛恨资本主义，启发阶级觉悟，从而继承工人阶级的艰苦朴素、勇敢斗争的光荣传统，发扬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我们召集老工人举行座谈会，回忆过去，并根据这些材料，加以整理，首先画出三十余幅工厂史连环画，在全厂职工当中举行了展览，并用四天的时间进行讨论。这次工厂史的宣传教育在我厂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看了工厂史连画，全体职工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因而大大的提高了政治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成为推动生产大跃进的重要因素之一。布场工人高树春说：“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个星期也诉不完，解放后生活提高了，就把过去的苦日子忘掉了，不愿劳动，有时还旷工磨假，看了厂史，使我觉醒过来看。”他感动的说：“我今后决心在实际行动中克服缺点，搞好生产来报答党。”青年工人也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认识到新社会的美满幸福是通过前人的艰苦斗争才得来的。因此，检查了比吃、比
穿、比花钱不努力工作，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个人主义思想。看了工厂史画展，织布工张桂珍同志积极要求扩大看台，由原来的八台扩大到十二台，张桂珍同志创造了清洁工作法。

工厂史画展在全体职工中进行了广泛的深刻的阶级教育，启发激励的作用十分巨大。因而，我们感到有详细记录下来的必要，因为它它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史，对于广大工人群众都能起到教育作用。

要描写工人阶级斗争的雄伟历史，仅仅依靠少数业余作者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市委的教导和天津作协的指导下，我们逐步明确，必须依靠广大工民，特别是依靠老工人。

党委宣传部门曾前后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请各种不同的人物参加搜集材料，了解了并制定了各时期群众运动发展的情况，以及各种典型人物的情况，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同时并抽出本厂三十余位业余画家画了三百多幅工厂史连环画，在职工中进行展览。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继续启发群众，更深入地回忆，全面讨论，重点座谈，发动参加过斗争的老工人写文章，又发动业余学校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学员普遍写文章，补充材料。这样做的结果很好，我们从业余学员的作文当中，选出了不少的好作品。在发动工人群众普遍执笔的同时，我们又拜访了当时领导五厂群众进行斗争的几位同志，在他们帮助下，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事件发展的细节和校对了许多重要情节，达到了历史材料应有的真实性。天津作协下放到我
厂的干部，对于组织材料和拟定编写计划、辅导写作，
系统和修改稿件等做了很多工作。

编写工厂史的活动，并没有完全结束。这本厂史中，
解放后的生活描写较少，我们将继续在现有的基础上，
组织群众描写和表现今天的和未来的幸福生活。继续
编写的厂史，要求不仅是一部工人阶级自由幸福的生活斗
争史，也是一部建设社会主义英勇奋斗的历史。

中共天津国棉五厂委员会
内容提要

这是天津棉纺五厂的工厂史，内容大体上分为三部分：第一辑“血泪的回忆”， 是写的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人的惨痛生活；第二辑“党领导下我们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地下党的组织领导工人推翻伪工会的斗争及其他斗争；第三辑“解放以后”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解放以后工人和干部生产和生活的变化。

这部集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大都是这个厂里直接参加过斗争的工人和干部，所以作品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量。
目录

第一辑 血泪的回忆

“日本留学” ........................................... 王安祥 口述（3）
控诉 .................................................. 孙俊红等口述（14）
偷布 .................................................. 田献升等口述（18）
人间地狱大工房 .................................... 柏玉荣（27）
女驼头刘瑞芳 ........................................ 陶桂芳 口述（35）
谈“国舅” ........................................... 张友元等口述（38）
一个女工的回忆 ..................................... 沈志玲 口述（45）
帮张破席 ........................................... 徐敬孝 口述（50）
一块狗肉 ........................................... 柏玉荣（53）
朝不保夕 ........................................... 柏伯苗（56）
张皓子与海培如 ................................... 柏芳湖（59）
搜腰 ................................................ 张金凤（62）
国民党来了，我们倒失业了 ...................... 刘瀚生 口述（64）
大哥的死 ........................................... 陶景海 口述（67）
（附）我们的工厂是怎么建起来的 ................ 白波（70）
第二辑 党领导我们斗争

扎根 ........................................... 张家恒 口述（79）
反搜腰 ........................................... 张家恒 口述（82）
推翻伪工会
一 “走 ‘爹’ 来了‘爷’” .......................... 张家恒 口述（85）
二 工人秘密自治团 .............................. 张家恒等口述（89）
三 捷芳潮事件 ................................. 捷芳潮（97）
四 剃刀底下“选”工会 .......................... 张家恒 口述（100）
五 行动的前夜 ................................. 薛鸣翼等口述（102）
六 第一次全厂罢工 ............................ 徐明和等口述（106）
七 王老五攥孙头 ............................... 王老五 口述（113）
八 敢死队 ................................. 李庆云等口述（120）
九 慰恩 ................................. 张家恒 口述（130）
十 斗智 ................................. 孙世疆等口述（132）
十一 红色工会的诞生 ............................ 徐明和等口述（134）

红色工会成立以后
一 奇帮头子李洪生 ........................... 王老五等口述（139）
二 国民党的花招 ............................. 孙世疆等口述（142）
三 利诱 ................................. 孙世疆等口述（147）
四 绑架 ................................. 孙世疆（150）
五 向李宗仁请愿 .............................. 张家恒等口述（151）
（附） 厂方在李玉祥被捕后给中纺公司的报告 ..........................（158）
六 谋福利 ................................. 张家恒 口述（159）
七  工人料察队 ................................. 李庆云等口述（162）
八  女英雄怒打李万清 ................................. 孙士荣等口述（165）
九  反扑 ........................................... 张家枚等口述（168）
十  夺刺刀 ........................................... 孙士荣等口述（172）

逮捕前后
一  伪二中全会以后 ................................. 张家枚 口述（182）
二  代替孙世瑞到稽查处去 ................................. 徐明和 口述（184）
三  掩护孙世瑞撤退 ................................. 张广秀 口述（186）
四  小庙烧香 ................................. 孙士荣 口述（188）
五  不巧的事 ................................. 张家根 口述（191）
六  工人代表被逮捕 ................................. 齐淑花 口述（193）
七  回忆大逮捕 ................................. 徐明和 口述（195）

【附】 敌人供词 ................................. （200）

九  被捕后 ................................. 王老五 口述（209）
十  反动势力上台 ................................. （210）

【附一】 厂方开处七名工人代表的布告 ................................. （221）

【附二】 厂方下令开除与停职工人移出工房的
        布告 ................................. （225）

【附三】 厂方开除被捕之三名助理员给分公司的
        报告 ................................. （228）

【附四】 厂方在工人被捕后贴出二十七名工人停
        职布告 ................................. （223）

【附五】 张家枢等被捕释放后向社会局控告，中纺
公司接社会局公电后，抄致五厂之公电……（224）

十一、胜利是我们的情………张志瑞等口述（225）

（附）他们也是地下党员……工人李淑珍的回忆口述（230）

野火烧不尽

一、反抗提前开除…………………………金新声（235）

（附）军方在张怀海、陈恩禄拒绝提前开除被捕后，给南区警务处的呈文………………（239）

二、失业工人要求复工………………………陈景焕  口述（240）

三、黑夜里…………………………………王金芳（246）

四、护厂斗争………………………………范仲辉等口述（247）

第三辑   解放以后

工作想来厂……………………………………杨玉堂（258）

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李良清等口述（258）

抢喜张树发……………………………………柳松年（260）

工人翻身………………………………………杨伯Activate（264）

孙玉韩………………………………………王淑敏（267）

“生产上是好汉，出勤上是模范”…………王圣义（271）

大杨…………………………………………蒋湛（276）

一面红旗……………………………………王圣义（279）

陶景海开展革新……………………………陶景海  口述（282）

老师傅的理想……………………………刘振绪、王羲士（285）

机器的主人——张宝顺……………………潘汉群、李锦城（289）

快乐年………………………………………王淑敏（291）
第一輯

血泪的回忆
“日本留学”

王家祥 口述

在饥饿里长大

我从小就生长在静海县独流镇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弟兄四人，一个妹妹，加上父母共有七口人，住有三间土房，一无土地也无房，只是依靠父母开小水铺维持生活。一到冬天喝水人少时，卖钱也就必然要少，因此生活就更困难了，每天只喝两顿糠稀粥。身上穿的是露着肉的破棉袄，下身穿着条夹裤。天冷时，都不敢出门。这样的苦难生活我过了十五年。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我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天津闹大水那一年，种的庄稼全被水淹了，人们生活就更苦啦！我们一家子连两顿稀粥都喝不上了，整天的饿着，爸爸和妈妈看着我们，直掉眼泪。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在这燃眉之急的时候，日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招华工。在挨饿的情况下，爸爸、弟弟和我都卖了华工。日本知道我们这个地方闹大水，人们都饿的，特意廉价收购劳动力，所以每
个华工才给十二塊錢的安家費。日本当时收买了一批狗腿子吸血鬼，他們从中剝扣每个人兩塊錢，說這兩塊錢是 “杂费”。有人不满，質問：“为什么少發給兩塊錢，只發給我們十塊錢？”狗腿子們說：“这是捐錢。”

这一年，爸爸已经五十多岁啦。弟弟十三岁，我才十六岁，三个人都卖了华工，开始了牛馬不如的生活。一开始，爸爸、弟弟和我三个人在青龙桥和宣化一带当苦力。整天开山、修桥，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要是监工来了，见不到好好干活儿，就用木头棍子狠狠地打。晚上住在庙里，和土地爷在一起睡，那土地爷咬着牙，咧着嘴，真叫人害怕。弟弟和我都不敢看。一到天黑，就吓得没了魂。因为没有火，黑咕隆冬，遍地是山，就像瞎子进了迷魂阵似的。还有的时候，连庙都没处住，我们就住在帳棚里，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西北风刮着，盖一个破棉被，就像在冰窖一样，那睡的着觉啊！冻的浑身直打哆嗦，两个腿都冻了起来，不敢伸腿，恨不得钻到火炉里去，暖和一个够，永不受冷的威胁。从那时起，我的两条腿，就落下了寒腿的病，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好。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给我造成的。

这种牛馬不如的奴隶生活，我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要往东北去，我父亲三人都沒有棉袄，东北比西北更冷十分，我妈妈又得了重病，没有人照顾。如果走了，没人卖水，一家子就无法生活。因此我父亲三人都没去，留在家里每天到车店作临时工，有时就给地主扛小工子活儿，富余时间在家照料妈妈和卖水。就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的，每天凑合著喝兩頓稀粥，連幹飯都吃不上。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我媽因病沒錢治，又吃不飽，就活活餓死了。
媽死後，家里的生活就更凄慘了，小弟弟、小妹妹都沒人管。要吃的沒吃的，要穿的沒穿的，投亲沒親，靠友沒友，真是走投无路。正在这万分焦急的秋天，有一天，我們鄰居王宝清，从天津回来，他是天津双喜紗厂的織布工人。我一見就連忙問道： "寶清叔，你們工廠里用人嗎？"  王宝清唉了一声說： "傻家伙，怎么想起到工廠去作工来啦！那工廠簡直像个活‘地獄’。" 我一听像“活地獄”，不由的渾身打了一个寒噤。可还是說： "管吃的就行了啊！" 王宝清低下头来，沉思了一会儿说： "那明天你跟我一块去吧！

轉天，我扛着一个小破棉被，上身穿着小破棉袄，下身穿着一条夹裤，跟着王宝清一起来到了天津。头一天，他到厂里領来窝窝头和咸菜，我們倆一起吃晚饭。当我咀下一口窝头往下咽的时候，不禁的笑了，說： "王大叔，一年多沒吃雉雉啦。" 这时王宝清微笑的脸，刷一下就沉了下来。我的眼睛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他带着憂虑的情景說： "家祥，不要过于高兴，痛苦还在后头哪！" 我怕勾起他內心的苦事，因此也没进一步深問。吃完晚饭后，王宝清并給我找好了睡觉的地方，待我真如亲兄弟一样。当我睡在床上时，不由的回忆起幼年时代和王宝清在一起玩的时候，并不像这样亲密，如今却比亲兄弟还要亲。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了好久也没想通。
第二天，王宝清就领我到双喜纱厂验工。当时验工特别简单（正是吃豆饼那年，厂里因工人太少而开不起车，所以验工随来随要）。到人事科量一下身高，测验一下眼力，写一个条子，什么也没问，由一个大高个子青年人领我到瓦工部去，交给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就是当时代理工头老焦，因为他是干活儿的，所以一点当头儿的架子都没有。他说：“伙计们，又来一个。”说着，就让我和工人们一块干活儿去啦！从此我就过上了工人的生活。

当时正是冬天，天气特别冷，真是滴水成冰。在外边干活手脚都冻得裂开了缝。每顿饭只发给三个窝窝头，一块咸菜，实在吃不饱。身上穿着一个空心小棉袄，下身只穿着条夹棉裤。真是：“北风吹，浑身抖，想父母，更难受。”刚出来时心气很高，认为总算是吃上干饭咧，谁知道比在家里时更饿的慌。心里总想不干，但又想：有烦人找个事由，也不容易，先凑合呆着吧！还总吃不饱呢，谁有吃不饱的苦头还在后头呢？

**白天黑夜连轴转**

天气愈来愈冷了，冻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要求到暖和地方去干活，恰巧锅炉房正用拾煤工人，就把我调到了锅炉房拾煤。那时锅炉房的头儿是杨宝山，杨头
对待工人们还很好。他教给我烧火，看汽压、水压、水路，暖气等等（杨头是工人出身，体会工人的痛苦，所以对人很好，现在已退休）。我心想：遇见工人出身的头儿真幸福，要是遇见狗腿子工头，还不知受多大罪呢！虽然工作上顺利，干活也不冷啦，可是仍然吃不饱，每天十二小时的抬煤工作，比在瓦工部干活更累，虽然活更累，可是窝窝头一个也不让吃多。每天饿的肚子直个劲的叫，眼直冒金花。

为了吃的饱，为了活下去，白天在厂里干十二小时的活儿，晚上就到新中山（现在的钢厂）去推车拉马，这样连轴转，可以多赚一些工钱，才吃上饱饭。但是白天干十二小时，晚上再干一个班，人又不是机器，怎么能受的了呢？困的我睁不开眼。后来所有推车拉马的工人，都联合起来，由一个人站岗，看守日本人，一部分人睡觉，一部分人干活。但这并不是公开的，心里总担惊吊胆，有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就是一顿毒打。后来日本人监视的愈来愈紧啦！不能睡觉了，所以也就不干啦。

因“偷”被捕

工人们内心的怒火总是要燃烧的，为了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当时我们斗争的办法就是“偷”。开始的时候，我特别胆小，因为刚来到厂不久，人生地不熟。但是我们采取了集体的办法，我胆子也就大啦！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三号那天晚上，九点多钟，天气漆黑，对面看不见人，
静悄悄的，我們鋸爐房有三、四個人下班沒走（宿舍沒暖氣，特別冷，所以下班後都不回宿舍，一直玩到睡覺才回宿舍）。在“電氣”玩。这时布厂工人李建瘦急忙走了进来，小声說：“兄弟們，帮帮忙吧！今天纖厂小包沒有夜班，九至十二点巡逻的日本人，已經回去睡觉啦，門倒鎖着呢，咱们一起去吧！”我和楊洪彬等四人就一起去啦！不到十分鐘，我們都上了房，有在房上的，有在屋子里头的，就用绳子往房上一包一包的系，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搬走十来包綢。我头一个下的房，刚下来，薛麻子一把手就把我给抓住了，当时把我吓坏了，不知怎么好。我就央告他說：“咱们都是中国人，还能白的了你吗？”薛麻子非但不听，拿着手枪对准我說：“你再說，我枪毙你。”說着，就吹起笛儿来啦！这是他和日本人的暗号。日本人和伪警察狗腿子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大枪上着刺刀，硬逼着我們下了房。然后就把我們捆綁起来，弄到人事課。不問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是頓劈柴棍子毒打。然后审问工作开始了。日本人問：“誰讓你們偷的？你们的主子是谁？还有那些人偷来？”我們说：“因为吃不饱才偷的，我們都是头儿。”為了不连累穷哥们，誰也没有拉人，就是我們五个人偷来。日本人一看，誰都不說，又是一頓毒打。打完后，就灌凉水，隨后就鎖在小黑屋子里。在人事課折磨了五天，在十二月十九号带上手铐子，脚镣子，就送到军用倉庫一八二〇部队（当时日本人的宪兵队）。又是审問，还是那一套：“誰讓你们偷的？你们的头子是谁？还有哪
些人偷？”我們說：“已經說过了！”誰也沒哼声。氣的日本人直喊：“八格牙路”，当下旁邊拴的那个狼狗就向我咬来，剛到我們身边，就像什么东西把它抓住一样，原来是它脖子上的铁炼，拴在铁棍上，吓了我們一跳。日本人没出气，拿棍子就打，打完了鎖在一間小屋子里。轉天就把我們送到了東车站劳工协会（是个特务机关），只许進，不許出。呆了沒有两个钟头，就把我們装上了闷子車，送日本当苦力。

新港集中营

在天津上闷子車，到新港下車候船，我們住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僻地方。四周一片荒凉，一望无际。这个偏僻的地方，有几十間房子，四周围有兩層電綱，中间夹有一条小河。我们住的房子每間有十来丈长，二丈来宽。屋子里两边是木板床铺，住人用，中间是走道，最后边是三个大水缸，缸上放有木板，是作大小便用的。屋子里一个窗户都没有，出口入口就是一个门。吃的是：每天給三个杂合面窝头，连塊咸菜都不给，只讓喝点白水。另外还有非人道的报告制度：吃饭、上厕所、睡觉等都要向日本人报告。如果不喊报告，日本人就說：“你心坏啦坏啦的有”。怀疑你要跑，就用皮鞭子狠狠地毒打一顿。为了容易监视人們，我們到了之后，馬上就發给每个人一身灰色的“苦力服”和一条灰色的棉毯子。把自己穿來的衣服扒下来交給日本。黑夜白天有日本人和狗腿子們，
拿着大枪监视着我们。因此人们都叫它“活地狱”或“集中营”。我自从进到这里，脑袋就好像带上铁箍一样，真是有难难解，过着非人的生活。

到集中营的头一天，杨洪彬就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几个人就更想家了。第二天一起床，×××就不见了，也不知到哪去啦！再看杨洪彬呢，浑身都发肿了，发冷发烧，直打哆嗦。我把我的毯子就给他盖上啦，我领到的水也给他喝啦，他哭声的说：“我光剩烧了，不冷啦，”于是就又哼哼起来了。断断续续地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转天我起来就去看他，连背都没动，我再一看时，他死了。我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失去了伙伴，失去了忠实的朋友，失去了难友，是多么让我伤心啊！联想到自己的前途，真是渺茫。病死，饿死，牵挂着父母，想妻子儿郎而死，以及受着各种折磨死去的人，大胶皮轮车每天都拉出三大车。我们看了以后，都眼晕，心里特别难受。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了二十多天。


煤矿生活

一天的早晨，还没有出太阳，我们就踏上了开往日本去的轮船。我们一上船，心里就凉了半截子。心想：完啦！回不了家啦！走了十几天后，李建藻因为想家，想起父母早已经去世，惦记着三个妹妹无人照顾，东想想，西想想，眼前漆黑一团，再加上终日吃不饱，就死啦。我含着眼泪，但是不敢上前过问，因为要是过问，扣上个逃跑嫌疑
犯，就有被扔到大海里去的危险。李健菈死后，身上给绑了一块铁，就拽到大海里去咧。这时候我們一起来的五个人，就剩下姓郑的和我俩啦。心里更加焦急。但又想，光怕也是没用，活下去，生存下去，就得斗争。于是复仇的心抑制住了內心的酸疼。船走二十六天，到达了日本の函館，在函館下了船，日本人拿我們当禽兽看待，对每个人进行消毒。消完毒，就又上車送往北海道。在將要到北海道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起不来啦。到北海道，住在小坪站（当时矿工們居住的地方），我一直又病了五个多月，起不来炕，长了一身臘疮大疮，也没有人给治疗。

开始一到日本时，就吃大米粥和馒头。但好景不长，过了十来天，就讓我們吃开了莜面和杂合面啦。可是还不管够，每顿饭給两个饼饼，连咸菜都不給吃，每人給一碗萝卜汤。据说这是日本人的手段：“刘备说孩子，要买人心”，先給你来个甜头，然后拿你当牛馬使喚。因为这些人送到日本国，很不容易，要是都死了，豈不是更大的損失嗎？果然如此，我一連病了五个多月，病还没有完全好，日本人一看我光白吃饭，不干活，就火啦，大喊：“你的，下井得了。”于是就逼迫我下煤窖干活去。那时煤窖真是万丈深渊，到井下干活时，都是坐小火車去（因井深），下边没有膝盖的水。当时規定每人一天扛五十根木头，我病还没有好，那干的了这么重的活儿。請假又不许可，因此我干了兩天，只好要求去干轻便活儿。当时轻便活，一天是推六十吨柴，我吃不饱，又有病，实在干不
了。有一次，餓的直心慌，兩眼直冒金花，后边运煤车是一辆跟着一辆。我心里真是着急，日本人还拿着木棒满地转，心里一害怕，脚底下一滑，就摔倒在小铁道上，脑袋给摔破了。和我在一起干活的人们，一看我的脑袋破啦，马上就跑来把我弄出窑口，给上了点药。日本人就让回去干活，一会儿也不让休息。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一天，我下夜班，六点都过了还不见接班的人来，往常都是五点一过就接班来，窑里的日本人一个也看不见了，真是奇怪。这时我们都不干活啦，就回宿舍啦。刚走不远，六点钟接班的人们都迎了上来，说：“咱们快回国啦，日本完蛋，投降啦！”这个消息，很快的传开了，振奋着每个人的心。立刻把苦脸变成了笑脸，于是大家欢欣鼓舞地向宿舍冲去。

第二天吃完早饭，大家都不下窑干活啦，聚在一起欢乐，歌唱。每个人的内心的喜悦，真是说也说不完。大家正在尽情欢笑的时刻，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架银灰色的飞机，这架飞机只飞有十米高，在上空盘旋。大家仔细一看，是中国飞机，于是都喊了起来：“中国飞机来啦！万岁！”每个人的心都沸腾起来啦！跳着，笑着，有病的人也没病啦！日本人在一边站着也不敢过问。不一会儿，飞机投下来大米、白面、大桶、武器等。我们有了武器以后，马上成立了科察队（据说是由八路军战士带头组织）
棧起来的），拿着大枪自己站岗。同时把日本人吃的稻米没收一部分，日本养的牛也给宰了，生活改善了。后来我们就去解放其他矿区的难友住的地方。一进门口就說：“我西那軍”，向难友作中国胜利的宣传工作。我们刚出国时，是三百零二人，这时只剩下一百五十六人。我们每个人都怀着复仇的心情。“为死难者报仇，不怕牺牲！”这是我們的行动口号。就在这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我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幻想破灭了

一九四六年初，我从日本回到了祖国。有很多老工人都来看我，又是喜，又是憂。喜的是，死里逃生终于回到祖国，憂的是不知受了多少苦难。我上工以后，为了报仇就到法院告薛麻子，結果告了多处，也没告动。后来連堂也没过，就石沉大海了。薛麻子挎着手槍仍然在厂里晃晃荡荡，吃的开，說一不二。我非常气愤，国民党政府不给人民作主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我报仇的心情，慢慢地压了下去。心想：“死里逃生，好不容易回来啦，再闹出了事来，說不定……。”因此就不敢闹了，忍气吞声，闷头干活。一直到解放，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报了仇，把那逮捕和杀害我們工人的刽子手薛麻子捉了办啦！

（杨进信整理）
控诉

孙俊红、王惠珠 口述

在旧社会我们女工是处在最低下、最叫人看不起的地位，我们生活真是苦不尽言，但为了活命，为了养育我们的孩子，只有忍受着那难熬的岁月，把希望寄托在将来。

由于生活的贫困，我们工人家庭的子女，很多在十一、二岁的时候，父母就得忍痛把我们送进工厂，开始尝受着生活的折磨与侮辱。十一、二岁的孩子没有机器高呢，干起活来非常吃力，但那班灭绝人性的把头，他们对于一丁点大的孩子也不肯放松一步，只要他们一不如意，那你倒霉了，不是打，就是骂，动不动就要开除你，吓得我们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知怎么才好。由于繁重的工作及残酷的精神虐待，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精神恍惚，毫无生气，加上吃不好，喝不好，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胃病；尤其是我们童工，因为活重，又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大多发育不正常，好多人成了罗圈腿，厉害的在两腿之间似乎成了
一个圆圈，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非常受罪。

那时，我们每天上两班（每班十小时），上早班的人澡洗洗脸都摸不到，即使是在严冬，也得到老远的地方去打一点凉水回来，胡乱的擦一把脸就赶快的进厂干活。

女工们有了病那才可惨哪，医院是有啊，但是不给工人看，非得有当头的条子，才准去看一下，有的女工病了，烧到40度还不准歇班，在家里病或在“单身”病的，也得硬拖进厂干活，不来就开除。有的人病了，把头们只准请事假。如现在的成车间的检查工郑兰同志，在十四岁那年（1944）冬天，因车间太冷把手给冻坏了，由于医院不管治，把右手的拇指与无名指的肉都烂掉了，伤口很大很疼，整天把手挤紧，结果拇指与无名指之间的腐烂处都长在一起，形成今天的右手拇指比左手短一寸多，工作起来极不方便。

一般结了婚的女工，如怀了孩子那就愁死了，天天提
心吊胆的，怕给当头的知道，一直到瞒不住的时候，还是被赶出工厂大门口，因此那时女工都害怕结婚。

家在外地住或虽在本市而离家很远的女工们，只好住到那监狱似的女单身内，一间斗大的房子，就要挤上七个、八个，甚至十来个人，炕上睡不了就睡洋灰地，三九寒冬既不给生炉子，又不给烧炕，屋内冰窖似的，寒气逼人，冻的我们上牙打下牙直打哆嗦。没办法，只有大家挤紧了身体来互相温暖。

夏天，屋内蒸笼似的，热的透不过气来，加上苍蝇，蚊子，臭虫，跳蚤遍地都是，咬的我们整夜都不能合眼。

干了一整天的活，累得腰酸腿疼，直不起身来，还不让人马上回家，还要排队等着门警来搜腰包，夏天倒还好一些，在十冬腊月，大风大雪的天气里冻得人都快要僵了，也得老远的解开衣服等着搜查，解得慢一点就得挨打，搜你时乱捏一气，搜完后就一推老远，稍一不注意就要摔死，如果要搜出来一星半点的布条、纱头，马上就被带到了一间屋内进行审问，拳脚相加，打得鼻青口肿还不准人哼一声。

在那吃人的社会里，女工们连长的漂亮一点都像是犯了罪，她们除了忍受生活的煎熬，还要忍受那班野兽们的侮辱，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她们高兴，就可以随便乱来，疯狗似的，到处乱嗅，有的甚至跑到女厕所内乱抓人，一到星期天或其他休息日，这班流氓吃饱喝足了，就三两成群的东倒西歪的硬往女单身内闯，还满口胡
说，吓得女工们栓上门，坐在屋内连大气都不敢出。

记得那时布场有一个女工，因为长的还不坏，不幸被把头侮辱而有了孩子，在孕期总算未被开除，但孩子生下后还未满三天，就被强迫着上工班，可怜她脸色焦黄，眼窝深陷，连走路都缺乏力气，还得去干活，至于孩子，就因为没有“来历”，只有被活活的扔了。

还有一个年轻女工，也由于长得漂亮，而被万恶的把头给糟踏了，可怜她年轻轻的，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就偷偷的跑回老家，不几天就传来了她的死讯。

像这一类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仇恨填满了我们每个女工的心头，只待时机一到，立刻就迸发出复仇的火花。

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女工们的觉悟不断提高，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全厂性大罢工时出现了人人皆知的“四大金刚”的英雄行为。我们终于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争得了本身的解放。

（海帆整理）
偷 布

田献查、宋文先 口述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正赶上日本鬼子的强化治安，把我们实在饿坏了。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活，连半饱也混不上，肚子是不饶人的，整天价为这个肚子发愁。没有办法，只得下了班又去中山钢厂当钳子工。就这样连轴转，还是吃不饱。又累又饿，个个被折磨的脸上像得了黄病那末黄。身子瘦的都是皮包着骨，假要是一下子摔倒了，就别想再爬起来。

为了活下去，我们和鬼子作了一些无形的斗争。当时斗争目标，一个是“消极怠工”；一个是“偷”。因为没有组织，被日本发现和搜出来了许多布和钱。鬼子对我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手段：扒光屁股示众，皮鞭子蘸凉水……等。就这样子，不但没有把我们镇压下去，反而叫我们把他的眼睛——工贼，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日本鬼子发现偷布以后，岗哨增加了，搜腰更加严格了。连穿的破鞋也得脱下来检查。厂内的巡视增加了次数。白天不知什么时候就到厂里，东瞧瞧、西看看。平时对工人最毒辣的矮鬼子南波，更是勤了，一进厂手不离棍子，看谁不顺眼就是一棍子。

南波，算不愧是他们天皇的子孙，又矮又瘦，个子小的比缝布机高不了几寸。两根秃眉底下凹藏着两只老鼠眼，眯眯着，从眼角里瞧人。别看这鬼子长的样不好，对工人是又狠又毒又狡猾。只要一进厂，就像小偷似的溜躑ᵖᵉᵉ‍รก看人。他那根棍子没有一次不开张的。

这几天，矮鬼子南波和瘦猴子高野总是不离门，进厂先从茅房。高野堵门口，南波进去不问青红皂白一人一棍子。有的工人一见南波，往外一滑，堵门的高野是上边一巴掌，下边一个胡子，把你摔个大扒虎。管保你头暈眼花，半天爬不起来。

高野，这个猴子，个子比南波高，黑光眼镜总不离眼。可别看这小子瘦得皮包着骨，摔得一手好跤。最拿手的一招，算是“大背跨”了，摔人是又狠又重。平时和工人摔跤，如要摔不倒你，反正想法得揍你一顿。从此，工人们和他摔，就让他几分，叫他摔倒。这样，他更不知天高地厚啦。
这几天，織布厂的工人干活是提心吊胆，处处留心，不知那一会就倒霉挨一顿揍。鬼子怎样凶，怎样鬼，我們到底挨了鬼子的脾气，当时在工人当中有一句俗语："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单打没长眼的。"来表示工人們应当怎样留神鬼子。其实工人們没有多比鬼子长一只眼，只是多了一个心眼——我們叫加油的小孩們替我們放哨。哨位設在仕工楼上窗口，只要有鬼子一进南場，小加油們就跑过織布場一喊，全厂工人把机一齐开动，霎时布厂机器全开齐。就这一手，把鬼子們骗的总说我们："干活大大的。"

有一天，矮子南波进厂了。有一个姓崔的織布工人，一见南波就有气，心说："好小子，又来监工来啦，监工我也 是不干活。"站在車前就是不开車。南波这小子还是冥灵，一眼就看见他了。转一圈他接头；再转一圈他还是没有开車。南波火啦，瞪着眼竖着眉，把崔推了一跤，把这車上的卷布轴放下来倒了好几码布，也没有找着按班印①，拍了拍崔的肩膀說："你的干活大大的好。"其实姓崔的并没干活，只是把接班印織在大轴下边給压着的。就这一手，把王八旦骗了，鬼子作梦也想不到。

我們的胆量是越来越大了。有了这帮加油小孩，我們确实方便多了。

① 南場，指織布場，包括打轴科，穿接和織布整理車間。
② 按班印，是上一班和下一班的分班记号。
一天，南场日本总头十吉桑进厂了，大家把布机开的哗啦、哗啦山响。十吉桑是个大胖子，进厂转一圈准走。到仕上科叫加油小孩们，搬两个木凳子，并在一起一块坐。他凳大，坐两个凳子都没有富余。叫小孩轮流捶背，捶得他这个懒猪不断的哼哼。

我們为了叫他看不出毛病来，在他面前也使障眼法：一次，推絨的姓杨的，知道十吉桑进厂了，把早已准备好的一車絨故意推在他面前站下。拿出毛巾擦前鼻涕。十吉桑看看全场，每台车一盒盒满的絨，很高兴的走在杨的面前：“杨的！”一伸右手大拇指：“干活大大大，休息休息的有。”就这一手，以后你在它面前躺着他都不管你。

三

夜晚，織布厂几十电的大电灯，照的我們昏昏昏昏头。肚子整天吃不饱，被布机这么一震，个个脑袋都要裂口似的痛。为了把日本人早点骗走，我們勉强干了几十分钟活。

鬼子們走了，布机稀里哗啦的停下来，有时剩下几台车。怕达怕达的声音，刹时消失在热鬧的欢声中。

布滿，这是干活的地方吗？活似农村的庙会：说笑话的，讲故事的，三一群五一头，闹闹哄哄，比武場更为热闹。把布撕开十几寸，两个人对折，看看谁的手快……

有的在布机上倒絨，有的在上货①，准备着明天的收获。

① 上货，是指工人把布和絨條在身上，准备带出去。
明天的饭食。白日打一天锄子工的人們，躺在車當子里，早已發出鼾聲。这是多么甜蜜的夢啊！

噢，南波進場了。哨兵發出了警號，頓時布場工人完全驚醒。人們圍着車，亂亂哄哄。剎時布機一齊開動，機器嗡嗡山響，布機好似也知道我們的心，在日本鬼子面前顯著它的威風。幾個鬼子南波提着棍子，站在大道當中，看看誰不順眼，就抖一抖棍子威風。

南波走了，崗哨又發出警號。工人們的心也慢慢的停止了激烈的跳動。布場里又恢復了喜氣，布機，又停止了轉動只有天軸帶著几百根皮帶，發出唏唏唏唏的節奏聲。

南波，這個狡猾的東西，他並沒有出場，跑上了天軸馬達上，用木棍捅開天軸鉤門偷看了全場情形。這個漢 =&（不 看便罢，一看，可把這小子的肺氣炸了。全場車都停了，工人們都坐在車上聊天……。南波氣勢汹汹，嘴里用他那不熟悉的中國話罵着：“統統的心坏了，八格牙魯，”闖進布場，棍子在我們工人头上，身上亂飛。有的倒下的線沒有來得及藏好，被他看見更是一頓亂打。就這一回，鬼羔子在布場足足呆了兩三個鐘頭，才他媽的滾了。

鬼子這一手，我們真吃了一次大亏，可是我們也長了一智。从那天起，我們不但在天軸馬達上設了崗，同時在打軸科門口也有我們的人啦。“偷”我們也由几个人搭伙了。我們这一伙差不多都是修理工人。跟日本鬼子屬的中國
人守卫，免得逃走，勾上了。每次带货都不平安。安出去了。就这样，不但解决了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还帮助了一些穷哥哥们的大忙。

四

旧历年快到了。我们这十几个人，打算搞一下大的，多几个热热闹闹地过一个痛快年。大家合计，明天第二个夜班带货带出去合适。大伙预备一大批货，十几匹布。在星期五天亮以前，分别把布上好了。每人差不多两匹半布，腰里、腿上都上满了。用绳捆的，紧紧地。外边用小夹衣一罩，一点漏洞也没有……。

汽笛响过，红灯着了。工人全开始下班了。我们也分别下班了。

刚出布厂门口，就是一惊。大批的鬼子把住了门口，把每个工人闹得死死的。退，是退不回去啦。鬼子的长枪短枪逼得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之路。赵大个，用腿一挺我。意思是“闯”！我们把心一横，豁出去了。

工人们排成长长的一列。搜查开始了。这次特别厉害，从头上到脚下的鞋底，都要检查检查。我的心，跳得特别厉害，似乎要跳出来。心说：坏了。“叭、叭”的打人声，哭叫声，堆杂一片……。

搜查越来越逼近了。大队也越来越缩短了。我的心更加紧张起来。突然，南波嗖的一声“你的出来。”害怕是不顶事的，我便挺身而出。南波看了我的神态，上去就是
一个嘴巴子。当时只觉得脸在发烧，两眼发黑，脑袋嗡嗡乱转。也不知道是几个鬼子乱打乱踢，我把眼一闭，任凭于你。鬼子们像饿狼一样把我身上的布全都卸下来了，把我推在队伍一边，把布挂在我的脖子上……。

日本兵把我们压在人事课后边小屋里。我一看：糟了，全是我们的同志。赵大个的衣裳都裂开了大口子，嘴巴子肿得高高的。我用胳膊碰了他一下，看他的眼睛，已经领会了我的意思。

屋门打开了。南波、高野……好多鬼子，嘴里噜里噜里发出凶恶的声音。人事课的汉奸大褂李也摆出了瞪眉瞪眼的恶像：“都把衣裳给我脱下，我叫你们偷……。”南波、高野、人事课的家膳，小板……。每人手中一把马鞭子，蘸了水在我们身上乱抽。昏过去，用凉水喷过来，大褂李在一边不住的叱喝：“还有谁，叫你们偷……。”我们始终没有招认。

一连好几天，我们七个人连一点凉水都没进。肚子饿的呱呱叫。动一动身，痛的像锥子扎心。晚上也不知几点钟，从门外边扔进了好几个烧饼，这是谁在关照我们，救我们；后来才知道，是人事课的穷哥、知己朋友孙胖子，冒着生命危险替我们带进来的。

天下的乌鸦一般黑。穷哥們的心却永远是心连着心。日本要把我们这七个人送到日本国去。布场的穷哥們，为了救我們，在日本面前求情，在厂长面前请愿。但是，可恨的鬼子不答应。“不干了！”全体工人愤怒了。布场的机
器都停了，红牌个个立了起来。工人们一上班就坐在布机上⋯⋯。不给人不开工，多会见人多会开工。布场的吼声，惊动了日本人：机器上的红牌像树林子那末密，一根挨着一根。鬼子们看到这种情形，怕工人们起来闹事，答应了。人放回来了。我们斗争胜利了。

五

旧历年前夕。我们七个人，终于又回到了布场。穷哥们的热乎劲，别提多大了。像多少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见面问短。有的说： “这事出的希奇！那一天鬼子就好像点名要咱们似的。” 有的说： “不，一定出了汉奸，报告啦。” 有个个说： “对！一定有人报告了。”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在谈论着。张师傅说： “那天正赶上我倒水去，咱们的二头杨白毛，打外边回来，看样子有点嘀嘀咕咕的⋯⋯。” “好小子，跟我们来这一套。” 有个个火了，用右手一挽袖子： “打死他个×××的”。我们到底把事情弄明白了。

就在出事那天晚上，二头杨白毛，偷偷的溜出布场，到日本面前报告了。鬼子当时赏了他几十块钱。

大家合计着，一定要报仇，出这口气。决定在大年三十晚上砸断狗×的腿。你不叫我们好过，我们也要你过不去年⋯⋯。

第二天，二头杨白毛没有进厂，我们觉得很奇怪，田师傅走来跟我讲： “报告的不是二头。” 我觉得很奇怪
說：“你怎麼知道？”田師傅說：“二頭叫我來報大伙說
明……。”

當時我把這事告訴了大伙，知道這事已經暴露了。這
小子有了準備。氣，我們是要出出。事情要是鬧的太大了，
他向鬼子再一報告，我們的仇不但報不了，連飯碗也不一
定保的住。暫時壓一壓火，表示大家能容人，但絕不能平
白完事。

以後，我們哥幾個“偷布”，他不但不敢去報告啦，
反而到門外替我們放起哨來啦。

雖然沒有打他一頓，但他已經知道弟兄不是什麼好事
的。

（完 劇 梅理）
人间地狱大工房

杨玉宗

我十六岁那年，就在双喜纺织株式会社纺布。住在靠近老中山钢厂（天津钢厂）九间大工房的一间又潮湿、又髒、又臭的五号房里。屋子里有四个大炕，每个炕上睡着十多个人。冬天挤在这个屋子里的都是缺衣少食的人们，约有60来口子。就是扬风遍雪的三四天里也不给火炉子，冷得像冰窖，玻璃上和墙壁上冰霜——冬也不化。我们睡在冰冷的炕上，冻得紧紧的蜷缩着，睡不着，就互相打起通腿脚，睡在一个被桶里，谁也不嫌谁髒髒。

我当时和霍金玉（前在棉纺四厂的）就是睡在一起的。当听到厂内响过上工的大笛后，就赶忙起来洗洗脸。所谓洗脸，就是用冰凉的自来水，将脸上的浓眉毛湿润下去。

每个人都提个各色各样的、掉了捣烂的破提盒，有的拿着个饭碗的，怕手冷就放在怀里夹着。一出大工房门，冷风刺骨，浑身打颤，忙把衣襟围紧些，一路小跑。跑到厂内缓了脚，这才算好受些，因为厂内有暖气。可是每当下
班，由厂内跑到大工房里，可就惨了，就是穿着棉鞋的人，也受不住冰冷潮湿的洋灰地，像冰一样的硬着，脚底板生疼。何况我們很多人沒有棉鞋穿。后来都生了冻疮。我记得高辦柱等人，沒有长裤子，穿着裤衩上工，冻得腿脚肿的很粗，走起路一拐一拐的摇摇晃晃。我們只好围着棉被坐在炕上，暖着脚。凄惨的情形跟要饭花子并没有什么差别，通身上下穿的戴的，都是“破衣烂衫”的，棉花“滴溜搭拉”的，露着肉，裤子的棉花滚成一个蛋，踏着破鞋，露着脚趾和脚跟，头上的头髮长长的，浮着一层灰白色的浆纱灰，使得头髮像干草一样，一点光泽也没有了，脸色像死了一样的苍白，带着几条汗水泥迹。如果不是有一双活动的眼睛，不时的眨动着发光，誰也看不出是个活人。

我們在冬天里，常盼望快到夏天，可是到了夏天就更难熬了。屋子里比院子外边还潮湿，屋顶上，犄角旮旯都
挂满了蜘蛛网和蛛灰，墙上生着苔藓，再加上带鞋、臭袜子的气味，使人喘气都困难。白天干了十二个小时，挨打受骂，累个半死好不容易下了班，可是夜晚的臭虫、蚊子、跳蚤、虱子，咬的睡不着觉。半夜里工人孙吉深起来，捉臭虫时，眼睛都差点瞎了，太多了。不知先捉那个好，就赶紧用双手在被褥上搓，搓下的血一片片的，手上粘好的血，发出腥心的臭味，像是杀了人似的。

遇上个阴天，人们在屋子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汗流不止，用把扇子摇摇是不顶事了。别号房的人们，早就抢占了露天戏台上去睡；我和田大起、刘连生、张景田等人，只好冒着毛毛细雨，在院地上铺上一块席，盖着一块席睡。醒后被子湿了，浑身骨头节像落了挂似的酸疼无力，勉强的去上工。

白班熬过了，心想着倒过夜班来，在白天睡觉可不再受蚊子、臭虫咬了，哪想到竟有各色各样的和大小不同的苍蝇，围着你的头上嗡嗡转，人们刚睡熟，就被这些寄生虫们搔痒醒来。我们气急了，把门窗敞开，往外赶苍蝇，但过了不会，也不知道从那里钻进来那么多的苍蝇，它们就像是日本人特意派来的不会说活的汉奸狗腿子们一样，不分黑白白天的折磨着我们，我们只好把脏臭味的褂子蒙在头上睡下去。

当你下地小便去，常听到脚底下被踩破了的蛆发出叽叽的响声。茅房眼里的蛆比粪还多，当你看到那些白花花的蛆正在拼命的滚动时，会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心
里发慌，那成群的茶豆蝇，嗡嗡的转，好像因虫把粪都
霸占得一点空隙也没有了的缘故而着急，乱飞乱叫，虫常
常顺着腿跟爬到屋内去。
当虫进屋上炕时，地下地的跳蚤早抱住了大腿，拼命的吮
吸我们的血。身上的虱子常捉常有，衣服上有，被子上也
有，我记得赵金森拿虱子拿不过来，太多了，怎么办呢，
就用半块破砖头使劲砸。当时有人问：“这样的衣服和被
子怎么还要？”你就会听人们很熟练的回答：“工人三宗
宝：破鞋、破被、烂棉袄，外带虱子咬。”这是当时流行的
民歌。
我們常年住在这个潮湿的屋子里，人們通身长了浓泡
疥疮，日本人的医院，也不给中国人看病，人們黑天白日
刺痒的睡不好觉，后来都买点价外便宜的硫磺子补药，用
香油在碗底下调着后抹上，弄得身上，衣服被子上竟是硫磺
气味，压过了身上的汗臭味。疥疮的疙瘩被裤子粘合掉了，与血淋淋的嫩红肉磨搓着，疼得难忍。上下班走路都
很困难，男的的流着黄水。
我們每天十十二个点钟的苦役，每顿饭只给三个糠
窝头，一小块咸菜，后来连块咸菜也不给。工人只
可忍着饥饿把每天九个窝头包出去两个，为了先拿下钱来
买点菜吃或者换碗豆腐浆喝。可是，把头们就利用工人
们往外包窝头来残酷的压榨勒索，从中得利。如果你嫌钱
少，窝头不包给你，就在厂内想法找岔打你。我也给把头
刘魁等人包过窝头。
后来汉奸郝富贤“大黄李”们，明白张胆的随便拿工人们窝头房的窝头，用面袋装，用大包袱皮兜，这样一来面子少了，可是卑鄙的奸商式的窝头房的掌柜——董海，进一步的纵使伙友偷工减料，把窝头眼加大了，皮很薄，把面子偷出去换了钱，置了房产土地。有人曾因为质问过窝头房人们为嘛窝头越蒸越小而吵起来了，那窝头房的一部分伙友混横不讲理，用大扁担殴打得这个工人鼻口出血，从此工人看清楚了，他们是汉奸和奸商们的流氓手。后来给你嘛你就得要嘛，不管是缺一块或是苍蝇咬过的，一律不换，如果你要换个大点的，就会骂你捣乱。为此被打的人是无数的。

跟我在一起的霍金玉、张景田，不包窝头，还是吃不饱肚子。我记得杨凤山吃一顿饱饭是十二个窝头。后来杨凤山、霍金玉们都饿的熬不住偷着跑了，连月票钱都不敢算（因为日本人不准许随便不干），张景田每天下了班除了无精打采的蒙着被子睡大觉，就是躺着，从没有和别人闲聊过，眉头常常是紧皱着。我问他：“你怎么老睡呢？”他答：“吃不饱不睡干嘛去呢！”我这才明白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忘记肚子饿。我当时年纪小吃的不多，将剩下的一个半个的窝头给他吃。就这样他还是熬不住，实在饿的受不了啦，坚持到发了薪，将一个月的钱，买点配给人面粉（当时日本人实行强化治安，东西实行配给）和煤球，又借了个炉子，做了一锅稀面条请大伙儿喝。他说：“咱们弟兄再在一块吃一顿团圆饭吧！”他的声音是那样低，又颤
动，我們都很难过，心里却在说：你可別当兵去。可是嘴里说不出来，因为誰也没有力量把他留住。大伙儿說：“希望你在外边，多加保重身体，常来信。”

当晚九点多鐘，大工房四周一片漆黑，对面看不見人，我和田大起、刘连生、刘广仁等，分头放哨（怕日本人和汉奸們看见捉住了），有的人到外边去接扔过去的铺盖行李。这时我心里很难过，便对张景田說：“我也跟你当兵去！”他安慰我说：“你年纪太小，不行。军队的生活太危险！”我听了更难过，眼泪汪汪的呆站着，不知说什么好，只得不能自已再少吃点，多剩下点窝头給他吃，使他可以不去当兵。他像是领会了我的心思說：“在这个年月里，日本人逼得咱中国人没活路，常言道‘爹死娘嫁人，誰也顧不了誰呀！’天不早了，咱们哥們有见面的日子，你們忍着吧。”说完，就慌忙的蹬过宿舍围牆上的电网去了。可是我回到大工房屋内，还是在想着他那留下的一句话——忍着吧！似乎告诉我，将来他会打过来的。

生活越来越坏了，关給的窝头像黑狗屎一样黑，带着整个高粱粒子和糠皮，硬得像砖头子。我记得最清楚，我将三个窝头卖了两个，换两碗豆腐浆子，强把这一个糠窝头送下肚子。可是到解大便时，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困难。拉不出来，拉出来时，肛門早破了，直流鲜血，疼得我蹲不住了。当时人們都这样说：“这样的糠窝头，真他媽的吃也难吃，拉也难拉。”

工人們常年的受折磨，生了病沒有人管。有一年，
我得了病，觉得头大，眼前冒金花。实在顶不住了，在工房住着，邻居也照顾不了，因为汉奸狗腿子们每天到大工房来强行逼着工人上工，不管你死活，只要你有气，就不得活去，不准你请假病假。就这样，在人们上工后，我同屋人把门锁起来，把饭票交给他们代领，后来汉奸们知道了，再用这种法子是不行了，只好藏进天花板上而去了，我身体小，腿着腰提心吊胆的蹲在里边，黑漆漆的，净是蜘蛛网、灰尿，呛的不敢喘大气，更不敢咳嗽。唯恐汉奸“大褂李”发现了会挨揍。要是交到日本人手里，就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惨无人道的刑罚。就是藏在这里，也被汉奸们知道了，用棍子在天花板上处乱敲弄了一通，嘴里连骂带咧虎，但我没有出来便用手电筒照。更毒辣的，是饭票不准代领，这对病人来说，确实是个极大的威胁。要吃饭就得上班。汉奸“大褂李”逼着我们上班的人，就不分头脚乱打，嘴里骂着：“他妈的！人歇班，饭票不歇班！”就这样，我们大伙没办法，就逃跑回家了。

但是，离着家乡远的工友，因病被强迫上工，被打后气得死的，就有七、八个人，仅知道的就有关新春的弟弟，新兴华和徐殿考的哥哥，还有王家章、王少先。病死在大工房内，由于没有人管，就叫苍蝇爬满了尸体，后来在七洞里往外爬蛆，被汉奸们拉到靠厂房东边的一块戈地上，也不管埋葬，被疯狗们吃啦。

工人们每天饿着肚子干，都不知道有自己活过今天，是能活到明天。每天下了班，还得赶到新中山钢厂和兴元
植物油厂去打“锂子工”（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临时工）。就这样，昼夜的轮轴转着苦干，熬得人家像是没有魂灵，走着路就迷迷糊糊的瞌着了。脸色煞的都像鬼一样的难看，还是吃不饱肚子。

最后，工人被日本鬼子的“强化治安”的鬼办法，逼得由怕死而又不怕死了。要活下去，就只有一条生路——偷出厂内的东西来换钱度日。我們冒着危险，将钱和布藏在身上，闖三道日本和汉奸們搜查的卡口。后来工人任大卿、王家祥等人被日本捉住了，用各种非刑来折磨，灌凉水还不算，又将他們送到日本国去采煤。凶恶残暴的日本人，用这种办法来威胁我們，可是我們都說：“别他媽的听那一套，造家国国去（日本国）也不怕，能让他们打死也不能干等着餓死！”

就这样，大工房的四百大工上，原有六十多口人，后来饿跑了很多，只剩下十多个了，也不知道那些人现在还活着呢，还是死了。

过了不久，忽然間，日本鬼子見了中国人不打不罵了。他們在一天的下午，都跪在工务科内恭恭敬敬听着日本天皇裕仁广播講话，回来后精神颓丧的說：“我們的完了完了的。”并挑着大拇指說：“你們中国人是掌柜的干活了。”人們挨打受骂盼星星盼月亮的盼到了这一天了，日本可投降了。我們都高兴的狂跳起来，也有的人在炕上折跟斗，大笑大唱。
女把头刘瑞芳

陶桂芳 口述

早先，在我們細紗車間有个三十多岁，又矮又胖的女人，生着兩顆賊鼠眼，活像个母老虎，这便是女把头刘瑞芳。这个女把头，在日本鬼子时期就是鬼子的紅人。在日本人面前嘻皮笑脸，献媚鬼子，见到工人就把臉一搭拉，像是欠她五百大洋錢似的；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以后，刘瑞芳又和厂里的流氓坏蛋拉上了弦，仍然欺负年青幼小的女工。一提她的名子，女工們顿时渦身顫抖，害怕。那时候，細紗的女工都是些年青体弱的小姑娘，她们为了养活自己的父母，在十一、二岁就进紗織厂作童工，为了吃饭，整天提心吊胆，进厂以后却又老是担心挨打，因为女把头打人像家常便饭似的，她看你不顺眼就打嘴巴子，举起木棍，不管屁股臉就一顿痛揍。女工们的艰苦生活和肉体的折磨，使她们变得沉默寡言，虽然挨了打心里气愤，但誰也不敢说话。那个社会里，哪有工人说理的地方呀！有个細紗女工杜凤云，那时只有十五岁。沉默老
实，只知道干活，在技术上是一把好手，有一次，她接了头，在车搭里刚站下，女把头刘瑞芳走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就一阵痛打，她右手抓着杜凤云的头髮，下面用脚踢，左手挥舞着細纱车上的毛棍，向头上身上抽打著，屎盆洗出来的唾，不断的骂著“小×”、“挨×的”。顿时，杜凤云被打得不省人事，工人们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姐妹被打成这个样子，心里又气愤，又难过，可是没有人敢向前去拉一把，如果有人去向前看一眼，就也得挨她一顿打。刘瑞芳打完了杜凤云以后，嘴里还不断骂着难听的话，耀武扬威的走了开去。杜凤云被打得昏迷过去，姐妹们把她送到家里。就这样，杜凤云得了重病，一直病了六年、七七年，终于在1952年死去了。

还有一个姓何的女工，因为经常受刘瑞芳的气，终年累月受气，得了严重的妇女病，直到解放后才动了手术。

有一次，我纺完粗纱，又去抱纱，刘瑞芳走过来，劈啪叭叉就是一顿嘴巴。打得我顿时发了昏，满脸热刺刺的痛。刘瑞芳是細纱车间的女老虎，她整年吃的是工人的血和肉，每个工人对她这种打人的行为都恨恨在心，心里总想有一天会报仇的。

她不仅在厂内欺压年轻的姐妹，而且在她个人生活上也是无恶不作。我有一次穿一双花鞋上班，被刘瑞芳看见了，她直眉瞪眼地走过来问："谁给你做的花鞋？" 我说："是我妈做的"。"赶明儿叫你妈妈给我做两双！" 刘瑞芳凶恶地说。可是我还得满脸赔笑地答应她："是！是！"
是！我的母亲会绣各种的花样，就这样，一年四季，按着季节给女把头刘瑞芳绣花鞋穿，尽管如此，也免不了挨打。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人们发薪是发玉米，光领一个纸条，然后到人事课去领玉米，人排起来像一条龙。有一次，正是发薪的日子，刘瑞芳叫我给她到厂门口去取饭（那时工人家属给职工送饭），由于害怕挨打，慌里慌张给她取饭，结果把玉米条丢失了，顿时，我的心跳了起来，一家子半个月的口粮没有了，多么着急呀！回家以后，躺在妈妈怀里就痛哭起来。别的工人都领了玉米回了家，可是，我还在那里哭，半个月怎么度过呀！

大雨下得像瓢泼，我和妈妈从吴家嘴经过国民党几道卡子，来到了中纺五厂，找了几个管事先生，都没办法办事的，一连找了三次，在路上，娘儿俩一边走一边哭，老人家啼哭伤心，眼泪滴滴嗒嗒落在脚面上，一边哭一边说：“干了半个月呀！吃嘛呀！”就这样干了半个月。

刘瑞芳这个母老虎，人人恨得咬牙切齿，终有一天给她个厉害的。

一九五二年厂里展开了反对把头的斗争，细纱女工们终于吐出一口气，杜凤云的姐姐杜凤桂等控诉了她的罪行，这个害人精当场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处了三年徒刑，开除了厂籍。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王志岩 整理）
提起“国舅”，双喜纱厂没有一个工人不骂他，“这小子纯粹不是中国人，日本的走狗！”“国舅”这个名字是工人们叫起来的，其实他本人还以为这个名字满“光荣”呢！“国舅”叫李恩琪，二十多岁，身穿蓝布大褂，手里不离一个三十多长的棍子，十足的流氓学生打扮。两只三角狗眼瞪的鸡蛋大，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监视工人。日本话说得倒利落，在日本鬼面前是“大拿”，说了算。这小子虽然是中国人，但由于依仗他姐姐的势力，在厂里却无恶不作。（他姐姐叫李兆玉，是当时双喜纱场的电报员，与纱场的经理日本人北川靠着）对日本人真是“忠心耿耿”，对工人却是没有一点天良。所以人们就叫他“国舅”。

一九三五年，日本商人来到了天津，盖起来双喜纱场。日本统治下的纱场工人都是些十几岁的幼童，个个面色黄肌瘦，活像骷髅一样，干起活来虚汗满面。每个工人脖子
上都挂着一条破布毛巾。日本人为了从中国劳苦人民身上吸取更多的血汗，就收买了汉奸，使中国人对付中国人，李恩德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充当日本人的翻译，在双喜纱场里可以讲的上是个“掌上”。”

不谈布场工人和准备车间整理车间的工人，上厕所都要路过双喜纱场穿布料这个地方。“国舅”在这里像吃了耗子药似地钻来钻去。手里不离开他的“打爷棒”（指打人的棍子）。来往上厕所的人，谁不顺“国舅”的眼，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是几棍子。看见那个女工长的好点儿，过去就找便宜：你如果不顺着他，他就上日本人那里嘀咕几句，那就得“大饼夹蚂蚱家吃去，”把你开除。工人为了少惹事，就躲他走。但无论你怎样躲也躲不过他的狗眼。打人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每天都有几个工人挨他的棒。那个时候，工人上厕所都没有“自由”。“国舅”不光打人，连工人上厕所他也过去检查，叫工人撅起屁股，叫他验验肛门有没有屎，连女工大便他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尿还没有多大问题，不然，就不管屁股脸，上去就是几棍子，打得青的青红的红。这还不算，出了厕所，还得给一顿刑罚——举凳子，举“糕推子”，举铁棍子。上边举着，下边还吃“面条”（ Знается'棍），稍微一动，就打的死去活来。别的工人看了，心里又难过，又恨他。可是“国舅”这小子却在一边哈哈大笑。

那时候，工人利用上厕所的时间偷着吸口烟，吸烟被“国舅”发现也倒了霉，他闻到你嘴里有烟味，就是一顿
毒打。翻出烟头来非叫你吃亏不可。工人张法元因为吸烟被打得晕死过去。上厕所吸烟能是不值当的小事情，可在旧社会，工人连上厕所、吸烟的自由都没有。

再说说吃的东西。工人吃饭也经常遭到“国舅”的干涉。那时候，工人一顿饭只能吃上三个高粱面子的小窝头，一塊咸菜，就着点稀饭了。当时工房的豆腐房进厂卖些豆腐脑，豆腐浆，工人们为了吃半碗豆腐脑，只得吃上两个小小的窝头，用一个窝头去换半碗豆腐脑。为了吃，就像潮水似的去抢饭吃，免不了有的要早几分钟去领窝头，要是被“国舅”看见了，这顿饭就吃不成了。他把饭盒抢过去给倒到厕所里。一次，有一个男工友在红灯还没亮时（红灯亮关车吃饭）就领了两个小窝头，提了半提盒（饭盒）豆腐脑，从筒子工房的大道走来，走到穿巷科的大道旁。“国舅”大喊一声：“别走放下！”吓得这个工人打起哆嗦。“国舅”说着，抓住那个男工的脖子领，把棍子舞起来，朝脑袋上一顿狠狠地打，“叫你站下听见没有？别装蒜，他妈的！你不想吃这顿饭了吧，不许你动……动！”说着，走进仕上科便将南波日本人请来了，“国舅”在南波耳边嘀咕了几句，他俩走向那男工，南波上去就是几个嘴巴子，嘴里骂着他那牲口话：“八嘎！八嘎！”骂个不休。那个工人的脸刹那间青肿起来。“国舅”像得了什么妙计似的向厕所走去，干什么去呀？原来他提着“打狗棒”在粪坑里乱搅一阵，走出厕所来，到他的“日本爷爷”南波跟前，用手朝“国舅”比划着又嘀咕了几句，便用这条
粘满了粪便的棍子，朝那个男工人的饭里乱搅一阵，说：
“端走吧！这回香了吧！”南波用手堵住鼻子，连说“顶好！顶好！”一个劲朝“国舅”挑大拇指。“国舅”看到他的洋爸爸向他挑大拇指，心简直都飞了，美得像坐上了飞机，升入高空云层里，显出神气十足，耀武扬威的气概来。可是，在旁边的工人却在骂他：“让他不得好死，铁德的杂种，走狗！”

回忆过去的生活滋味，真难受啊！一天干十来个小时的活，下了夜班，还得给新中山钢厂干些零活。黑夜白天连转，仍然是没吃没穿，没有办法就得“偷”。有一次，布场保全工人刘富亭“偷”了两支榔头，被“国舅”发现了，“国舅”就将刘富亭叫到整理车间，和日本人嘀咕了几句，将刘富亭打了一顿。打累了，他俩休息一会儿，直打得刘昏死过去为止。工人把他抬到家里，也都流下了眼泪。刘富亭的母亲因儿子被打哭得泣不成声。谁家的妈妈不疼爱儿啊！刘富亭被打过以后，伤势很重，又加上生活上的困苦，不过一个星期就死去了。

一九四三年冬天，有的工人只穿着单衣和夹衣上工，布场有个姓高的女工，偷用厂里的白布做了一条裤子，不幸，被日本人发现了，便将姓高的女工叫到仕上科，日本人老卡坐在账桌旁的椅子上，“国舅”站在老卡的左边。俩个人嘀咕地说了一会，“国舅”又凑到老卡眼前，指着高连说带比划。接着“国舅”叫这个女工脱下衣服。这个女工不肯脱，“国舅”对他进行威胁，强迫脱下了上身。
“不行，把裤子脱下来！”“国舅”大声吼道。这个女工当然不肯。日本狗老卡火了，拿起一把大剪子，和“国舅”嘀咕了几句。“国舅”朝这女工说：“剪你的头发，看你脱不脱！快！快！”姓高的女工吓得浑身打哆嗦，大哭起来，满脸通红，无奈只好光了下身，用手掩着脸站在桌子旁。这还不算，“国舅”这个狗仔，为了更进一步的向他的日本洋爸爸献媚，强迫工上的工人们观看这个赤身女工。还对其他工人扬言说：“看吧！如果你们偷了东西，也这样办！”可是，这种威胁无济于事，工人们为了生活仍然偷。

一提起“国舅”这个滥无人道的日本走狗，工人们都咬牙切齿。工人们气愤地说：“要是有机会的话非好好揍他一顿，解解恨不可！”只是遇不到机会。“国舅”自己也有个耳闻。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国舅”一个人到一宿舍，刚一进宿舍大门，就看见有四、五个人一涌而上，将“国舅”包围起来，上去就是一顿痛揍。工人们打完了他以后，很快就走开了。工人们的怒火将要燃烧起来。

一九四四年的一天，“国舅”在场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挂轴工人上完了轴不准坐着休息，否则决不客气！”这张“布告”激怒了当时的挂轴工，苏宝玉、张德元等六、七个人利用吃饭的时间开了秘密会议，研究对付“国舅”的办法。苏宝玉提议道：“哥儿们！‘国舅’对咱们太恶了，咱们今天要出口气！你们说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揍他！”“好！咱们给他个厉害尝尝，你们...
害怕不？”“不害怕！”大家又同声说。“明天是礼拜六，
‘国舅’每礼拜六都早回家，他得过河，我明天晚四点多钟先走，到外边去等他。你们就听出气的好消息吧！”苏宝玉说。

次日，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果然，“国舅”悄悄地出了工厂。看来他有些胆怯了。是不是他知道了这个消息，要不然他怎么不大摇大摆的走呢？可不久，苏宝玉已经用眼盯上他了。这时苏宝玉已换好便衣，告诉其他工友，就跟在“国舅”的身后。

做贼心虚，“国舅”一边走一边回头。当他走到郑庄子派出所时，脚步越来越快，急速向前走着。苏宝玉也加快了脚步，“追！追上这个走狗！”杨庄子渡口到了，“国舅”已经上了船，他恨不得渡船赶快开往对岸，叫苏宝玉上不来。偏不随走狗的心愿，苏宝玉也上了船。“国舅”吓得脸色都白了。几分钟以后，两个人的搏斗开始了：刚下船，“国舅”还没来得及注意，苏宝玉一上去，抓住他的脖颈，噼吃两拳就是一顿痛揍。“国舅”也来不及还手，像宰鸡似地被按倒在地上。这时，杨庄子渡口的人力车夫走过来劝架，并问为什么打架。苏宝玉说：“你们大伙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双喜纱厂的‘国舅’，日本人的走狗。中国人拉巴巴都得由他看看屁股子！”苏宝玉这么一说，人力车夫气红了眼，其中一个喊了一声：“好个狗腿子，打！”七、八个人又把“国舅”按倒在地下，打成一团。“国舅”的脸被打成了‘胖子’。苏宝玉告诉他：
“怎么样？今天的滋味尝着了吧！揍了你，去上日本人那儿报告去，我明天上班顶着你。”“圈舅”被打后，也不敢吭声，他那“气概”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双喜纱厂和杨庄子一带。工人们吐了口怨气，心里分外舒畅自在。

同志們：你們看了这篇文章也許会提出一个问题来：“圈舅”現在干什么？他还在棉纺五厂吗？不要着急，我正要交代呢。他的洋爸爸投降以后，把他抛下了，他还没有死。但他已經不在棉纺五厂了。因为这个工厂已经变了，他吃不开了。要问他干什么吗？一九五七年初他被逮捕，现在是监狱里一个被判处十八年徒刑的罪人。

（张金凤、王恕岩 整理）
一个女工的回忆

贾 珍 口述

那年头，女人进紡紗厂做工，就是自投罗网，整天累个七死八活，想停下来坐下来吃饭，那是梦想。一进厂十二个小时，别打算闲着，每次吃饭都是一边干着活，一边咬一口又苦又辣的窝窝头。那个难往下咽就别提啦！想喝口水，日本鬼子都不叫喝。

女工被鬼子、汉奸的污辱更是惨。那时候紡紗厂的姐妹都流传着一句话：‘要吃双喜饭，就得拿命换’！

一九四一年，我在老家无法生活下去，一家子逃荒来到天津，在双喜紡紗厂做上工。在紡紗学徒的时候，有个留着八字鬍，镶着一嘴金牙，长着一对猫头眼，穿着一身绿衣裳，带着尿壶帽的日本人——小板，他常常污辱和打骂女工。有一天上夜班，这个王八羔子喝了酒，像个野猪一样，见女工就拉着不放手，吓得我们几个女工就跑。他在后边追，他一看追不上就骑着自行车追，我们就围着紡紗机，弄当来回转，他把车子骑的飞快，就听见在拐角的地方
方，呯的一声惊响，把那个王八羔子连人带自行车一并摔倒机器底下去了，脑袋摔了一个大泡。我们姐妹站在一边，拍着手，差点把肚肠子给笑断了，真痛快，可给咱们解恨了。他爬起来，连头都没问，拉着车狼狈的走出车棚。

不久我怀孕了，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干活又累，浑身没有一点劲儿，“三九”天车间里没有暖气，把人冻的老打哆嗦，我的手都冻木了。那个倒霉的粗砂，开起来噜拉，噜拉的总断头。日本小板来了，一看车开不齐，把他那个野猫子眼一瞪说：“八格牙路！”骂完又打我两个耳光子。

在我怀孕八个多月的时候，扫车时实在弯不下腰，就跪在地上，蹭到车底下去扫。小板看见，把我揪起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打了我个嘴巴子，还说：“这样的干活不行得喽！”没法，我就一手抓住车把，一只手拿着刷子斜着身子扫车，勉强的支持到下班，好不容易回到家，肚子就痛起来了。痛得我出了满身冷汗，来回在炕上打滚，闹了一夜，天快亮时，不到九个月的孩子，就这样被折磨折磨的落了草。

孩子总算生下来了，但我因流血过多，就晕倒过去了，醒来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想吃点白面汤，哪里有啊！别说白面汤，连萝卜渣都看不见呀！在月子里吃上点山芋干、豆面饼还是算头等饭哪。我病倒了，孩子因无奶吃，也发起高烧，抽起了风。孩子嚎的心痛，我着急的哭。孩子总算命长，风一点一点的落下去了。
到我生孩子十八天头上，“大褂李”就来催我上班。我公公央求他道：“李先生，俺儿媳病刚好，还起不来炕，站不住脚，那能进厂干活呀？您行行好，救她一命，再让她歇几天吧！”这个万人骂的“大褂李”，一听上不了班，就像疯狗一样，把脸一翻，三角眼一瞪说：“别他娘的装死，能吃饭不？能吃饭就得进厂干活去！快下炕走！”公公把好话说了一大堆，也不行，没办法，不上班就开除，为了活命，我就带着重病上班去了。那走得动路呀。勉强的将上半天干下来，我那两条大腿肿的有腰那样粗，脚心里像有几根大针一样扎得生痛，每走一步，就像担着千斤重担一样的困难。给孩子喂奶时，由厂里到宿舍，只有半里来路，可我足足走半个小时。回来晚点，工头孙长会开口就说：“他娘的，你干么去这么长的时间？”我指着腿，让他看看说：“不是我故意晚来，是我这两条大腿痛得走不动，才回来晚点……。”他没等我说完，就连推带搡的说：“快去干活！下次再来晚了不行！”

有一天下午班，公公挨个买豆饼面去了，我用拾来的煤炭把炉子生着，等公公买回来做晚饭吃。到九点多，我的眼打起架来了，公公还没回来，我蒙着那条“百袍”棉被睡着了。公公到十二点多才买二斤豆饼来，进屋门一看，我正在炕上翻白眼，他就大声的喊我：“贤珍！贤珍！”我一点人事也不省，公公吓的不知怎么好，就喊同院李大娘，把我弄到院里，往我嘴里灌醋、灌水，折腾到下午七点多钟才苏醒过来。
当时工人不饱，劳动时间长，病人多，厂里经常开不齐车，日本干儿子“大根李”，正天手里拿着哭丧棒，在工人宿舍挨家翻歇班的工人，翻到我家，一进门就催我上班，我公公看见又是“大根李”，就吓得哆嗦，说：“李先生，白天俺儿媳给煮着了，才醒过来，干不了活。”

“大根李”把脑袋一扭说：“你这个王八蛋，成心不上班，还在家装死，走！走！上班去。”硬拉我下炕。同院的李大娘，实在看不下去了，将“大根李”推开说：“你还懂人性吗？你看，她这一天差点没死，被折磨的不像人样子，白天拉了一裤兜屎，刚省人事，那能干活呀！”“大根李”一听就更火啦，把脸一翻，恶毒的说：“死的了吗？死不了就得进厂干活！不上班，我就钉门，给我滚出工房。”刀把在人家手里，不上班就开除，就钉门，就赶出工房，我只好带着病去上班卖命。有一天，我孩子发烧烧实在厉害，躺在炕上光打哆嗦，我也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上班干不出活来，日本人打，工头打，为了少挨打，我就没上班，藏在柴火垛里。“大根李”一连到我家找了几、五次，也没找到我，等到深夜半夜，我才偷偷摸摸回到家。才上炕，还没合上眼，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汉奸，又来敲我家大门。我还没给他开，他就用脚把门踢开了，一进屋就骂道：“你他妈的，死啦，听不见你爷爷在喊你！”二句话没说，抓住我的胳膊说：“走！走！上班去！”我说：“李先生，我好几天吃不下饭，干不了活。”他把眼珠子一瞪说：“吃不下饭，你的饭票都那去了？”我说：“孩子也病的挺厉害。”他
好像得着理似的说：‘你别总拿孩子作影子，孩子有病算个屁！’我一听这话，麻也不顾的火了，那个女人不心疼自己的孩子。我就理直气壮的说：‘孩子不算个麻，你没孩子，还找人要个孩子干嘛，你家没父母，你还有人性吗？’他叫我给骂的没法说，只得拿着那个哭丧棒溜走了。后来我再歇班就到别人家里去睡觉。这样可把日本干儿子‘大阏李’气坏了。他再也找不到我的影子了。

（王文义 整理）
两张破席

徐殿考 口述

那一年，我才十四岁，就进了双喜紬厂（今天棉纺五厂）作童工，个子比炕沿高一点儿，立起脚尖还够不上机器面，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儿。工头像吃人精似的到处打人，我哥哥就是挨工头的打以后死去的。我哥哥那时才十七岁，也在双喜紬厂做工。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哥哥被日本鬼子的狗腿子用木棍打倒在地间的地板上，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看一眼。我畏畏缩缩地走到离哥哥不远的地方，看见他的脸白得可怕，眼睛紧闭着，凸出的恶骨和嘴巴上沾满了油污和棉绒，我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不敢上前。哥哥不肯人事了，几个人把他抬到大工房里。大工房里躺着几个体弱多病的工人在呻吟，简直像活地狱呀！那时候，我父亲也住在大工房里，我上工就由大人照料哥哥，可是吃的是嘴呀，豆饼渣、杂合面、糠面窝窝头。好人吃了连巴巴都拉不下来，看说病人了，不过几天的功夫，把哥哥送到塘沽老家，六口吐血死去了。
人死了，怎么办呀，爸爸哭的泣不成声。棺材钱是小事，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钱从那里来？东摘西借也凑不上一口棺材钱。没有办法，只得用席头卷起来把哥哥埋葬了。

哥哥死了以后，生活更像掉在油锅里一样，熬着吧。我和爸爸，住在阴森寂寥的大工房里。爸爸枯瘦的身躯，三九天依然穿着那件补丁罗补丁的破夹裤，冻的四肢颤抖，浑身哆嗦。有个工人看到爸爸这种情况，把自己的破棉裤送给爸爸。那时我们对这个工人十分感激。第二年，我十七岁时，由于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残酷地屠杀抢掠，我们工人的生活连牛马都不如，一顿饭只有给一个糠面窝头。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坏，冻的牙齿咯咯地响，肚子饿的咕噜叫。就在这一年，我爸爸死在大工房里。

那时，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办呢？死了人又到了鬼门关，发愁的事仍然是棺材钱。有几个好心的工人打算凑集几个钱给买一口棺材，可是，那时工人兄弟的生活也是饥寒交迫呀！吃了这顿没那顿，他们的心是有余的，但力量达不到啊！有一个工人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去人事课的“六指李”要求给一个盛机器的木箱子。我一进人事课的门，忙喊“先生”、“老爷”，“六指李”是日本的忠实走狗，见了工人，他的两双绿豆般的眼里带着红血丝，像要吃人。他一听说我要箱子，蓦地一声从沙发上午站起来，血丝的狗眼睛的鹅蛋大，说：“不行！木箱子还卖钱呢，滚蛋。”我一个劲地磕头，仍是不顶事儿。他连说：

“滚蛋，滚蛋。”多么狠心哪，“大褂李”的心都黑了。我一连拜了三个管事先生，他们都是似虎如狼般地吼叫，没人理我这个破儿。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还不如死个狗呢！唉！没有办法，父亲的尸体，只得仍然走哥哥那条道儿。三九天，雪花纷飞，天气奇寒，地冻的硬棒棒的，借来一个铁镐勉强掘了一个一尺多深的坑，把父亲硬僵的尸体用破席头卷起来，强塞了进去。

就这样，父亲、哥哥被旧社会给折磨死了，两张破席是代替他爷俩的棺材。

哥哥的苍白脸，爸爸枯瘦的身躯，两张破席。这些，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能平静，痛恨那吃人的旧社会。

（王恕岩 整理）
一块狗肉

杨玉宗

日本鬼子逼着我们工人不分昼夜的干活，可还是吃不上，穿不上，终日挨打受骂，熬了一年又一年。常常过了这个年，又盼望那个年，盼着什么时候能吃得到一顿喷香的肥猪肉和香香的白面饺子。当时，肉和饺子，只能在梦里吃到，后来日子久了，这样的梦，甚至也做不出来了。

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儿打起狗来了。有人说，日本人要大伙把狗都打死，说什么是传染狗疫。其实工人们对这些事是毫不介意的，闹狗疫！听他娘的那个去咧！咱整天挨打受骂的受洋罪，可不怕死。这是日本人怕死。

可是人们听说打狗都挺来劲的。我们找了棍子，也有的向家属借了闷棍，还有的没借到东西，就拿块砖头。我们见到一条狗，就追喊带打跑过去，打得狗一声声惨叫，猛跳乱窜的逃走了，工人们都在一块儿笑着地说：“再也沒有比打狗这事顺气的了。”也有的人说：“狗再厉害点我也不怕。”我问：“为嘛？”他说：“你小孩子家嘛懂
得这个，它没有日本人给撑腰哇！

实际上，打狗还不是为了痛快、顺气，还有一个好处呢。原来，有一次工友发现宿舍后边死了一条狗，就叫王文喜将狗吊在大工房上，剥了皮，煮熟了，人们分吃以后，相互奔告，大谈起吃狗肉的事。有的说：“狗肉比猪肉还香呢！太香啦！”有的说：“香是香，就是吃过后身上都发出狗腥味。”对肉的香味很有好评。

有的人听了以后有点眼红，就约找了几个人，下了夜班开始打狗。当时我也记不清是谁割的狗皮，闹的大工房里像是过年似的，大家都高高兴兴。不多一会，就听见有人因为分的生狗肉不均吵起架来了。经过一场激烈的口角，总算平息下来了。我记得同屋的李连成将分得的一块狗肉用两个碗合扣着，好像怕蒸发，放在高板上，弄得屋内腥臭味实在是够呛。当天下午两点钟，人们睡得正香甜的时候，不料汉奸“大褂李”带来了两个伪警察，狐假虎威、气势凶凶的来了。一进大工房，就大叫大喝：“谁他妈的放着生狗肉了？”还没等人们听清楚，“大褂李”用脚将门踢得山响，惊醒了同屋子熟睡的人们。大家目瞪口呆，不知道睡着觉又犯了什么错误。这时，“大褂李”拿棍子指着高板上的碗，那碗没有盖严露出了那块生狗肉。“大褂李”瞪得眼睛像牛眼一样大，大声喝道：“这是谁的狗肉？说！说！他妈的你们说！”说着，他用棍子指着我们，又说：“你们谁不说我就打……。”这时我和同屋的人一样，谁也不愿意说李连成的。就在这时，一
个姓张的工友，已被打得鬼叫一样。李连成走出来承認狗肉是自己的，他被“大褂李”毒打了一顿，强迫将碗和生肉一起扔进了茅坑里。别的屋里有人听到后，也慌慌张张把狗肉扔进茅房坑里去了。

“大褂李”走出去时还一边骂着说：“你們他媽的，不知道狗肉不衛生嗎？啊！他媽的我再告诉你們这帮臭工人弄狗肉，就打死你們，看你們誰敢！”汉奸们走了以后，我们都用憎恨的眼睛瞪着他們后影，咬牙切齿的罵道：“他妈的！狗肉不干净你們管，我們肚子餓你不管。我×你‘大褂李’的妈妈的，早晚讓你这个王八蛋，得不了好死！”

这回，什么也沒吃到，大伙又打了一场狗，还憋了一肚子的气。
朝不保夕

楊伯苗

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叔叔給“大樹李”送了禮物，我才來到興信紗廠穿管科當工人。以後，逢年過節，總得給“大樹李”和當兵的送禮拜年，就这样還是受流氓、打手和日本人打罵，使我最難忘的，是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事。那时，“大樹李”的外甥女也在穿管科，她平日依仗勢力，總和工友們打架，罵人，當時誰也不願找麻煩，只好“忍氣吞聲”。有一次她不幹活，工友說了她几句，她就放聲大哭起來。我正在布場修活，回来才知道这事，心想：“她這一哭，到家不知又會說些什么了，这个霉，不知要倒在誰的头上呢。”那时我和高玉霞兩個人都作指導工，正上白班。轉天一下班，我走到大門口，只見門前站了好多人，我正在納悶，忽听得一个女孩子喊道：“就是他。”我还没來的及回头，就从四面八方拥上来好多人，有的抓住我的前胸，有的抓住我的脖領子，有的用力捏住我的兩支胳膊。我听着男女的声音都有，嘴里还喊，
加劲打，打死这个野小子……。当时，我觉着我的后心，
我的嘴和脸，我的头上，落了无数的拳头和巴掌，木棍
子。我那件热天唯一的白布对襟小褂也被扯碎了，我的嘴
里流出了鲜血，嘴巴也肿了起来。我的头上起了无数大大小小
的疙瘩。我用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头，怕他们把我的两只
眼睛打坏。我横着心，咬着牙，一声没响，这些“寸地
王”们、流氓们、奸奸们，乱打了一阵，才放了手。本厂
的护厂狗——警长韩副官，把我带到工房内的警察所里，
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把门锁上，只打开了唯一的一个装着
铁棍的窗户，想跑都跑不掉。我突然变成了“犯罪”的人
了。我知道，他们都是一头儿的人，这是做了圈套了。
这个韩副官是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寸地王”的帮凶，就
好像不是个中国人，瞪着大眼，一脸横肉，用右手指着
我：“你这小子也不问一问，敢打我们的人，你还想干不
想干？饿你两天再说！”我一听，火直向上翻，我就想，为
什么打我呢？别人说“大将李”时我根本就没在场，就是
在场，也没犯什么罪。有势力的人就这么多不讲理吗？还
有穷人活的路吗？关了我足有两个馒头，多亏工房内的好
心肠的老大娘们的央求，才把我放了出来。从老大娘们
那里，听说高玉霞和我一样也被毒打了一顿，还推翻了高
玉霞父亲的小摊，非要赶出工房去。天黑下来了，我那善
良的母亲不放心我，迎到了杨庄子摆渡口等我。她看到我
这种情景，落下了眼泪说：“伯爹，你怎么叫人打的这个
样子，是不是惹了祸了？”我摇了摇头，没说什么，怕说丁
叫她难受。我和母亲到家不久，父亲就回来了。我一看，
父亲面色难看：脸色白的，一点血色没有，嘴唇发青。
原来是我被打的事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父亲连忙到“大褂
李”家求情，结果只遭到侮辱和恐吓。说我们是恩将仇报，
“吃水忘了挖井的人”。“要不是看在死鬼（指我死去的
叔叔）的面上就把你们都打跑了。”父亲学说的。
从此以后，我和父亲每天提心吊胆，总怕被打，被开
除。我父亲的精神越来越不好，饭量也逐渐减少，跟着又拉
开肚子了，这一来更吃不下东西，可是一个班也不敢歇。我
那身体强壮的父亲，连气带吓，一个月就起不来炕了。病没
有钱治，厂里根本不管。眼看着父亲要死了。父亲死前两天，
把我叫到面前说：“伯苗，你要好好学本事，爸爸这一生算完了，没立下业，对不起你们。你可别忘了给爸爸
出气呀，要给爸爸报仇……”我看着父亲鼓的那样高的肚
子，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样子，痛苦极了。爸爸是被生活逼
迫而死的。吃人的旧社会啊，哪一天才能让穷人翻身？走
什么路子可以叫穷人翻身呢，我要为父亲报仇，要为许许
多多活不下去的穷人找活路去。
我终于走了这条道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就参加了
红色工会，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积极投入斗争。
张瞎子与冯培如

杨芳洲

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我们纱厂有两个凶恶的封建把头，一个叫张瞎子，另一个叫冯培如。他俩对工人的手腕各有特点，一个是杀人不眨眼，一个是杀人不眨眼。

我先说一下杀人不眨眼。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钢丝有个叫张瞎子，他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让工人干活，他拿钱。他做什么呢？他做的工是花千子（铁棒）。他的工作地点就在钢丝十字路口一条街上。每天一过车要，花千子一拿，腰一叉，十字路口一站，好像过去的交通岗一样。三轮、自行车、行人等走错了一点路，他上去就是几棒。一天，有个推花卷的工友，这天是夜班，他白天到新中山街干活，晚上来上班，一天还吃不饱一顿饭。当然，人不是铁打的，就是浑身是铁，又能蹦多少次。他在夜里工作时，推着花卷车打了个盹，正走到十字路口哪儿，被张瞎子看见，走过去，“噢”的一声，叫了推车工一跳，张瞎子接着就打他两铁棒，并且嘴里骂着：“让你打盹！”工
友咬了咬牙，一顺一逆的把花卷推走了。正这时候，钢丝的日本人来到张瞎子跟前，嘴里咕噜地也不知说的什么，两个人笑哈哈走开了。隔几天，又有一个值车工友在清除时做的不够干净，被张瞎子查出，把袖子一卷，骂道：“你妈的！”拍，拍，就是两铁棒。工友问他：“你为什么打人呀？”张瞎子一听，就把眼眉一立，反问：“妈的，装傻，你看，扫的干净吗？”又是几铁棒。这个工友抱着脑袋一溜一溜的跑出门。总而言之，在那个吃人的社会，工人就不算个人。

国民党来了，这回可说“好了”吧？没有。张瞎子又依仗上彭道三。彭道三是伪工会的头子；张瞎子又压在工人头上，兴风作浪，经常和彭道三来往。在王老五被捕那天，张瞎子压制着工人，把海棠和钢丝之间的大门锁上，不叫进步工人从这跑掉。张瞎子胳膊缠着红布条，手提铁棒，亲手把住这个大门。结果，王老五走到这儿，没有过去，被国民党军阀捉走了。

另外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冯培如，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虽然打人不像张瞎子那样，他的手腕比张却不在以下，过年过节和上新工人，工人告退时，都得给他送礼物，要不然的话，就给你来个“眼里插棒锤”。比如，有的工人请假，告不下来，连被服和半月工资都不要了，才能跑出工房；有的工人给他买点茶叶和酒，就顺顺当当连被服带半月工资都可以拿到手。在那个时候，工人们根本一天吃不饱一顿饭，他家里却总是特号白面存着几袋。在车间，
他組織工人们搞互助会和存钱会，都是他当会长。结果这些钱都叫他扣起来了。后来他调到棉纱科，也用同样的手腕，来喝工人们的血。他在那个时候已四十多岁，可他说成三十多岁，骗娶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做老婆。

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他依靠了国民党的军官，更兴风作浪，利用军队压制工人和进步工会。在起初，孙世琥和刘永德刚想成立进步工会，就被冯培如知道了，他利用军队把孙世琥他们逮捕，押了一天一夜才出来。出来后，没过两三天，就是杨芳洲的事件。这个事件，主要是他的主意。

在进步工会成立前后，冯培如处处与进步工会为敌，工人们都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后来，进步工会成立了，才把他推倒，工人们才摆脱了他的压迫。
搜 腰

张金凤

一九四二年底，我到双喜纺厂穿络科工作，每天进厂就像进鬼门关一样。上班时得先把本子交到人事科，然后才能进厂。鬼子怕工人偷东西，出厂就更难了，如同监狱里的犯人一样，要经过几道关，才能出来。拿厂里（布场车间）来说吧，第一道设在工务科门口，第二道设在人事科门前，这里用几道铁栅栏挡住，有男女警卫和鬼子十多个人，工人们出厂时就得排成几条长龙似的，不管刮风下雨也得站在那里被他们从头搜到脚，还要把嘴张开。我第一天下班就遇到一个女警卫，不知她叫什么名字，只听人称她“韩太太”，挨到我这儿时，她像抓小鸡似的把我拉了过去，用手摸着我的下巴，叫我摇起脖子，解开腰带，脱了鞋子。当时，我心里很痛，恨不得过去给她一个嘴巴，但看那威风凛凛的鬼子站在那儿，不敢伸手，真是敢怒不敢言。

当时整理科也设了几道关，工人排成了几行到那里
等待被搜，如果有人偷了东西，那就算倒霉了，看这场热
堂过（挨打）吧。整理科就是“临时刑场”，到处是打声
骂声。

有一次我們下班了，排成了很长很长的队伍等待被
搜，忽然人事課的日本人清水鬼头鬼腦的伸了伸懶腰来到
队伍前，警衛們連忙搬了椅子讓他坐下。这时男女警衛忙
成了一团，好似准备上战场似的。搜腰开始了，离我前面五
人有一位大约十八、九岁女工，搜到她时，女警衛叫她
解开腰带，她不解，和女警衛争执起来，鬼子站起来走到
了那女工身边，亲自搜查，鬼子搜上身，女警衛搜下身。
那女工滿面通紅地解开了腰带，女警衛洋洋得意的从女工
裤子里将月经带拉了出来（这是用布布作的），鬼
子接过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另外一个女警衛便将那女工拉
到人事課小屋里去了。我站在窗外，只听得屋里劈拍劈拍
雨点似的打声，有很多工人們都流下了眼泪，有的悄悄罵
道：“難到他們家就沒有姐姐妹妹嗎，为什么这样残无人
道呢！”后来，我再也沒有见到那个女工。

我們每天下班等搜腰，就像过鬼門关。又有一次，在
一个女工身上搜出了一点钱，就叫她把衣服脱光，讓大家
看，有时誰站的腰不直，立不正，警衛就走过来随便打。
要是你脱衣服手脚慢一点，就打出队外，讓你干等着，全
厂走完了，得向警衛們鞠躬行礼說好話，他才叫你回去。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們都怀着强烈的仇恨，恨不得馬上把
鬼子打死、打死，讓我們不再受侮辱。
国民党来了，我们就失业了

刘👖生 口述

日本鬼子投降了。没过一个星期，国民党就派接收大员来到双喜纺织厂做接收工作。

马阎王是国民党派来的厂长。从他的外貌看来，高个儿，大胖子，秃顶，头戴一顶美国礼帽，竖头儿鼻子，老鼠眼睛，黄鼠狼嘴，长着几个像西瓜子的大牙，在鼻子下边留着两撮日本小胡子。看年纪大约有四十多岁，走起路来弯着个大肚子，左手拄着个“文明”棍，右手提着个“发洋财”的大皮包。看样子不像仁丹商标，倒像个傀儡。因为他为人阴险毒辣，工人们背地里都管他叫马阎王。他们到厂后，口口声声说什么要提高工人们的生活，要同心合意的为人民谋幸福，要建设新中国等等。他们把双喜纺织厂的牌匾也改了，叫什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五厂”。我心想这回可好了，纺织建设公司没问题今后准是还要大规模的进行纺织建设呀？！我认为，他们会给工人们带来幸福，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
新中国。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工人们的幻想，变成了梦想，希望也变成了失望。原来他们说的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嘴里说是天官赐福，可是肚子男整女囚。

他们都是带着把子来的，到处想混洋财，想把“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卖给资本家。他们实行了搜腰，还暗地里利用日本人干伤天害理的事。

工人每天要干十二小时的工作，可是所发的工资勉强能维持一两口人的生活。工人终日还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特别是他们仅来了半月的光景，就把我和赵宏富、何洪宽等五、六十个人给遣散了。究竟为什么要解雇我们？究竟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解雇时只给了我们每人两匹布，我们不干，经一再的找他们要，才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匹。我们被解雇之后，有的人由于伤心难过思了重病，有的人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不得不做点小
生意，也有的人流浪在街头进行讨要。唉！说鬼子毒辣，他们要比鬼子毒辣的多，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倒失业了，连饭都吃不上了。唉！别说了，越说越伤心，在那时我们真把他们恨透了，就是割了他们的皮吃了他们的肉也解不了气！后来我们才明白了，原来解雇我们，是为了他们吃空名子。

我们失业以后，激起了没有失业工人们的情绪，他们把愤怒化为力量，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向他们进行斗争。经过了流血牺牲坚强的斗争，最后工人终于取得了胜利。后人有诗为证：

日寇时期苦难熬，
幻想将来能改朝。
盼望来了国民党，
心想生活能提高。
哪知走了一狗来一狼，
工人生活更悲伤。
七天显形赛日寇，
半月未过失业了。
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落，
接收大员们肥了己腰包。

（王振江 整理）
大哥的死

陶景海 口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們胜利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传到紡厂。当时，我們在車間干活的工人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满心以为，这回再也不受日本鬼子的欺侮和压榨了，所以立刻都关了車停止了生产，到市中心、东馬路一带去欢迎“国军”，一直到深夜才回来，高兴的连累、饿都忘了。

可是，对国民党的天真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們，日夜乘飞机来到了天津，大力勒索工人的血汗，并侵吞了工人和日本斗争得来的解散费（三匹布），抠扣了工人的面粉差額金，他們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为了进一步勒索工人和镇压工人，很快组成了伪工会。

我們全家三口人仍然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生活，而且又受“国军”和伪工会“流氓打手”的欺压。

大哥陶景貴，外号叫陶傻子，在布场織布，全厂没有一个不認識他的。大个子，长方臉。誰提起来都说： “陶
傻子这个人啊，真是不爱说，不爱道，老实八家，干起活从来也不知什么是泡蘑菇。”尽管如此，他也是经常受把头和流氓的欺负。

有一次我哥哥上厕所，路过穿净科：当时因他正专着肺病，病的很严重，一咳嗽就喘不出气来，他正走到这里，再也不能前走了，蹲下来就咳嗽，正咳嗽的上气接不上下气，旁边过来一个矮个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白袄袖子往上卷着，走过来就骑在我哥哥身上，这个人就是伪工会的流氓打手“刘八”。他骑在我哥哥身上，让我哥哥驮着他往前走。这时，我哥哥浑身哆嗦成一团，勉强地说：“八哥，你这是干嘛？我快出不来气了，你可稀可稀我吧，别骑我了。” 刘八在上面狠毒地说：“看他妈的你这个松样子，活着干吗，我把你弄死就算了。”这时，布场工人张见秋路过这里，看见这情况，气愤地问：“看，他这样儿你还欺负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刘八霍地从我哥哥身上站起来，小眼珠凸溜溜的像要滚出眼眶来，吼叫的声音震的地板乱颤：“他妈的，你跟八爷我姓任。”说着照着张见秋的脸上就是几个大嘴巴……

哥哥走几步，爬几步地回到家里，一肚子的冤气不敢跟母亲说，一进屋哗的一声大哭起来，一直哭个不停。妈妈泪水满脸的搂着哥哥，问他：“说吧，儿呀！妈不生气，说吧……” 可是他就就是不肯说。当夜里，哥 哥 作梦了，不知他那来的一股邪劲，一边哭嚎着，一边比划着：“小刘八，你跑不了，我就是死了，到阴曹地府也得和你
算清这笔账！”妈妈听到这里，才知道哥哥原来是受了流氓打手小刘八的欺负了。

哥哥这口气出不来，病越来越重了。请先生治吧，当时就得拿出五千元来。连吃的都没有，哪有这笔钱来治病呢？这时候哥哥很怕自己死去，他还希望着自己能有那么一天过着幸福的生活。便对妈妈说：“工会成立的时候，对工人说过，‘工会是为大伙办事的’，咱找工会借借去。”妈妈架着哥哥走两步歇三步地找到伪工会主席张树发的家里，正好，张树发在家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大吃八喝呢。哥哥一进门，张树发不耐烦地问道：“干什么来了？快滚！快滚！”哥哥就哀求地说：“张先生，我的病不得了啦，想麻煩麻煩您，借点钱治治。”张树发怕打搅他们大吃八喝，就推托地说：“你们回去吧，明天到工会去。”这天钱没借到，妈妈又架着哥哥失望地回来了。

第二天，又到伪工会去，伪代表郑大福正在工会里，没等哥哥开口就气汹汹地问：“穷光蛋，干什么来了？”哥哥答道：“郑先生，借点钱治治。昨天，张主席叫我今天到工会来的。”郑大福态度奸诈的说：“你借多少钱呢？”哥哥说：“有五千元就可以治好了。”郑大福说：“借五千元——你够花的吗？多会还呢？”哥哥说：“够治的了，病好了，上班一定还。”郑大福说：“你死了怎么办？快回去吧！借钱，哼，没门！快走！滚出去！”说着就把妈妈和哥哥推出伪工会门口来。这时哥哥的脸色跟死人一样了，坐在门口也起不来了，过了一会儿才
說:“你……你……走狗!……”媽媽在一邊怕哥哥氣個好歹
的，就勸哥哥:“孩子，跟媽回吧!你別生氣了，咱娘倆把
這事牢牢記在心里就是了。”說着就架着哥哥回家了。

回到家里，哥哥一頭栽在炕上說:“可把我氣死了，
我死也要把小劉八和工會這伙狗東西拿走。”這話剛落音，
哥哥就不能動彈了，過了一会，哥哥又突然坐起來了，胸
肺一鼓，噴出了大口鮮血。媽咪和我急忙扶住，誰知他好
像被誰猛然用力一推，來不及掙扎就倒下去了，口里流
著粘糊糊的血，兩只手還想動彈，好像抓住什么，然而他
什么也得不到了，哥哥就这样地一一悽慘地死去了。

媽媽連着經過我父親，我二哥的死，一看大 哥 又死
了，就哭着喊我:“兒呀! 萬們娘倆也等死吧!咱也會被这
个吃人的社會吃了的。” 媽媽說完，哭得昏過去了……。

(李余庆 整理)

[附] 我們的工 廠是怎 么建起来的

白 波

在一九二〇年前后，我們正处在軍閥當權的時代，日本
鬼子的経濟魔爪，在此時逐漸地伸到我国各地，天津已經有
了日本租界。可是日本人並不滿意他們已掠奪到手的那一
小塊地方，那些日本的大資本家，貪心如狼似虎，都打算在
我国开办工 廠，好利用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来養肥他們。当
时，日本纺织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在世界上可以与英国争霸了。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展他们的纺织工业，一方面利用不平等条约和走私偷运等方法，使他们的纱布倾销我国市场，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设法在我国投资，买地建厂，从而挤垮我国资本家开设的那些小得可怜的纺织厂。这时候，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列强国家视我国为他们共同的侵略目标，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还不够充足，所以有些事情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我国的军阀政府呢，却害怕人民的反抗，同时还有着被揭穿的假面目，勉勉强强地执行着“外国人除租界地外不能在中国私自买地”的法令。但实际上，日本人的投资仍然是蜂拥而入。他们会找出中国人来作幌子，专门收买一些唯利是图，贪小惠而忘大义甘心为他们工作的分子。国营天津第五棉纺厂的前身“双喜纺织株式会社”的地基，就是这样被日本人买到手的。

在一九二〇年，海河东岸郑庄子已经建立了两个纺织厂，就是现在国营天津第三棉纺厂的前身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这两个纱厂都是中国资本家集资建立的。日本资本家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便将靠那两个纱厂东面的一片菜园子买了下来。买地时通过一个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庄景柯的手。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是当时的律师，买地就是用庄公馆的名义。当时，按照一般情况，这里的土地每亩只值一百余元，最多也不过是二百元现洋，可是这个庄公馆买地却肯出大价钱，以每亩五百元的高价收买，共买了约四百五
十多亩地买了后，当时情况不能允许即刻建厂，便以较低的租价租给外乡来天津的农民种，租约上比别人的多一个条件，就是注居庄公馆无论什么时候要地，都得立刻交还土地。庄公馆的代理人，就是郑家庄的住户孙连城。直到1935年秋末冬初才开始建厂。

一九三五年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和冀东大部地区，肆无忌惮地侵入我国华北来了。他们在我国各地盖起大批工厂。郑家庄中国资本家开设的两个纱厂，也先后被他们吞并过去。并且还在郑家庄建立了一个华北制铁所（天津钢铁厂的前身）。在当年阴历九月的光景，郑家庄来了几个陌生的日本人找孙连城。通过庄公馆的指示，孙连城陪同他们仔细察看了附近的地形。这几个日本人就是未来纺织厂的主要人物，他们是：

林一正 （双喜纺织株式会社天津经理）
竹内 （双喜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工厂厂长）
川上野 （日本包工商前高组合的职员）

第二天，以林一正出名请孙连城在南市鹿鸣春饭庄子吃蒸。并有一个中国人作陪，充当翻译。席上，林一正谈说现在就要把地收回盖工厂，与孙连城商议如何办理。商议结果，由孙连城出头与佃户们交涉收地。经孙连城从中交涉，日本人拿出一些钱作为收地费，地就很快的交给了工厂。这样，日本人就名正言顺地将这块土地作为日本资本家开办工厂的地基了。
地收回来后，建厂工作开始了。那个建筑包商前高
组合的日本人上野，便带人开始测量，一方面招募工人，开
始平填厂基。取土的方法是就地取土，把较高处的土足足
剖平下去三尺深。这就是造成我厂房基地势低洼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时，厂房正盖得一半，当时曾
经停了一个短短的时期，以后就比以前迅速地修盖起来了。
同时，厂东侧的职员宿舍和厂西北面的工人宿舍也相继
盖起来。都是日本建筑承包商前高组合转向给福昌公司，
由上野负责着数千名中国工人修盖起来的。与此同时，机
器也陆续从日本运来，并从日本来了一批日本工程技术人
员，工厂里也招雇了一中国工人来帮助日本人按装机器。工
厂里的人事和组织机构也逐渐确定了。负责人都是日本人。
计有砂厂主任酒井，布场主任原勇，原动部主 任 加
藤，人事课主任葛马等人。同时也招雇了一些中国人作他
们的低级职员，名义上却是工人，作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秋季正式开工，开工后三天，海河泛滥成
灾，把整个工厂仓库都淹了。机器电线全都泡在水中。当
时，日本人看见大水涨得眼看就淹没了厂子，非常着急，
强迫着工人挡紧防水，昼夜不停，结果也没有抢救成功。

水把工厂泡了二十多天。水退后，工厂经过一番修理，才
算正式开工。

当时，厂内的设备规模较小，共有纱锭两万多枚，普
通布机七百台。工厂有厂房一座，分南场北场各半，南布
北纱，由甬道相隔。另设配电室锅炉房及修理工厂，和工
厂隔路相对。靠外有倉庫二十四所，分儲原棉、成品和機物廢料。辦公室三所，靠廠門為人事課，中為總辦公室，
靠工場的一所為工務辦公室。廠門東面為職員宿舍，共有樓房三十二所，平房十六所，全為日本籍職員居住。四級。
西面工人宿舍五百九十間，分單身和家庭宿舍兩種，家庭
宿舍三種，中國管理人和工頭也只能住这里的一等房子。

工 廠 沒 有 發 电 設 備，只有125 KVA 3300V 的小型柴油
發電機一座，預備在電業局停電時供廠內照明和防火用。
另 有 B&W 臥式水管鍋爐兩座，供浦紗用汽和工場暖氣設
備用。

當时的生產情況很不正常，工人生活沒有保障，流動
性很大，幾乎每天都開不齊車，到一九四五年生產改為一
班，產量更是下降很多，最高產量每天（兩班）約產紗20
件，布 200 匹。到一九四五年夏，每天只產紗五、六件，
布百餘匹的樣子。

當时有日本籍職員數十人，中國工人約千余人。

日本投降后，國民黨經濟部接收了这个工廠，以后又
成立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把全國各處的日本紡織厂都由
該公司經營管理。雙喜紗厂就改为天津分公司所屬的第五
棉紡織厂了。

國民党接收了这个工廠以后，生產的設備并 沒 有 增
添，工人的生活仍然是艱難困苦，仍然受着嚴重的剝削和
壓迫。國民党和封建把頭勾結在一起，代替了日本帝國主
義者及其爪牙來欺壓工人。于是，轟轟烈烈的斗争就在工
厂里开展起来了。

国民党由一九四五年秋末接收，迟迟不能开工。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开工生产。原棉大部使用美棉。日开两班，工人比日本时期略有增加，约一千五百多人。职员均为中国人，由天津分公司领导。厂长为工厂首长，下设纺工工程师，布场工程师各一人，纱、布场保全技师各一人，运转技师各二人，分别带班生产。下设技术员若干人领导生产。经营管理部分共设三课：人事、会计、总务。总务课又分秘书股、物料股，和庶务、警卫队等部分。并有医疗室，设医生一人，护士二人。

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工厂生产也还没有什么发展，大致和日本时期差不多。并且因解放战争关系，农村大部成为解放区，美军又将棉花改成武器，所以原棉非常缺乏。到一九四八年，每星期只能开三天或四天工。生产能力很低，按正常的生产情况计算，每天产量棉纱为15050磅左右，还不到四十件纱。布场日产量为800匹上下。（按当时40码为一匹计算）

只有解放后，我厂的生产设备才大量增添，工作条件大量改善，从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成为蓬勃发展的、一日千里的人民的工厂。
第二輯

黨領導我們鬥爭
扎根

张家福

一九四四年的九月初，我从冀中抗日根据地十分区学习回津，第二天早晨楚云同志就找到了我。我把去十分区学习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把他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开会的情况谈了一些，说：“我们今后再也不是党的外围关系了，从此我们直接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领导，我们会今后是天津地下党组织的一部分。”我由楚云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作好抗日大反攻的准备工作，根据党加强城市工人工作的指示，楚云同志指示我不要再回公大七厂工作了，叫我到天津市海河两岸上的工厂里找工作。根据楚云同志的指示，我在一九四四年的九月十五日，通过双喜纱厂看厕所的女工王大娘的介绍，在郑庄子双喜纱厂上工了。我才去时，验的是布场，后来他们知道我在别的纱厂干过，又认识几个字，就派我到纱厂试验室作检验工去了。我去双喜纱厂时还带了两个红色群众，一个是曹美福，一个是曹家驹，他俩是姐弟，姐姐十八岁，弟弟十六岁。姐
姐作了工务科的雇员，弟弟在原动部学电工。为了隐蔽，我们三个都改了名字，我改成“张家樑”，是代表我们三人的原名，曹著铭改成“曹鳴平”，曹家驹改成“曹鳴鈞”。我们三个人组织了一个小组，我是组长。根据党的指示打入工厂后的任务是：（1）首先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通过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了解敌人与中国雇员、佣雇的情况（因那时没有中国职员），以及工头和工人跟他们关系怎样；（2）了解广大群众的呼声和要求；（3）针对具体情况对工人群众进行宣傳和教育工作，并且有重点地培养工人党员，待条件具备时，吸收入党。根据这些指示，我把我们三个人做了具体分工，我分的是纱场、布场，曹鳴平分的是外三部的中国雇员人员及工人、工头等，特别是对妇女做为接近的重点。曹鳴鈞除了包干原动部以外，还重点联系大工房的男单身工人。我们为了在双喜纱厂扎下根子，将小曹的家搬到工房住（工人的家庭宿舍）。他们还把工人也送进了所做的厕所的小工。我也搬到女单身宿舍住了。

十二月间，为了加强双喜纱厂的工作，又派来了两个学生党员：陈小兰和张露华。我们三人组织了一个临时支部，支部是陈小兰。过了两、三个月，因为有些暴露，他们二人就撤走了。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在双喜纱厂发展了第一个党员，馬潤华。她是廿五、六岁的織布挡车工。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发现了纱场的老技工楊恩太是老裕大纱厂的工
人，接受过党的教育，参加过“砸裕大”的罢工斗争，近来表现也很好，但是因我当时还太幼稚，就把他介绍给楚云同志，由楚云同志吸收他入了党。其后小曹姐弟两个人也入党了，由我负责支会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党调马润华、杨恩来、曹鸣锐去北岳区根据地学习，日本投降后他们回天津又在五厂工作了。

在日本投降期间，又发展了修理厂的青年老车工刘增祥，刘增祥同志虽然年纪才二十二岁，但是他在修理场已经是十年工龄的老师傅了。自入党后工作特别积极，斗争意志也很坚强。在男工当中很有威信。刘增祥同志入党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布场和纱厂的前纱部发展了十几个党员，都是二十多岁，工龄五年以上的男挡车工、修理工、保全工等，为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公开领导工人斗争后，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的大部分是刘增祥同志负责的。

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除职员中没有党员外，双喜纱厂的各个生产部门都有了党的小组或个别党员；特别是要害部门，都有党的小组，如织布场有两个党的小组，纱场一个，原动电气一个。这些党员都在各个部门起着核心领导作用，再加上围绕着支部的赤色群众，就掌握了双喜纱厂的各个部门。这些党员和党的组织，就是后来多次领导群众斗争和不断取得胜利的核心力量。
反搜腰

张家福口述

一九四五年的年初，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日本鬼子怕工人偷东西出去卖了过年，就加紧对工人搜腰。有一天下班，鬼子突然挂着大刀把住了车间的二道门，把下班的女工截住，让男日本人来搜查女工。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谁也没想到，走在夹里的一些女工们，只得忍受着羞辱让日本人乱摸。

可是，敌人愈来的欺负人了，他们无耻地把女工身上的月经带子从裤裆里拉了出来，当场取笑女工。站在车间头道门那儿等着检查的女工立刻愤怒地骂了起来：

“咱俩真受欺侮哪，多寒伤哪，连‘大马’也给人家拉出来啦！”

顿时，从头道门直通二道门的过道里，响起了一片狠狠的咒骂声。等候着的女工们一个个横眉瞪眼，气得直骂，叫骂的声音响成了一片。

在这当儿，站在女工队伍里的地下党员陈小兰再也忍
受不住，她本是一个高中的学生，自从党组织派她到厂以后，从学生转为工人，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干活儿以及生活上的一切艰苦她都可以忍受，就是一直受不了这种野蛮的侮辱。鬼子统治时期，女工比男工的痛苦更深，不光是要和饥饿贫困挣扎，还得时刻遭受侮辱。车间里，女工干着活，当头儿的在身边走来走去，可以随便摸女工的脸蛋儿，可以到女工身上捏一把摸一下，谁要是反抗，干脆就挨一顿毒打。上厕所，也是提心吊胆，男日本人随时都能闯进来看管；回家的路上，还有流氓狗腿子劫道。日子真没法儿过。但最不能忍受的还是每天下夜班时的搜腰，出车间要被搜三次，女工们不仅是张开嘴巴，解开衣服，脱下袜子，连裤子也得解开，一个个提着裤腰等候搜查。有时，搜查人搜查，旁边的伪军和日本鬼子还乘机乱摸女工的下身。为了吃几个窝窝头，为了活命，女工们含着忍辱，把眼泪吞到肚里。可是，谁料到鬼子又出了这么个新花招，换来了男搜腰的。这一下，大家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陈小青就立刻找到我商量，两人离开了吵闹的人群，研究怎么样组织工人进行反抗。这时，我从工人喧闹的喊声中听到一个声音：

“咱别出去，多尝点哪，咱不是人哪！” 显然，过道里有的工人已经开始了自发的斗争。

“对，咱赶快组织大伙儿，一个也不出去！” 我说。

接着，我俩就分头串通积极分子，找到细纱车间的孙
士荣、田宝珍和孙秀珍，准备车间的翟淑珍，布场的马润华等，通过他们发动女工一个也别出门，抗拒敌人的搜查。

不一会儿，细纱车间的门前就出现了女工孙秀珍，她带领着一帮子女工齐声喊道：
“咱们要齐心哪，大家都别出去！”

有些刚从乡里来上工的，还是不齐心，陆续有走出去的。女工孙士荣着急了，她也高声地喊：
“谁还出去？谁出去，谁就是日本的小老婆子，不要脸的就出去！”

跟孙士荣站在一块的女工也跟着她喊：
“大伙儿齐心哪，咱都别出去哪，太欺侮咱们啦！”

这么一喊，细纱车间的女工都不出去了。这时，准备车间和布场的女工也已组织起来，女工们全挤在车间里外的过道上，一个也不出去。六点下的班，僵持了两个钟点，到八点多钟，日本鬼子眼看没办法，只得把女搜腰的找了来，初次斗争就胜利了。

这次斗争虽然组织不严密，还缺乏斗争经验和方法，可是作用十分巨大。工人们通过这次斗争，明白了“大家齐心力量大”的真理，积极分子在这次斗争中也得到了考验。这次小小的斗争为后来国民党时期大规模斗争发出了信号。反抗的怒火，在不愿被污辱，不愿被压迫的人们中间点燃起来。

（写作组 整理）
推翻伪工会

一“走‘爹’来了‘爷’”

张家振 口述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点，正式宣布日本投降了，裕大纱厂的工人立刻罢工，跟厂里的日本鬼子算账。到下午四点光景，离裕大百步远的双喜纱厂工人也就自发地罢工了，复仇与要求自由的火熊熊地燃遍了郑庄子，工人们关了车，欣喜地欢呼着奔出车间。腰板直了，头也昂起来了。“再不当亡国奴了！”厂里厂外只听得一片惊喜的呼喊声。

欣喜过后，八年中对日本鬼子的深切仇恨燃腾起来，到处充满了热烈的咒骂和激昂的呼喊。

“跟鬼子算账去，跟他们算账！”

“咱们受了多少年压迫，妈的，算账，跟他们拼杀呀！”

复仇的呼喊从厂里直响到郑庄子街道上，人们耳边隆隆听得一片轰轰轰着仇恨的喊打声，八年来积下的深仇大恨到了清算的时候。这时，郑庄子街道两旁站满了工人们，一见日本鬼子走过，就揪住了死劲的揍，有的工人就地拾起
石子几朝日本人的脑袋砍，厂里的汽车拉过什么，工人們就拦住一分而光，棉花，布匹，面粉都分了，厂里停工了。

工人們到处瞧着，互相談論和揣測将要来到的新生活，他們做着美丽的梦，想像着中国军队入城以后，立刻就可以为工人报仇。

“厂里得发遣散费！”有的工人提议，工人們就派代表与厂方交涉，日本鬼子早吓得魂不附体，立刻答应要求，给每个工人发下两匹布。工人們把布卖了，又幻想着中国军队一到，再也不用愁吃愁穿了。

当时，党的指示是：一、組織工人护厂，里应外合，迎接八路軍入城；二、組織红色工会。党就在工人中间宣传：八路軍快入城了，工人們就要当家作主人了。工人們一听，情绪高涨，有的就立刻研究工人怎么样自个儿管理工厂，大家都日日夜夜期待八路軍快来。

誰也没有料到，一天，插着美国星条旗的軍艦突然开进了海河。厂里的工人听后，纷纷爬上墙去观看，只见軍艦在河上航行，头顶上大队的美国飞机也嗡嗡地飞了过去。工人們揪心起来：怎么八路軍没有进来，倒是美国鬼子来了！不几天，国民党把日本統治时期的汉奸白胖子軍护路队改編了一下，开进了双喜紗厂。工人們火热的心被泼了一瓢冷水，心里万分的納闷。

接着，蒋介石下令，不准中国人再毆打日本人；工厂暂时还原个儿的归日本人管。厂里的日本鬼子一下子又威風起来，工人們气得大罵，美丽的梦想开始幻灭了。
这时，工人们分到的两匹布早给投机商人用低价买走，没有了，就要求复工。党根据群众的要求，就通过党员认为和工中的积极分子孙玉祥、孙秀珍等在群众中活动，组织群众推选代表，向敌人交涉复工。如果厂里不答应复工，就要求给每个工人发五匹布。

正在混乱时，国民党的所谓地下党员纷纷露面了。汪派国国民党内拥身一变，汉奸李玉祥出来当了国民党八区党部书记（双喜纬绸厂所在地郑庄子当时属八区管）。厂里的封建把头徐培如、王梦符等参加了天津市工职救济委员会，成立里分了分会，由李玉祥主持，准备筹建工会。

这时，天津国民党市党部搞工运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徐鼠田、孙秀山为首，组织了天津市工职救济委员会，由市党部主委时子周支持。这一派手下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地痞和日本时期的宪兵等。日本一投降，他们摇身一变，以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面貌出现，所以在各工厂占了上风，加以在本地有势力，因而立刻当了权。当时郑庄子的八区党部书记李玉祥，双喜纬绸厂的徐培如，王梦符等是这派。另一派以于宝璜为首，组织成天津市各业工会联合会。于宝璜本人是工贼出身，日本投降后从国民党大后方中央派来，手下联系的人也大多是工贼，但这时实力不够，正企图在各大工厂插足，扩充势力。两派自称为工职派与工联派。当工职派徐培如等在双喜厂内筹组工会的时候，工联派也委派了于宝钧、刘世泽、朱洪年等到厂里活动，组织了纠察队，也积极准备筹组工会。
工人们向厂方要求复工时，工联派孙宝鈞就出来向大家买好，答应由他去向厂方交涉，每人给五匹布，要工人代表回去，等着听他的信儿。不料第二天厂方不答应，国民党一下子就显出了他的面目，工人們氣愤地重新选派代表进厂跟日本人交涉，要求发六匹。厂里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和日本人都不同意。工人們大怒，集合到经济部去請願。沒有达到目的，又派代表到天津国民党市党部去要求，这时市党部就由堂宝璜出面解决，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第二天，工人們分到了布。可是厂里的工职派冯培如趁火打劫，把群众斗争的功劳都拉在他们身上，厚颜无耻的对工人說：“今后有什么事，好商量。”从此，斗争走上更加复杂的道路，工人們也开始觉醒，知道从前想报仇、想管理工厂、想不敢吃不敢穿等等只是梦想，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工人们只有斗争才能活下去。

十月，开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把日本人替回去，工职派把工联派的人从厂里打跑，把朱洪年的腿都打断了，冯培如等换上了长袍马褂自封了工会理事，筹組了伪工会。他们在工房头排屋子里設下了办公室。八区党部自从成立后也开始到厂里来发展了四十多名国民党員，甚至找了我們地下党组织的党支書张家樞、支委曹曉平、红色群众藏淑珍等，要她们加入。敌人碰了钉子，就对这些人怀疑和注意起来。这时国民党的党、军、工、政四位一体勾结在一起，開始对工人进行压迫与剝削。
我們党的組織，这时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国共谈判还在拖延，党便指示厂里地下党組織繼續建党。曹鳴鍾、馬鴻華、楊恩太等党员从抗日根据地学习回厂后，本来准备迎接八路军入城，参加接收，这时，就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共产党与国民党怎么样不同，不断揭發国民党的罪恶。工人們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緒愈来愈大了。从此党领导工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写作组 整理）

二 工人秘密自治团

张家楣、曹鳴鍾 口述

开工以后，国民党军队天天扛着枪進車間巡逻，监督工人生产。这些驻厂的军队，原都是敌伪时期的汉奸白脖軍，这时又骑在工人的脖子上头鎮压工人了。他們任意在車間里調戏女工，工人們不满極了。国民党又收买了一些封建把头和職员加緊統治工人。伪工会不但不管工人們的利益，反倒与厂方勾結着剝扣了工人的救济面粉，贪污了停业后没有上班的工人造散費，共二百七十万元；又收集厂里的东西变成他們自己的，把厂里的凳子卖了算自己的錢。他們吃喝嫖赌，一点也不给工人办事。工人們在日本投降后要求自由，要求吃饱穿暖，自个管理工厂的希望一个也没有实现，日子倒反比日本时期更难熬了。于是，人
們常常在一塊兒議論，發泄着胸中的憤憤與不滿。紗場試驗室很快就成為了全廠談論國事的中心所在，一天到晚經常聚集了許多的人。有在這兒罵街的，罵日本，罵蔣介石國民黨，罵偽工会。有的發牢騷，有的到这儿來送新消息，有的到这儿来听新聞。

人来人往，有工頭們，有工頭技工，小加油工，保全工，修机工。而試驗室的檢驗工孫世琨就是他們这群人中间的核心人物。

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孙世琨，长着一对乌黑闪光溜圆的眼睛，见人总是笑眯眯的，眉宇间露出精明能干倔强的神色，使人乍一看就看出来是个有能耐的人。他初到试验室时，日本还没有投降，在一般人的眼里，他爱讲究穿着，爱打球，爱喝点酒，还挺爱干净，倒像是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没经过大风大浪的青年。其实，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做工了。日本統治时期，他怎么卖命的干也养不活娘和弟弟、妹
妹，就不见常常从厂里偷点东西卖了凑和过活。因此，一连好几个厂他都挨过日本鬼子的毒打。有时，他母亲在家里等他回家，见别的孩子都回来了，就到处去打听。人们才告诉她：“你家孩子捆在树上呢。”

鬼子的鞭子正在抽打孙世琚，而家里的母亲，心里也仿佛被鞭子抽着似的一阵阵痛。终于，贫困与饥饿逼得他走投无路，卖了华工。那年头，当华工的都是九死一生，少有活着回来的，孙世琚向母亲磕头告辞，他含着眼泪离开了母亲，不知自己还能否活着见到自己的亲人。他怀着痛苦，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到了塘沽。苦役、鞭打，饥饿，疾病，这就是华工的生活。他最后逃出了虎口，在塘沽混了一阵，从塘沽逃回天津，不久，日本就投降了。

他激动地跳着喊着，他热情地期待着中国军队赶快进城，他憋着一颗子的仇恨等着复仇。他也梦想着中国军队一到，工人就可以吃饱穿暖，没想到，国民党蒋介石下了命令，工厂暂时还归日本人管，中国人不准捣打日本人。他气得在试验室里大骂大喊，人们看他整天精神不正常，有的人就叫他“神经”，以为他有些精神病了。其实他是满腔的仇恨没法抑制下去。这时，日本总工程师九井还到试验室来检查工作，孙世琚气得捏紧了拳头，咬着牙说：“妈，你还在我中国人面前站着哪，中国人是这个了！”他竖起大拇指，狠狠地说，“你还来管哪。”

“我们现在是失败了。”九井说，还想要检查工作。孙世琚气得大声喊道：“你们日本败了，小小的了，你们
侵略我們這些年，吃了喝了很多的，我們中國的軍隊來了，你还想管我們！”說着，上去就是一耳光，打得總工程師直撲後退，慌張地跑出試驗室去了。

这时，屋子里只有女檢驗工，地下党支部書記張家樑同志。孫世琚的民族意識、愛國心，引起了她的注意。隔不多天，聽說孫世琚到市里又在街上揪住了一个当年打过他的日本鬼子死命的揍了一頓，泄了一下当亡國奴时代的仇恨。

当时，紡場里的日本工头还没有回去，可是一見到孫世琚就悄悄儿溜远了。紡場的日本保全工 头 外 号 叫“蛤蟆”的，一見張家樑就悄悄的伸出了兩個手指說：“孫世琚，是这个，八路八路！”說着，見孫世琚氣沖沖的捏着兩個拳头，走了进来，蛤蟆就吓得輕手輕脚地溜出去了。

報紙完全吸引住了孫世琚，他常常拿着进步報紙来回的看，看完了就和四周的人議論，成天焦躁得好像得了神經病的人似的。当时，國民党已經下令命令不准人民談論國事，孫世琚哪儿管这个，他就要談，他怎么能不談呢？他肚子里对許許多多事都打了問号：第一，为什么中國軍隊来了，工人不能报仇？第二，为什么中國軍隊来了，工人还是要挨饿，日子过的不好？第三，出了日本，怎么中國軍队又引进了美国鬼子，吉普車到处在闖禍……，一連串、一連串的問題使他不能不想，想了不能不激动，激動了就大聲談論，連試驗室的工头殷樹昆也没法禁止他不談。

張家樑就開始對孫世琚做一些試探性的 工 作。有一天，她对孫世琚說：“現在，聽說共産黨在城市里也出了
报纸，劝业场那儿有人卖解放报呢。”第二天，孙世琚就把“解放报”买来了，大声在屋里念。看来，小伙子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害怕，什么叫秘密，这人就是有个追求真理的劲儿。一念“解放报”，到试验室里来的人就更多了，念完了就都议论纷纷。

党的地下组织对孙世琚的社会关系开始进行了解，知道他本人还单纯，对旧社会不满。自从地下党员贺佩英领导工人要求复工胜利后，孙世琚也有了深刻的印象，想要出来为大伙办事。于是，党派曹鸣平去与他联系，进行工作，把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讲给他听。张家桢在工作之余时间，也顺便通过报纸上的消息和他聊天，向他宣传八路军共产党怎么样抗日，美国和苏联究竟是怎么回事，大革命时是怎么个情形。逐渐地，孙世琚从单纯的不满与仇恨开始有了觉悟。

“工人受压迫，受穷，不是命苦。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就能不受穷，不受压迫。”孙世琚的心里像雨过天晴一样，找到了真理，烦恼与苦恼一下子驱散了。他来回的想着：怎么才能团结起来斗争呢？

十一月，敌人方面传出了消息，准备让工人选举工会，可是伪工会筹备会方面早已把名单弄好，要叫工人选举封建把头冯培如、王梦符、刘庆奎等。同事们得到了这消息，又都纷纷到试验室里来议论。

有的说：“要是选上这几个人当工会的人，咱工人更得遭殃了！”

有的说：“咱们团结起来，自个儿办，他们不是要选
大伙七嘴八舌商量办法，劲儿很大。张文帐就把孙世琚叫到一边，说：“我們立刻开一个秘密会議，找可靠的人一塊儿研究，怎么样？”

孙世琚正在劲头上，立刻就召集了二十来个人，在试验室后边的小屋里开会。其中有些人是对伪工会不满的工友，有纱厂的徐鸣和，钢丝的工头彭道三等，孙世琚出面主持會議。大家研究结果，决定不能把冯培如选进工会，可以利用王梦符。又討論了选举的时候，大伙怎么样分头下去串通叫工人们不选。到了晚上，二十来个人就又到彭道三家里繼續开会商量对付的办法。

彭道三家的小屋里，炕上，被上，桌上，地下，坐的站的挤满了屋子人。有人把被单蒙住窗子，在黑色防空罩蒙住的灯光下开始了討論。当下，大家精神兴奋、紧张，孙世琚就根据了党的意图向大家提出成立“工人秘密自治
团”，大伙团结起来，为工人办事，和伪工会斗争。孙世瑜当时穿一身黑布制服，戴着一顶草绿色的日本式小帽子，坐在炕桌边领着大伙讨论。大伙一边研究，他一边起草，连夜把工人秘密自治团的章程、宗旨、发展人的办法都拟订好了。大家严肃地通过以后，决定由孙世瑜、刘永德、彭道三、曹鸣钟等筹备组织自治团。晚上，弄委以后，第二天，孙世瑜就把发动工人参加的签名单交给了女工齐淑花等分头到车间发动工人参加。为了防备敌人察觉后引起麻烦，签名单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凡愿意参加的人就沿着圆圈写上自己的名字，盖上手印，使敌人无法找出谁是引头的人。党组织就通过地下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发动群众踊跃参加。打轴科的积极分子翟淑珍，团结了一部分群众，立刻就参加了。第一天，就有二、三百工人参加了工人秘密自治团。孙世瑜素来胆大，不防备敌人，自己便公开的在工人中间活动。参加了自治团的工人们一个个情绪高昂，感到了团结一心的力量。

到晚上，筹备人又在彭道三家中开会，酝酿工会选举时该选那些人。不料，工头彭道三这时胆怯了，他见工人们那么踊跃的参加自治团，就害怕事儿闹得太大要拆毁，连夜把事情密告冯培如，出卖了自治团的人，自己投降了。

第二天早晨，孙世瑜、齐淑花等上班以后，刚走到车间门口，驻厂军队上来就把他们逮捕了，说这些人偷了厂里的布，把几个秘密团的组织者关到了工厂禁闭所里。

工人得到消息后，十分愤怒，摇纱女工刘子云就立
刻到检查室来找张世焕，要想发动大伙罢工，拯救被捕工人。张世焕一边派人去探听消息，一边就和地下党员、积极分子们商议。当时，觉得布场方面，工头王梦符拜了不少盟兄弟，群众被他控制住，布场工人能否参加罢工是个问题。正在研究，传来了消息，说敌人准备释放，大家就松了口气。

原来是当孙世瑶等工人被捕后，八区伪党部书记李玉祥，驻厂伪军吴排长，伪工会筹备处的冯培如，伪警官姓韩的都一块儿审问。一上来就问：
“你们偷了厂里的布，快实说！”

孙世瑶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就气愤地回答：“没有的事。”

李玉祥又问了一阵，工人们不承认，他就凶狠地问：“你们为嘛组织工人秘密自治团，说！

孙世瑶一听，才知道事儿坏了，准是有人出卖了大家，就索性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为了一团一结！”

李玉祥就像疯狗一样跳起来叫：“不许你们团结！”

被捕的几个工人都愤怒地瞪着敌人，心里忍不住瞎笑，敌人竟会说出这么无理的话来。

问了好一阵，伪工会的冯培如在一旁又取笑又发威，折腾了好久，找不出证据来，只得把人释放了。

被捕释放后，孙世瑶突然不来上工了。党组织派了人
独自眼龙下命令了，让他的爪牙们都准备好了，就对四周的
工人说：“鹫芳柳和刘永德是盟兄弟，他们想和孙世祖建立
工会，都是八路军，给我打十支洋棒！”没等我说话，几
个爪牙就把我按倒在地，前面有两个爪牙拉住我的胳膊，
后面有两个爪牙用木棒压着我的腿，还有三个换着打。
第一个咬着牙打了我十棒，前两棒我还知道痛，后来就觉
得有人给我几脚似的，又觉得头一冷，心里明白，他们给
我浇凉水了。两个爪牙架着我跪了两圈，按在那又打，第
二个更厉害，拼命的打。这十棒光觉麻木不觉痛。接着又
觉得冷一回，又冷一回，他们浇了两次凉水，我心里才明
白过来。又听到熟悉的声音说：“咱们都拥上去！”还听
到女同志们的哭喊声，两个爪牙架着我又跪了几圈，按那
又打第三次，这个家伙更厉害，打完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觉得，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冷，这回连路也走不了。有人把我背到一个朋友家里，我才清醒过来。一看腿
和屁股肿得多高，好多男女男女都跟着来看望我，都是工
人。有的说：“现在咱们有心无力，”也有的说：“咱们一
定给你报仇，”还有的安慰我说：“好好养病。”当时
使我感动的掉下了泪。

养伤期间，工友们都告诉我，敌人把我打昏过去以
后，由吴鹏举当场宣布把我除名，并且向全体工人宣布三
条纪律进行镇压。这三条纪律是：

1. 工人不许有任何集会结社的行动；
2. 不许有什么要求，不许找厂长直接交涉；
立眉瞪眼的说：“你在这干啥？”我说：“粗纱很冷，在这暖和一会。”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上来就打我一个耳光子。我说：“你别打人呀！”他更急了，还说：“你是八路军。”就把那刺刀拿出来了。这时有一位看厕所的白头髮老大娘可吓坏了，推着他，拉着我，央求。他把老大娘一推，拿着刺刀向我脅背拍拍的就几下，要推着我见他那独眼龙军官去。刚出车间，那个立眉瞪眼的家伙从我背后给我来了个大满脸花，接着就是几脚，打得我鼻口流血，另一个爪牙跟在后面还笑呢。

到了独眼龙那，他并沒有问什么原因，就把我锁在小屋子里啦。我在小屋里，从窗户望见独眼龙和立眉瞪眼的那个家伙，还有狗腿子蒋培如，在院子里来回走动。过了三个来小时，那个独眼龙问我来了：“你和刘永德是盟兄弟，你们都和孙世琚想成立进步工会。”（因为永德和世琚前两天被独眼龙押起来过的，把他俩放出来）他问着，沒有容我说话，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子，又是一脚，把我推到小屋里又锁上了。当时我也不知原因何在，说理也没法说。到了下午六点多钟，把我从小屋里拉出来，推推搡搡的到了工厂的大院里，我一看，西北面围了半圈刚刚下班的工人們，东南面是独眼龙的爪牙们，各个大檐上都按着刺刀，人挤的很，围了半个圈，圈中間有我，独眼龙，还有几个爪牙。我往四处一望，心想，我好威风啊！又望见那几个爪牙那儿，放着两条毛巾，一把铁水壶，还有几条大木樁。我想，莫非是槍决我后准备抬我的，这时
候热眼龙下命令了，让他的爪牙们都准备好，就对四周的工人说：“杨芳潮和刘永德是盟兄弟，他们想和孙世珏成立工会，都是八路军，给我打三十军棒！”没等我说话，几个爪牙就把我按倒在地，前面有两个爪牙手拉着手，后有两个爪牙用木棒压着我的腿，还有三个揍着打。第一个咬着牙打了我十棒，前两棒我还知道疼，后来就觉得有人给我几脚似的，又觉得头一冷，心里明白，他们给我浇凉水了。两个爪牙架着我踱了两圈，按在那里又打，第一个更厉害，拼命的打。这十棒光觉麻木不觉疼。接着又觉得冷一回，又冷一回，他们浇了两次凉水，我心里才明白过来。又听到熟悉的声音说：“咱们都挤上去！”还听到女同志们的哭嚎声，两个爪牙架着我又踱了几圈，按那又打第三次，这个家伙更厉害，打完我连气都喘不出来了。我觉得，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冷，这回连路也不会走了。有人把我背到一个朋友家里，我才清醒过来。一看腿和屁股肿得多高，好多男男女女都跟着来看望我，都是工人。有的说：“现在我们有心无力，”也有的说：“我们一定给你报仇，”还有的安慰我说：“好好养病。”当时使我感动的掉下了泪。

养伤期间，工友们都告诉我，敌人把我打昏过去以后，由吴鹏举当场宣布把我除名，并且向全体工人宣布三条纪律进行镇压。这三条纪律是：

1. 工人不许有任何集会结社的行动；
2. 不许有什么要求，不许找厂长直接说交涉；
3. 不許三個工人在一起談話。

今后如果發現有以上的行为就按共产党，八路军论罪。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更气愤了。等我把伤养好了，更想办法跟国民党资本家做斗争了。所以，在地下党领导下推翻伪工会时，我就参加了我们的敢死队，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四 割刀底下“选”工会

张家振口述

十二月里的一天下午，厂里宣布提前下班，各车间的封建把头们就纷纷告诉工人：“今天下班选举工会，选王梦符、冯培如、刘庆奎，大家听见没有？”

地下党早就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串连工人不要选这几个人，能选别人的就选别人，另外，在群众中酝酿，选举曾经领导工人要求复工胜利的地下党员贺佩英。

当工人们走出车间后，只见车间门口通到办公室的大道上，已架好机关枪，一路上，几步路站一个荷枪的士兵，明晃晃的割刀在手里端着。工人们不得不前往选举的地点，人们一边走，一边不由得在心里大骂国民党。这种叫选举，用割刀逼着工人，这就是国民党的民主！工

人们忍着满腔的悲愤走到选举的地方，只见四周都站满了挽着白袖口的流氓打手们，不断的向工人吆喝着：“听到
争，利用国民党自己唱的高调，像言论、出版、集会、请愿、结社等自由进行活动，也就是利用国民党的东西反过来打他们，把他们的工会变成我党领导；第三，在方法上可以具体掌握，那些是群众迫切要求的，就根据群众要求去做，但要注意随机应变。此外，我们在斗争的策略上，要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分化敌人。今天我们可以研究一下，那些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如何行动起来，如何分化敌人利用敌人的矛盾，如何争取合法地位进行合法的斗争。”

支委们精神地听完传达，一个个都兴奋起来。自从日本投降后，由于国共谈判结果未定，党一直处在十分隐蔽的状态，红色工会一时建立不起来，可是敌人的伪工会倒建立了。自从强制选举工会并殴打了粗纺工人杨芳潮以后，工人们反抗国民党的情绪高涨。工人们不但在经济上没有翻身，连政治上也遇到了压迫，三个人不敢在车间说话。支委们听了指示高兴极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怎么个办法。

经过仔细分析厂里当时的情况，决定了打击的对象是伪工会，重点人物冯培如，策略上，利用伪工会内部失意人物刘庆奎、王梦符等，分化伪工会，攻倒冯培如等当权派。另外，厂内伪工会虽然由国民党的工职派上了台，但工联派头子范宝镜仍然想在五厂建立势力，因此，决定联系工联派孙宝钧等共同推翻工职派伪工会。办法是：趁着春节快到，工人要求发表面，而伪工会当时还没有给工人
五 行动的前夜

曹鸣钟、张家裕 口述

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大雪漫天漫地的飘舞着，天津
市阜新庙街张家胡同三号的院门轻轻开了，曹鸣钟和他姐
姐曹鸣平，还有工人马润华，一清早就悄悄溜进了院子。张
家裕出来把院门紧紧插上了。院子里静静悄悄的，北风嬉
弄着雪花乱舞，不一会，屋子里就渗出来轻微的歌声，
庄严的低沉的国际歌响声在院子里轻轻响起来。那歌声时
而被北风淹没，时而又响了起来。不久，歌声停止了，中
共中央五厂地下党支委会议在张家裕同志的家里开会了。

四个青年围着一张方桌坐了下来，张家裕同志从一个
腊纸筒底下取出了一张小纸条来，这是党的指示。

“同志們，今天的支委会，一方面傳达上级党对我们
的工作指示，同时，根据指示，要研究一下咱们在厂里的工
作。”张家裕同志严肃地把小纸条铺平，“现在，国共談
判还在进行，蒋介石缺乏诚意，党还在争取和不协商，将来前途难于估计，我们的军队没有入城，可是现在敌人倒
先进来了，因此，我们的红色工会难于建立起来。上级党
指示我们，今后的行动必须根据三条原则：一、争取合法
地位，领导合法斗争，共产党员可以出面领导合法斗争，
在没有召开伪国大以前打入伪总工会；第二、通过合法斗

102
于是，决定各车间都选派代表两人，第二天不通过厂里的伪工会去找厂长交涉。第一批，各车间各去一个代表，万一厂方扣留，再去第二批。

这时，各车间的工人们都在底下纷纷酝酿，斗争情绪高昂，准备立即行动。

（写作组 整理）

六 第一次全厂大罢工

徐明和、孙世璠等口述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出事前一天，孙世璠接受了党的任务，带领了纱、布两场的工人代表到修理场集合开会，修理场的代表也立刻参加了。大家讨论，第二天如何去见厂长。讨论了一阵，孙世璠对大家说：“一句话，他要不答应，咱就不回来！”代表们都齐声说“对，不答应不回来！”当场并约好，到了厂长那里，大伙不要随便讲话，由孙世璠一个人对答。

第二天，二十四号早晨，孙世璠领着三十多个工人代表到了厂长室，代表们一进屋子就发现事儿坏了，驻厂国民党军队在屋里各个角落都站满了，枪已上了刺刀。伪工会的冯培如站在办公室栏杆跟前，手扶栏杆，凶狠地问：“你们干嘛？

“找厂长。”孙世璠从容不迫地回答。这时，厂长室
去要求，可以組織工人自己选派代表，联合伪工会里部分失意干事共同出面向厂方直接要求，不通过伪工会，这样来推翻伪工会；在群众中间，决定争取积极分子孙世琚一块儿共同行动。

计划商量妥当后，张家枢特别强调要严守党的秘密。

事情决定后，就准备行动。正巧，碰到厂里关钱，那时，报纸上登着棒子面每斤是伪币三百一十元，厂里给工人只关二百四十元一斤，每斤少关七十，一般工人每月关九十斤到一百斤左右，厂里一千多工人，被贪污的款就远去了。工人們都在下边嚷嚷，意见大极了，自从杨芳不懈事件后，工人已經对国民党很不满，这时，各车间的工人就闹得更凶了。

支部面临新的情况，就在曹鸣鑫家里召开了临时的支委会，决定立刻改变行动计划，把要求春节发面改为要求棒子面差额金，又通过孙世琚，立即在纱场试验室里召开临时秘密会议，把部分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召集一起，向大家提出了“要求棒子面差额金，保证工人实际收入”的口号。大伙对少发钱都挺气愤，有的说：

“棒子面钱应该按三百一发，别厂也发了，可是为嘛咱厂……？”

“厂里不给剥削咱的血汗，还该发的工資也克扣了，咱太没尿了，应该请愿！”

张家枢就问：“咱大伙齐心吗？”

“齐——心！”
原來，遇到進步工人方面來的一個工賊張振遠在出事前已出賣了大家，他向把頭劉熙密告了進步工人準備向廠方鬥爭，並且引頭人是孫世瑞、張惠儒等。因此，張華早有了準備。他們把魯子君的代表趕回軍閥，同時派駐廠國民黨軍隊去軍閥逮捕張惠儒，打算把引頭人押送到警察司令部去。

黨支部估計可能發生事情，早在軍閥會中把準備全廠罷工的工作做了布置。支部為了使最基礎的組織具有堅強的戰斗性，在選組長前向軍閥提出任選的條件是：

1. 为工人办事不怕死；

2. 对工人公正，不講私人关系，立场坚定，不被资本家收买；

3. 完全是靠工人自願提名选举。

選舉的方法是舉手決策，如發現群眾有意見時可以隨時研究，重新提名。由于这样的选举，就保持了基層組織的群众性和戰斗性。選出的小組長多是紅色群眾，黨員以及我們掌握的工頭和職員。同時根據上級黨的“隐蔽力量，準備再接再歷地開展斗争”的指示，也早就把大部分地下黨員和積極份子留在軍閥，支書張家樞本人也沒有去廠長室。代表去見廠長交涉以後，不久，軍隊就圍住了廠長室，把代表扣下了。積極分子徐明和（他原是細紡工頭，工人出身，被党爭取过来）跑去找張家樞，研究怎么办。張家樞按預定計劃說：“要是他們不把人放回来，咱們立刻采取罢工行
的秘书小高一扭头就从后面朝厂长宿舍里跑去。代表们全都站着等候，屋子里鸦雀无声，空气紧张。不一会儿，厂长孔庚华披着一件白衬衣走来，径直朝代表们面前走过，厉声问道：“你们干嘛？”

“我们要求补发欠下的工钱！”

孔庚华眼睛一瞪：“谁叫你们来的？”

这时，孙世琚见厂长发狠，也不示弱，就比厂长喊的更高：“工人叫我们来的！”

这一声大喊使厂长吃了一惊，觉得有伤他的自尊心了；便蛮横地喝道：“什么工人叫你们来的，都是你煽动的！”

孙世琚毫不害怕，冷冷回答道：“欠下的工钱少发了，我们代表工人来要，你怎么不讲理？”

孔庚华见一个普通工人在自己面前竟毫不害怕也不屈服，就疯狂地吼叫：“逮捕起来！”

随着这一声吼叫，布置在屋子里的伪工会打手和国民党军队们都跟着发出一阵野兽般的嚎叫。一个士兵抢上前去一把揪住了孙世琚的衣领，反拗了手，把他推到厂长室旁边的小屋里去。孙世琚一边走一边气愤地大声说：“你们为什么不敢讲理？你们就这样不讲理！”

可是，伪军把小屋子的门砰的一下关上了。

厂长孔庚华就回过头来威胁其余的工人，是否受了孙世琚的煽动。大家都不答应他。

106
原来，混到进步工人方面来的一个工贼张振远在出事前已出卖了大家。他向把头刘魁密告了进步工人准备向厂方斗争，并说引头人是孙世琚、张家楣等。因此，孔森华早有了准备。他们把屋子里的代表赶回车间，同时派驻厂国民党军队去车间逮捕张家楣，打算把引头人押送到警务司令部去。

党支部估计可能发生事情，早在群众中间把准备全厂罢工的工作做了布置。支部为了使基层的组织具有坚强的战斗性，在选组长前向群众提出入党的条件是：

1. 为工人办事不怕死；
2. 对工人公正，不讲私人关系，立场坚定，不被资本家收买；
3. 完全是由工人自愿提名选举。

选举的方法是举手表决，如发现群众有意见时可以随时研究，重新提名。由于这样的选举，就保证了基层组织的群众性和战斗性。选出的小组长多是红色群众，党员以及我们掌握的工头和职员。同时根据上级党的“隐蔽力量，准备再接再励地开展斗争”的指示，也早把大部分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留在车间，支书张家楣本人也没有去厂长室。代表去见厂长交涉以后，不久，军队就包围了厂长室，把代表扣下了。积极分子徐明和（他原是细纱工头，工人出身，被党争取过来）跑来找张家楣。研究怎么办。张家楣按预定计划说：“要是他们不把人放回来，咱们立刻采取罢工行动。”
动！

正说着，三个国民党军走进了纱场试验室。
“前边儿找你去！”他们向张家楣一瞪眼说。

张家楣知道事情不好，就站起来，镇静地走出屋子。她又特意在车间里走了一圈，向一些积极分子孙士荣等使了一下眼色。三个国民党军把她押走后，车间里的工人就都乱了。

工厂把张家楣和孙世璋押到了工厂职工宿舍楼上的禁闭所里，这儿门窗都是铁的，和监狱一个样子，是厂方专门为押工人的屋子。

被赶回来的代表回到车间就告诉工人，厂里把孙世璋和张家楣扣下了，大家商量营救办法。留在纱场的徐明和就去找共产党党员杨恩太，这当儿，杨恩太正站在电气部门前观察事变动静，徐明和走去说道：‘坏了！’

杨恩太也轻轻地接着说：‘他们把咱的人扣下了，你看怎么办？’

徐明和脑中闪过张家楣被捕之前说的话，‘采取罢工行动！’就凑拢去道：‘这么好看，咱回去关车要人去！’

‘对，快！’杨恩太说。

两人就分头回到车间串连党员和积极分子关车，徐明和回到细纱车间就喊道：
‘还不快关车，咱的代表给扣下了，大伙出去要人呀！’

说罢，大伙儿就一个个关了车，人们浩浩荡荡地奔出车间。杨恩太回到了合纱车间又到打轴科串连党员和积极
分子，也都关了车奔出车闸。

工人们刚冲到修理场那儿，伪军就把人截住，用枪托推工人，赶工人回车间去。这当儿，地下党员曹鸣平、马润华、杨恩太就在一边商量，决定立刻下去再一次串联工人积极分子，坚持罢工，不放出人不散。

“下去串连，喧腾吧！

于是，曹鸣平回到电气部叫地下党员，工人顾金章关了大闸，全厂停电了，工人又一次呼呼地直奔出来，一直冲到仓库前面的大道上，敌人已把机关枪架起来了，一边对工人大声喊：

“谁敢走过来，过来就机关枪点名！

大伙那儿管他们叫喊，还是一个劲儿的朝前冲。这时，一群年青的女工孙士荣、百宝珍、齐淑花、孙士兰、刘大奎，苗玉珍等，还有一些细纱车间的养成工，就一下子冲到了敌人的机关枪面前。伪军喊
道：“快回去，要不机关枪点名！

女工们勇敢地挺起了胸脯，喊道：“你崩吧，崩吧，老姑不怕你！

“老姑活够啦，当了八年亡国奴，挨打受骂，现在还是这样，你崩吧。

伪军还是吓唬道：“你们再走，都关到库房里去！”

女工孙士荣走上前去说：“关吧，就关我！”

女工齐淑华气得大骂道：“你们吃着我们，喝着我们，还要欺侮我们，你们崩吧！”说着，女工们气昂昂的站在机枪前又骂又吐唾沫，伪军看到女工们这样齐心，吓得软下去了。

这时，伪工会的王梦符、冯培如就假仁假义地出来说：“大伙儿先回去吃饭，代表下午就放！”

站在人群里的工人王老五就大喊：“喂，你们穿长袍马褂的，你们给工人办了什么事？都要扣咱工人了！”

人们都齐声嚷了起来：“你们是干啥的？不给工人办事，还欺负工人的钱！”

问得伪工会的干事说不出话来，这时，正上午十一点多，冯培如说：“你们快回去吧，过十分钟就放！

“不行！马上放，”工人们都挺坚决，不上这些人的当。

僵持了半小时，工人一个也不走，厂方没办法了，只得释放代表，孔祥华只好改变态度，和伪军吴排长一同走到禁闭所里，满脸堆笑，客气地对孙世荣道：

“老弟，这是个误会，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商量好了，
沒有不好办的，你们回去吧！

孙景昭和张紫霞被释放后，走到工人面前，女工们就一拥上前，仿佛见到了自己久别的亲人，拉着代表的手，激动得直抹泪。他们围着代表问长问短，孙景昭就激动地跳上了道旁的马车马，对大伙讲话。

“工人兄弟姐妹们，咱们工人胜利了，现在，我告诉大伙，他们本来打算不答应咱们的要求，把我们两个押走。现在，他们失败了，这是咱们工人团结起来才取得的胜利，只要大伙团结就能胜利。怎么才能团结？必须建立咱们工人的工会。只要能够团结，为了大伙的利益，个人就是掉个脑袋也不要紧。你们大伙说，咱们的工会为咱们工人到底干了什么！他们能不能代表咱们工人的利益？”

“不能！”工人们的喊声响天动地。

孙景昭胳膊一挥动，又说：“对！咱们大伙儿都起来推翻他们！剷削工人的旧工会要推翻，组织咱们工人自己的工会！”
工人们都举手拥护，跟着喊，大家兴奋地回到车间，便酝酿改选伪工会。

下午，厂方与代表谈判的结果，把克扣的工资产全部退回了，过春节时还答应了发白面，以后关钱要照日平均五天的物价发，经济斗争胜利了。

工人们回到车间后，布场由孙世明掌握，纱场由张家枢掌握，按车间划分了小组，把原来的伪工会小组和工人秘密自治团的组织都解散，重新划分小组选出组长，细纱车间选出了孙士荣、田宝珍、苗玉珍、孙士兰等十几人为组长。以后，女工有事就常找她们四个。自从这次选举后，她们四个人常常是在一起参加斗争，人们因为她们四个处处表现得英勇坚决，就称她们为“四大金刚”。

各车间推翻伪工会的情绪高涨极了，工人们自动掏出钱买纸写标语，自已编词儿，一下子，墙上到处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喝血拔毛的，要打倒！”
“污辱女性的旧代表，要打倒！”
“打倒馮培如！打倒王梦符！”
“反对伪工会操纵选举！”

当晚，各车间工会小组长又选出了进步工会的筹备委员会等三十多人，推翻伪工会的口号立刻变成了行动。

大罢工后，伪工会就上告国民党市党部，说五厂有赤色分子煽动，告工联派孙宝鈞倒打了一棒。伪工会的玄奘在国民党中央部的会议上也就不同意逮捕孙世瑜和张荃。市党部的委员们讨论了一个晚上，有部分委员认为五厂国民党就是搞的不像样子，所以工人才罢工。国民党内部争执不下，没有下决定。孙宝鈞一心想扩充势力，就支持五厂工人推翻工职派的伪工会，以便变成他的势力。

（写作组 整理）

七 王老五辫子头

王老五 口述

在第一次全厂大罢工时，还有一段插曲：

布师傅全部里有个工人名叫王贵弟，因在家行五，所以人们都叫他王老五。罢工前几日，王老五在车 間 里 于
活的时候，感到十分忙乱，好些工人都不知为什么嘈嘈喳喳，三五成群的交头接耳，特别是女工换班那里更乱。李庆云、高相彬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不知嘀咕什么。过了两天，更乱了，他又纳闷。正在这时候，保全工翟恩荣走过来对王老五说： "老五，你现不愿意学技术，老这样不行啊，今后做事，没有本事吃不开啊！"

王老五心想，是啊，自己没有技术，当初进厂还是依靠工头刘庆奎向保全部工头王梦符求的情呢，就感激地回答道： "是啊，没有技术吃不开啊，可惜我没学过。"

翟恩荣说： "咱弟兄常在一起，我教你。"

第二天，两人就在一辆小汽车。王老五开始学技术了，谁知翟恩荣却另有另外的目的。这翟恩荣是王梦符手底下的跟子，自从王梦符当上了伪工会的理事后，还拿着保全部工头的一分工资。厂场运输方面的大工头孙永生就不满意了。一天，厂长孔德华对工头们说，厂里的秩序太乱，要大家注意维持，孙永生就乘此机会说： "只要给我权力，我个人去布场完全能管好，把南场几个部门的管理权都给我，南场就没有问题，工人不好，我可以罚，可以打，再不就开除，只要我说了算。"他这话的意思就是想把王梦符管的保全部归他管，孔德华还没答应，消息倒传到王梦符耳朵里了。王梦符心怀不满，就让他手下跟子翟恩荣来挑唆，想利用王老五打孙永生，翟恩荣便买好来教王老五学技术了。王老五到厂以后，早就知道这孙头为人阴险凶恶，在日本时期压迫得工人喘不过气，日本投降
后，他还是当头，经常刁难工人，谁调皮一些就闹到最难开的机器上去。布场工人宋彬、孙学桐（当时的地下党员）等都常对王老五诉说。这时，听他说孙头还想把保全部也归他管，又说要罚要打，就更对孙头不满。

出事这天，王老五抬起头来一看，车间里出奇的乱，他东张西望想了解个透。翟恩荣就忙阻止道："别管他们那些，他们要倒霉啊，试验室里有个男学生和女学生跟咱老爷拴上扣了。"王老五一听，知道是指的王梦符，为嘛学生跟他拴上扣了呢，就一个劲儿的问，翟恩荣得意地说道："你，找倒霉啊，咱老爷跟区党部李玉祥吃喝不分！"

王老五还是不明白学生为嘛找王梦符的事，翟恩荣才吐了真情："听说，厂里少给咱发钱了，那回儿学生领着大伙向工会要玉米面钱哪。"

王老五问："不是跟厂方要钱吗，跟咱老爷有嘛关系？"

"不明白，按他们说，这是为了工人得福利！""对啊，"王老五愈听愈觉得这两个学生办的对，就说："五号关下钱，比三十号差好些，不够买吃的呀！"翟恩荣还是向着王老五说："胳膊撸得过大腿吗？"王老五不爱听他说的了，忙着问："这会儿学生上哪去了？"

"军队把他们扣了！"

"啊？……"
正这时，场里大乱，有跑出去的，有跑进来的。王老五把手里的板子一扔，拉着翟恩荣就走，一边说：“这不是罢工了吗？走，咱瞧瞧去！”翟恩荣不肯走，王老五还是不听，硬拉着她一块儿出去，一边走一边高声招呼着加油的小孩们一同去看。加油小孩就飞快地跑到头里去了。

走到打轴科时，大工头孙永生插着腰凶狠地站在门口，正骂着加油小孩，骂得小孩害怕了就往回走。这时王老五几步上前拦住小孩问：“怎么啦？”小孩说：“孙头不叫去。”

王老五火就上来了，挺起胸脯从孙头面前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骂道：“谁敢拦，今天那就看今天的样子！”说着，走出了门。一出门，只看见工头徐明和站在门外，两个人拉着正招呼工人出去，王老五和徐明和早先在裕大纱厂一同干活，老兄弟了，就走到跟前去问。徐明和气地说：“妈的，工人代表要去玉米面钱，军队扣人了，逮了两个。”

王老五觉得许多事儿都不明白，就问：“代表要了钱出来不是大伙的吗？干脆咱们布场没有人出来呢？”

徐明和一边还在招呼工人往外跑，一边答道：“嗯，就是，你们怎么还不出去？”

王老五心想，人家是为了咱大伙给扣了，咱们怎么可以不管人家呢。回头，见宋栋在旁边站着，就说：“咱快回去，也关事！”
于是，王老五、宋栋、孙学桐、馬潜华、王文汉几个人先后跑回車間，一边高声嚷一边领着布场工人关车。最后又把保全部工人也都叫了出来，几个人领着头不顧孙头的阻挡冲了出来。

这时，伪工会的王梦符、冯培如、刘庆奎等带领了伪军，佩带全副武装，正把紡场工人堵在饭房南边，轻机枪正对准工人，王梦符在叫工人回去，王老五站在人群里，只見曹鸣鍾和他姐姐曹鸣平两人在群众中间积极活动，领着头喊：

“你們得给我們人，得补給我們钱！”

两个小曹一回儿从人縫里穿过去，一回儿又穿过来，细紡女工孙士荣、田宝珍等几个也在忙着串連，还有张锡元、李庆成也都在人堆里活动。王老五見工人們都这么有劲，一点不怕，自己也激动起来，他知道孙学桐他們平素受孙头欺压得很厉害，就对孙学桐悄悄道：“这个时候了，咱还不快报仇！”

他想起中紡一厂的工人曾經把日本时当过汉奸的工头赶跑，就想趁这机会跟工头孙永生算账，他又对孙学桐道：“这是个好机会，大伙儿一起哄，孙头不就完了嗎？咱还不快大鬧一場。”宋栋、王文汉等就应道：“对，对呀！”

王老五见有人同意就更上劲，对四面一些不认识的工人说：“咱还不有冤的报冤？打倒孙永生！他压迫我們压迫得够了，这是个好机会！

可是，織布場的工人被大二把头统治得很厉害，有的
人先看了看他，不敢答理也不敢动。

王老五又仔细的瞧瞧四面，马润华正在布场工人中间活动呢，她领着工人在喊口号，再朝前看，只见王梦符的一只手总也不动，原来他的棉袍袖筒里带着家伙呢，王老五听的大家声声嚷着要人，就也抑制不住地喊：

“不给人不走，枪刺刀砍的年头都熬过来了，这年头他反正不能不懂中国话！”

正喊着，王梦符听到就朝他直翻白眼，王老五这时也不怕他了，跟着大伙儿嚷着要人，又坚持了十多分钟，伪工会说下午放人，晚上放人，大伙都不答应，“工人逼紧了，没辙儿了，王梦符就转身回去找厂方商量去了。王老五又对周围工人说：“等他一回来，咱就提出来打倒孙头，天大的祸由我负担，只要你们敢跟我干！”

这时，张家楣和孙世瑜给放了出来，孙世瑜站到车头马上讲话了，孙世瑜强调工人要团结就能胜利，王老五听了受到很大启发。工人们都散了，王老五还是不走，又喊道：“打倒孙永生！”

这一喊，把张家楣等都惊住了，人群里怎么会想起了这个口号呢，王老五又喊：“孙永生压迫我们工人，打工人，扣工人工资，打倒孙永生！”孙学桐、宋栋等也喊了起来，王梦符就走过来假装好话说话。刘庆奎在一边可就火了，自己荐进厂来的人里敢打倒工头孙永生，就走来喝叱道：“干吗！你还不回去！”

张家楣也走过来关切地对王老五说：“这事以后再
說，你先回去吧！"

王老五回到車間，心里很不安，他想：“這一下算是做下仇了，撕破了臉了，孫永生准得來找我的岔！”他就叫兩個加油小孩出外打聽一下消息，不一回兒，小孩慌慌張張跑來說：“孫头在外邊召集布場的人講話了，在門口集合呢。”

王老五立刻奔出來，只見孫頭正在門外站着，臉冲着布場門口，正要說話呢。王老五就把翟恩榮從人堆里叫了出來，兩個人坐在一臺機器上跟孫頭碰個面對面。

孫頭說：“都到齊了嗎？咱說說吧，有人說我向廠方多要權力，咱弟兄在一起混了多少年了，日本在時，有那一點對不起弟兄，現在說我向廠長要權，有那一位聽到的？”

王老五立刻接過來說：“說吧，有那位聽到了，都是中国人，會說中國話的。”說到这儿，他想起孫永生當初和日本人狼狽為奸，他想：“他也懂中國話。這怕關咱，日本人算完蛋了，也沒人給撐腰了！”

這一刺，刺得孫頭大怒，喊道：“王貴弟，你下來！”

王老五從機器上輕輕一跳，站下問：“有什麼事，說吧！”

“你剛才在外邊說了啥？”

王老五反問：“你自己聽見了嗎？你說吧！”

“你說，我在日本時隨便打人罵人開除人，向廠長要權，罰人，有這事嗎？”
“大哥，你可听清楚，”王老五两眼炯炯地看着孙头说，
“我现在来问问工人弟兄们，要是说了怎么办，没说怎么办，大伙儿要证明你没说那些，我就离开，要是你说了，
可就对不起我，小孩儿拉巴巴，得捣一捣。你问吧！”说着，王老五又跳上机器，把翟恩荣告诉他的孙头怎么在厂
长面前要权准备怎么罚工人的話向大伙一说，又大声对工
人们道：“幸亏厂长还没给他这权力，要不他回怎样，你
们说呀，他怎了没？”

马润华在日本时期受尽工人们的欺凌，很早就对孙永
生恨透了，这时就领着工人們齐声喊：“他說了，他說了！”

“说了，说了。”一片喊声雷鸣一样，王老五有了群
众支持，勇气更大了，就問：“日本在时，谁打过你們，
谁骂过你們，谁罚过你們，你們大伙有啥說吧！”

工人們又紛纷嚷起来：“孙头打了，罵了，罰了。”这时，孙永生恨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那肥胖的平时自
以为十分威风的神气一下萎缩了，眼睛、脖子都涨得血紅，
他跟前站着布场里有名凶狠的把头刘魁和突着肚子一脸连
鬃鬃子的高金山，也软了。在工人們一气喊叫声中，王老
五从机器上跳下，朝孙头面前走去，腦瓜冲着孙头，眼儿
斜着大伙，一字一字的說：
“你听见了没？”

孙永生说：“听见了，你說怎么办吧！”

“我说，你就得孩子拉巴巴，打算叫你滚蛋，挨走五
分鍾，我敲折你王八蛋的腿，这会儿，一根線上拴两个螞蚱，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說着，孙头气得扭头就走，大伙都气愤地瞧着他走远。孙永生到整理科找一个職员求情，意思是讓職員做主不讓他走。

当大伙散时，浆纱科把头高金山又把一部分人堵在整理科，他跳上一台废机器，对大伙说：“咱都是好弟兄啊，咱孙头沒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你们可得想想，王老五可是才認識不久。"

这时，王老五走到台下听着，忽听得馬潤华領着王文汉等在一边大声嚷了起来。

“拉他下来，别听他呀，轰他，别上他的当！”
高金山的阴谋被揭穿，工人們紛紛喊：
“拉他下来，打啊！”
吓得高金山跳了下来逃进浆纱科去了。
到了下午，纱場里的工人受大头走来找王老五：“有个孙先生找你，就是会上講話的那个。"

这时，王老五对党还没有認識，他不知道孙世瑀是什么样的人，就不由的低头犹豫了一阵，心想：“我这次惹下这場禍，是給咱受苦受气的弟兄出出气，拔个慵害，如今那孙先生是怎么回事，我可不受人利用！”想到这儿就回道：“我不去。”展大头說：“你就去一趟吧！”王老五被他催得没法就去了。

孙世瑀一見他就夸説这次的事做得很好，今后要推翻
工会，为工人劳苦大众办事是光荣的，咱们应该出来为大伙办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怕，并且希望王老五在布场方面多负一些责任，一些老弟兄能信任得过。王老五听了孙世淘一席话，得到了很大鼓舞，又钦佩，又感觉得到了安慰，从他幼年时起，从来也没有感到有比这次的安慰更能鼓舞他的干劲。

谈话回来后，布场的二把头刘庆奎派了胡立早来找王老五，说：“六哥找你去！”

王老五一听，心里一沉。当初，日本投降后王老五失业，刘庆奎在厂里偷了一批布，在王老五协助下运出了厂，之后，刘庆奎就帮老五找了个工作，一点技术也没有的王老五进厂顶了保全一级工的位置。刘庆奎和孙永生是运输方面的把头，如今刘庆奎叫他准是为了孙头的事。 “孙永生倒挺会翻脸头，让刘庆奎来捏我了。”老五转念一想，“我什么时候也不能叫他回来，别人要是问我为嘛，我就说，我叫工人弟兄姐妹们跟着我一块儿走，得罪了人，我怎么能独自个儿去卖好，我不能在弟兄姐妹们面前不够朋友，当初，我问大家听见了吗？听见了，打过骂过吗？打了骂了，大伙跟我走了，我可不能把人家推到坑里！”

想着，他就告诉了王文汉，孙学桐等，让他们随着一块去刘家，免得让弟兄们说他和大伙心不齐。走到刘家门口前，孙学桐等就都扭头跑了。

王老五一进屋子，只见炕桌上摆满了酒菜，刘庆奎媳妇正在擀面，刘庆奎忙着招呼王老五上炕，老五心想：这
是什么计？刘备摔孩子盗买人心！我要吃了喝了，会使千百工人对我不满，会把别人推到苦海里，利用别人自己往上爬得好处吗？不！王老五上炕就地站着说：“六哥，你说吧，有什么事，说完了再讲别的。”

“你上炕上炕，吃吧！”

见老五不动，刘庆奎又笑着说：“老五，你今天怎么了？咱老弟兄了嘛，吃喝不分，上炕！”

“我今天不喝酒！”王老五冷冷地说，“往常，我把你家筷子都嚼细了。躲过今天我再向你要吃的。”

“你不吃，算是没交情，瞧不起我。上炕吧。”

“交情归交情。平常我就吃了，今天我不能吃。”

刘庆奎这时就摆出长辈对晚辈说话的模样了：“怎么着，咱打开鼻子说话话，就是六哥的事，你无论如何得叫大哥回去。他跟我弟老弟兄，咱们又都是朋友。”

“这事儿不是我个人的，这是大伙儿的事，你得跟大伙儿商量去！大伙儿叫他回就能回，大伙儿不叫回就回不去，再问吧。”说着，王老五扭头就走了出来。

王老五走出了刘庆奎家，心里自问自答起来：当初，自己连饭都快吃不上口，是他刘庆奎养得我哥儿俩活命的，我这么着算对不起他吗？可自己是得罪他自己而得罪他的人呢，还是得罪他一个好呢？当然，是得罪他一个。一脚踹过门，他哥哥气的骂道：“人家救了咱一家，你算不够朋友。”王老五说：“我这是为的大伙，为大伙办事是光荣的，把命扔上也干，我惹了祸我自个儿担，跟你没
关系。”他哥哥一听，拿起洗脸盆扔了过来，砰的一声，人没打着，倒掉了大块的磁。老五说：“你管不着我！”

隔些日子，郑庄子上有人就叫他哥哥劝他道：“老五，这时候你闹，孙世琚他们将来也要整你的，现在是把你放在头里叫你去得罪人，你拉家带口的，孙世琚是个外地人，他要走就走，你可怎么在郑庄子呆下去！”

刘庆奎又托人捎了个信给老五说：“你不够朋友，过了桥就一脚踢开，走着瞧！”李玉祥从小和王老五有交情，也捎了信来威胁，东一言西一语，他哥哥又顶怕事，王老五心里就不免翻腾起来。

一天，进步工会方面派小秋来找他一起去开会，王老五就说：“我是自己愿意为大伙干的，什么人也没有逼我，我不愿意别人逼我！”

这时，王老五站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找不出应走的路了，找他开会他也不去。后来，女工孙士荣等常常来找他，有事，他蒙住脑袋躲在被窝里装睡觉。可是孙士荣根据党支部的指示，回家后极力争取他一同去干，就故意喊道：“你不起来我们就撵被子呀！”王老五只得起床跟着她们去开会。这样，他也就参加了推翻伪工会的斗争。

当时，孙头还不甘心走，让腿子孙玉軒在布场活动，对人说：“孙头现在没在场，谁也别惹，惹了将来总要倒霉。”到处造成恐慌气氛，马润华、高相彬等告诉了工人宋栋、孙学洞他们，这话又传到王老五那儿了。王老五找到高相彬、马润华问：“谁跟你说的？”高相彬道：“孙玉軒…"
說的。" 王老五怕高相彬年幼說的不確。就說： "我可要
打他的。你敢當面跟他對話嗎？" 王老五就把孫玉軒叫到
市場大道上問： "你說了什么？"

"五哥，我沒說什么。"

王老五就把孫玉軒說的重複一遍，孫玉軒說： "不信
你把那個大姐和小老（高相彬）叫來問！"

王老五就掉轉頭來問馬潤華和高相彬，兩人都照實說
了，王老五把孫玉軒狠狠揍了一頓。王文漢、孫學桐等也
都上前打，打的孫玉軒臉腫成個紫茄子，王老五最後警
告他說： "你再惹事，敲折你的腿！" 吓的孫玉軒跑走了，
再不敢煽動了，而孫頭也自此不敢來上班了。

王老五不斷去進步工会方面會合，他看到孫世珺和張
家楣都是真正為工人大伙办事，知道自已不是被人利用而
是為大伙办事，就解除了顧慮；但當進步工会成立，他當
競選代表後，內心的矛盾還不斷苦惱他，當天，他走回家
去時，還把身上佩帶的工人代表那個布條悄悄揣到了口袋
里，怕人看見說他是打倒了別人自己爬了上去。

選舉后，孫世珺和王老五，还有一些地下党團結和爭
取的对象一起下水拜了把兄弟，从此，孫世珺把老五叫到
一間屋裏住下，從思想上影響他争取他，對他講到世界上一
切都是工人劳动大众所創造，工人是世界上非常重要非常
寶貴的人，要为工人們大伙的利益干，王老五逐漸地踏實
了，感到孫世珺的为人作風正派，是自己真正的朋友。

"他們做的都是对的，是人所應該做的事，他們确实
沒有一点为自个利益想干什么，他們的目的是为了劳苦大众。”王老五心想。

从此，他克服着内心的矛盾，热情地投入推动伪工会的斗争。

“得罪了一个，交了四百个朋友，为大伙的利益办事，这是做得对的！”王老五决心跟着党走了。

（写作组 整理）

八路军队

李庆云、张家楣等口述

罢工胜利后，厂里补发了工资，又发了过春节的白面，工房里到处都响着过节的鞭炮声，工人们都想太平太平过年了。

不料春节前一天的晚上，伪工会的人想要跟进步工会方面的人拼命，狗腿子李万清在崔淑珍家门前，手拿七节鞭凶狠地喊道： “张家楣，你出来！”

张家楣、曹鸣平、马润华等正在崔淑珍家研究工作。张家楣就准备出去见李万清，马润华一把拦住了她不讓出去，急道：“你出去，一个人死了不要紧，可党的工作怎么办？”曹鸣平也说：“你不能动！出去就吃流血的亏。”

这时，工房里的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就自动组织起来了，金章，在崔家门前后站上了岗，保护张家楣同志。
氓李万清喊了一阵就只得走开了。

这天晚上，张家楌同志从瞿淑珍家又转移到工人顧金章家。工房里的恐怖气氛十分浓厚。以后几天，伪工会又布置了不少流氓打手想要搞暗杀，杀害进步工会方面的組織者。

孙世琚由于第一次全厂大罢工中斗争坚决勇敢，被吸收入党。从此，孙世琚就更得更有劲儿了。这时，张家楌、孙世琚和工人代表们就共同商量給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写呈文，通过合法手续，根据国民党规定的工人有权选举和罢免工会理事的理由，提出罢免旧工会代表，改选工会，同时请求逮捕工会中的流氓打手。呈文上去了老不见信，敌人疯狂的挣扎要杀人，张家楌就对孙世琚说：最好立刻把一些勇敢的工人組織起来保卫工人代表和工房里工人的安全。过春节时，组成了一支纠察队。

农历正月初二，地下党组织趁春节假期决定召集新选举的工会小组长开联席会。为了避免厂里伪工会的流氓打手破坏，在中纺四厂地下党员左振玉的协助下在四厂的小学校里布置了会场，工人代表们悄悄的过了河。

这个会，准备集中小组长通过新的要求改选的呈文，后准备一同去社会局和市党部请愿。开会的消息又泄露了，伪工会派了狗腿子李万清的小老婆崔凤兰和李茂臣混进会场。在通到四厂的道路上，伪工会又布置了流氓打手。会議正要开始，工人李庆云和王玉泉（小名小秋）发现了李茂臣和崔凤兰，大喊：

· 127 ·
“有内奸，不能开会！”说着就走上前问他们干什么来了，李茂臣交他半天答不上，李庆云就抓住他揍了几下，然后把他们推了出去，大声警告道：“你回去给你主子报信去吧。”李茂臣和崔凤兰当下吓得跑了出去。

会场安静下来。这时，有人取出报纸，说国民党不准工人今后成群结队请愿，有事派代表，因此，就研究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时，又发现了一个陌生人坐在会场，原来是国民党特务王长林等人。四厂代表左振玉就上台宣布：不是五厂的人和四厂的代表不准在场，会场上空气立刻紧张，王长林等只得没趣地走了出去。

筹备委员们在一起研究，感到这天如果大家前往请愿，敌人可能会阻挡，甚至也可能放枪、杀人，就把意思向大伙说了。大伙说：“就是死了也要抬着人去请愿，不达到目的不回来。

工人小组长们的决心和勇气很大，推翻伪工会的势头很高。

孙世琛跳到台上激动地说道：“咱们要想团结一心推翻伪工会，必须组织起来，咱们工人成立一支敢死队，愿意为了推翻伪工会牺牲自己的，就来报名！

话刚住音，外号火柴子的工人李庆云就霍地站了起来，跳了上台，他胳膊一挥说：“我算第一个！

说着，王老五、孙士荣、田宝珍、苗玉珍、孙士兰、齐淑花、徐明和等纷纷跳上了台，一下子就有七十一个人报名了名，其中有三十七个女工，三十四个男工，二十二岁
的推布工李庆云当了敢死队队长。
四厂工人代表、地下党员苏志新同志见这情景，便激动地走上台走到李庆云面前，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向大伙说：“咱们组织敢死队的精神很好，今后，一定要把这种精神巩固下去！

孙世翚站在敢死队员们的前面率领大家宣誓，他举起胳膊高声喊道：
“我愿意做一个敢死队员，为工人利益不怕牺牲自己，为保护工人利益奋斗到底！”

队员们都举起手来跟着宣誓，会场上又紧张又庄严。工人们怀着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为新生活为推翻恶势力组织起来战斗了！

会场通过了呈文，选举了前往请愿的代表，讨论了如何推翻伪工会的问题。当工人们分散回厂时，一路上遇到的流氓狗腿子，在勇敢的敢死队员面前也失去了威风。在后来的屡次斗争当中，敢死队员一个个英勇的参加斗争，保卫工人们的安全，保证了斗争的胜利，勇敢地完成了伟大高尚光荣的战斗任务，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好儿女。

（写作组 整理）
九 請 領

張家樞 口述

成立敢死隊的那天，選出了前往國民黨市黨部、社會局請願的代表二、三十人，這里面有國民黨員、工聯派的孫寶鈞與劉世澤。

當初，工聯派頭子苑寶璜通過朱洪年、孫寶鈞在五廠籌組工會，被工職派打跑，工聯派仍舊不甘心失敗，極力想擴充勢力。地下黨組織分析了敵人內部的矛盾，感到如果不聯合工聯派孫寶鈞一同來推翻工職派工會，敵人很可能兩派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進步工會。黨看清楚了這一點，一開始就聯合孫寶鈞共同工作，讓他當聯絡員，專門與苑寶璜聯繫，同時通過他摸國民黨機關的底。苑寶璜本人一心爭權奪勢，还以为自己的爪牙孫寶鈞在五廠活動有了办法，又派特務孫世澤到五廠來，協助孫寶鈞共同參加推翻工會的活動。那天，代表們在四廠開會時，孫寶鈞引着孫世澤到五廠來，介紹後，孫世澤就與張家樞商量，根據上級黨的指示和支委會的決定，聯絡多數孤立少數，就答應讓孫世澤來。孫世澤接受了苑寶璜的指示，抓住李玉祥是个漢奸这一環，參加了共同推翻工會的活動，但在此同時，他也接受了監視進步工人活動的任務。因此，進步工會在這時不僅面對了工會方陣的封建把頭、流氓打...
手，驻厂伪军等等敌人，又得时刻提防自己内部一些暂时不得不联合的工联派分子，一些混到进步工会方面来的内奸。

农历正月初四，李鲁的代表们集合过河，正当天气寒冷，工人代表们在摆渡口等着渡船，一个个冻得红脸，工人代表们过了渡船，到了社会局，“四大金刚”一进门就愤愤地质问：

“我们工人都要给日本人杀死了，你们为嘛不管？”社会局接见人就说：“你们不要命，五厂有共产党煽动，我们知道了。”“四大金刚”就抢着说：“嘛叫共产党八路军？那么说，八路军都是搞奸事儿的啦？你们为嘛还打他们？你们去抄抄我的家底，从小在天津长，从小做工，没见过什么共产党八路军！”

愤怒的代表使敌人无言可答，只得听代表们陈述改选工会的理由。代表们把伪工会如何苛扣工人工资、盗卖厂里的东西、欺压工人、强奸妇女的罪状提出来要求逮捕他们。市社会局答复可以考虑改选，但是逮捕他们不管。工人代表们又到市党部，不接见，递了呈文，又到警务司令部稽查处，接见后倒是答应了，工人代表们就回厂，准备初六上班，初九就改选工会。

张家福回到家里，叫妹妹上楚文家中把楚云哥哥请来，向他汇报了厂里工作情况，最后说：“可能随时都会有有人暗杀我们，这一阵，正是火头上。”

楚云听了就对她作了新的指示，强调斗争中不可太多树立敌人，斗争时一定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必要
时，还得记住适可而止。

张宗枢提起伪工会改选问题，初九就准备选出新工会，便向楚云请示，学联代表提议不让他们参加选举大会。楚云说：“工人要求他们去，就去，不要求去，不必去。”

张宗枢接受了指示就回厂去了。

（作组 整理）

十斗智

孙世明、徐明和 口述

二月七日，春节假期过去，厂里开工，敢死队员一个个在胸前佩带了红布条，准备迎接战斗。

哪知道，国民党机关不但不采纳工人的意见，反而和伪工会一鼻孔出气，把工人代表的请愿书交给了厂里的伪工会，伪工会按照请愿书上工人的签名单，在八区党部李玉群支持下，用两万法币和十斤救济面粉的钱收买流氓打手，怂恿化三百多万元雇来一群流氓打手，阴谋杀人。

当天，厂方通知工人提前两小时下班，马宝林手下的流氓一百多人已经布置在郑州渡口到厂门的一里多长的路上，一路设下七道卡子，每道卡子都有十来个流氓手拿电刀、腿叉、斧头等凶器，等候工人走过时杀害。他们想见一个杀一个，把工人杀得一个也不留。流氓们在外边高声骂道：

・132・
“你們要推翻工会，就打死你們！
“不管誰出來，連那些小黃毛丫头都打死了拉走！
“打死一個，汽車拉走一個！

鄭莊子街道上充滿着流氓們的咒罵聲，工人们在厂里得到了消息，性急的就抄起家伙想冲出去拼命。这天，偏巧张家樞同志到中纺四厂找左振玉同志研究工会的機構去了，而孙世璠和孙宝鈞也都在河对岸北洋紡織工房里于文起家中研究初九那天改选的具体問題，留在厂里的曹鴻平同志等就马上向工人宣布，为避免伤亡，别出厂，更不能单独行动；同时，派了电气部工人张錦元、李庆成骑自行车出厂找孙世璠，他倆年龄小，敌人平时不注意。他倆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到了渡口。

“这个也是！”流氓們突然高声喊起来。

他倆急忙跳上了渡船，当流氓赶到时，船已經开了，总算躲过了流氓的毆打。

孙世璠得信，立刻和孙宝鈞、刘世澤带了来人一同去国民党市党部找苑宝璜，苑宝璜馬上答应設法，和伪軍法处联系，但因为市党部主委时于周一开始就怀疑五厂有“赤色分子”活动，他是支持工职派的。苑宝璜虽說是重庆派来，也有些势力，但手下势力究竟不如工职派，因此，军法处一直拖延，直到傍晚六点多鐘，市党部才派了民运科工运干事袁澤民，警备司令部派了侦缉队王队长，跟着孙世璠等一同坐了吉普車返厂。孙世璠等叫車子停在厂门口，好叫他们逮捕行凶流氓，可是侦缉队不同意，故意不看，一
直把车子开到了车间门口。门前流民一见军法处的车了，
就一哄而散了。只有他们的头目李玉祥拿着两把盒子枪在
故作镇静的踱踱。军法处和市党部的人到后，孙世瑾就代
表工人要求逮捕李玉祥，可是，来人推说没有逮捕证，只
得把李玉祥叫来一同谈判。经过说理斗争，最后立下了
“所有本厂工人生命安全保障”保证书。以后如果再出
事，就由李玉祥和市党部社会局负责。当场由李玉祥、市
党部袁泽民、侦察科长签字章。

晚上十二点钟，工人们才出厂。一场惊险总算过去了。

第二天，工人们愤怒地把伪工会的代表赶跑。伪工会
的代表一直逃到南市一个旅馆里住了下来。他们本想利用
一场凶杀把工人吓唬住，没想到进步工会利用了敌人内部
的矛盾，通过宛宝璜找来了军法处，用他们自己的手打了
他们的脸，伪工会败退而逃，工人们倒胜利了。

（写作组 整理）

十一 红色工会的诞生

徐明和、曹鸣铮 口述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在工房后院里搭起了主席台，扯
起红红绿绿的万国旗，工人们与敌人交涉后敌人被迫答应
重新选举工会了。这天，七、八百工人集中在院里，市里和五
厂进步工会有联系的一些厂也都派了代表前来参加大会，

194
东亚毛呢厂、中华火柴厂、中山钢厂和一些棉纺绸厂的工人代表都到了会场，因为工人们在请愿时得到了学生的支持，他们都请求学生们来参加会议。学联便派了要力等到会。
学联的人到会后，当场就油印了一些歌篇教工人唱起来。歌声时起时落，会场上显得十分活跃。

上午十点钟，到了开会的时间，可是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总工会的监选人还没有到会，没有这些监选人到会，选举就不合法，因而大会老是不能开，其实，监选人早已到了八区党部，究竟为什么不来呢，张家楣同志就和各厂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一块研究，决定一同前往党部找他们去。

下午一点多钟，伪工会方面又从大直沽一带雇了五十多名流氓打手，拉来廿多辆的脚车和手把，在工房外面高声叫骂，想闹进会场造成惨案。

流氓高喊道：‘要子不挤，早晚要烂！’

他们气势汹汹想要动手了，流氓马宝林叫李锡元哨了口信给工人代表徐明和，要他立刻出去谈谈。张家楣听到外边儿流氓一个劲的乱嚷嚷，就决定不派徐明和单独出去，防备流氓借此打闹进来破坏会场。有的工人听说流氓们想要捣乱，就愤怒地跑进厂里，拿出打梭板、毛棍、花针等机器上的零件当武器，准备和伪工会干了。敢死队员也都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准备战斗。

孙世璋等和各厂代表一同到八区党部去，国民党市党部民运科工运干事袁泽民、总工会理事苏砚田、李海山等
都在那里坐着呢。他们当场提出，必须把原来的工会的代表在新工会名额中留一半。工人代表们都不同意，说：工人爱选谁就是谁，不能强迫工人选举。苏砚田是工职派的头子，不肯到会。这时社会局、市党部总工会的监选人都不肯进入会场，故意推托说要再商量商量。工人代表们不干，说：我们早已给你们去了呈文，你们应该参加选举。但是敌人还是不肯到会。

孙世琚回到会场上，激愤地向大家宣布了这件事，就带领了代表们，采取请愿方法，到郑庄子包围了八区党部。当时，东亚肥肥厂等各厂代表都随身带有腿叉，防备流氓杀害，也和工代表一同前去请愿，工房外边儿的流氓见工人代表们出来，人多势众，吓得连人带车子拐回去了。

代表们质问前来监选的人们为什么不到会场，“四大金刚”大骂了一顿。八区党部门里门外人声嘈杂，国民党机关的代表们见势不好，只得进入会场，这时已下午，孙世琚把他们带进会场坐在主席台后面的几间上屋里；“四大金刚”苗玉珍、田宝珍、孙士荣、孙士兰就一拥而进，质问道：

“为什么，你们几位不肯来，按的什么心？为什么，我们选自己的工人代表，你们就不来？选压迫人的你们就来，你们这叫给工人办事吗？”

四个人七嘴八舌问得袁泽民等说不出话来。

孙世琚又把厂长孔赞成也请出来，要求他叫驻厂军队
保护会场防止流氓捣乱。于是，会议开始了，工人们特地把袁泽民请出来讲了话，当场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民主选举，趁几个监选人在场，立即抓票开票，选出工人代表七人组成了进步工会，这七个代表是：孙世琚、张家福、曹鸣平、王老五、徐明和、孙文义、李庆云。前三个是共产党员，后面四个当时还是群众，孙世琚当选了理事长。

代表名单公布后，代表宣誓就职，工人们高呼：“工人万岁！”一片热烈掌声，欢迎进步工会的诞生。

这时，已经晚上七点，天色黑下来了，工人们高喊“工人万岁”的声音，震天动地，喊声停了，歌声又响了：

生活像泥沙一样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熏黑我们的脸，
火酒烧焦了心窝。
酒后顿觉心中烦闷，
无处发泄无奈何，
常见父亲打他儿子，
丈夫打他们老婆。
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到处一样受痛苦，
我们天天被人剥削，
这是莫大的耻辱。
全世界工人携起手来，
破坏这个旧世界，
为了光明的新社会，
快把斗争来展开。……

歌声著著在寒冷的夜空里，鼓舞着散去的工人们继续迎接新的斗争。而正在这时，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苑宝瑜坐了小汽车已到了中山门外，他本以为自己的势力在五厂夺到了地盘，不料，到中山门时，有狗腿子前往报告说，五厂的工人已经唱起共产党的歌曲。他一听，眉头一皱，立刻吩咐司机朝市里开回去了。

（写作组 整理）
红色工会成立以后

一 青帮头子李洪生

王老五、张家福口述

天色慢慢的暗下来，冷风在上空呼呼的吹着，工人们
gao 到冷了，有的缩起脖子，双手揣在袖管儿里，有的站在
原地不断的跳蹦取暖。台上正在唱票，尽管天气那么冷，
工人们的心却是火热的，大家都仰起了颤子，期待着自己
的工会产生，唱票快结束，进步工会选的代表是那些人快
要见分晓了。

突然，主席台上有人领着大伙辟辟拍拍鼓起掌来，台
下的人们一边鼓掌一边纳闷：怎么？唱票完了吗？不是，
大伙仰起头点起脚朝台上好奇地瞅去，只见一个老头子
走上了主席台，那人五十开外年纪，身穿礼服呢水獭领大
衣，戴一顶黑鹅绒礼帽，手拿文明棍，怒冲冲，一摆一摆
上了台，台上有人说：“欢迎李洪生先生来参加我们的大
会！”说着，又领了头鼓掌。原来这人是青帮头子李洪生，
受了市公安局委托来解决的工会和进步工会间的关系。工
人大代表故意领着大伙向他热烈鼓掌，为的是好先堵住他的嘴不叫他说什么。掌声果然有用，他只得坐了下来。人们又忙着给他斟茶倒水，殷勤招待，他那一脸怒容才渐渐消了色。

可是，到临走时，他站起身对孙世琚说：“会散了，你们上杨庄子找我去！”

语气挺重，含着许多麻烦。代表们一听，知道事儿不简单；不去不行的，得罪了这帮帮头子，进步工会还能安全？

会议一散，代表们什么东西也没顾上吃，冒着寒风就去杨庄子找他。为了安全，“四大金刚”、曹鸣钟、张锡元、张玉堂等敢死队队员，也跟了一路去。

谈判地点在工人于文起的家里。这位帮头子李洪生，是伪工会代表王梦符、刘庆奎的师付，而进步工会的代表王老五，也是他的徒弟，因此，他想借着这个关系当
作内部问题来解决，但使命是“工职派”给他他的。

“没仇没恨，你们为啥把他们搞成这样？”他用长辈的口气问大家。

工会理事长孙世瑞和地下党支书张永福就尽量先给他戴高帽子，给他面子，然后说：“我们是忍无可忍了，谁也不愿意搞成这样，你要是我们，你对这样的人怎么办？你听，……”接着，张家福把伪工会的各种罪恶全给摆了出来。可是李洪生还是不依。

“你们这一边，留下半人，他们那一边，也留半人，组织这个工会！”李洪生说。

张家福说：“我们怎么能解决呢，工人阶层已经选了我们出来！”

李洪生听了，嗤了口凉气，说：“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我就不管了，你们上社会局去吧。”

过了两天，他还是管，叫杨顺三哨来了口信说要找王老五谈谈。当时青帮有个规矩，徒弟要不听师付的话，可以立家法、立香堂，找几个大徒弟打那不听话的徒弟，作为处罚。王老五没有接近革命前已经当了他的徒弟，李洪生就受了李玉祥的委托，用长辈对晚辈的姿态出现了。

到了工会办公室里，王老五、孙世瑞、李庆云等好几个代表一气陪他，可他主要是找的王老五。

“……李玉祥，打小也是个工人，他娘还是你妹妹的干娘，同院儿住，看着你长大的，莫逆关系，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赏给我！”
王老五听着，明白师付的意思是想和伪工会一块坐下谈判，就坚决地拒绝：

“这事儿，不在我，在谁呢？全厂的工人兄弟姐妹们，人家要行，就可以，我们说，也不行，咱主不了工人的事！”

李洪生凶狠地瞅了王老五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难道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吗！”

王老五说：“管不了，你就不能管！”

气的李洪生站起来走了。孙世琚的态度更强硬，代表们坚决地把第一个绊脚石踢开了。

（写作组 整理）

二、国民党的花招

孙世琚、孙士荣等 口述

进步工会一成立，国民党机关的头头脑们总觉得不舒服，加上宪派手下人刘世.phase、孙宝钧两个人没有当选代表，宪宝璜心里也嘀咕起来。过了两天，社会局秘书长张建南和市党部执行委员宪宝璜就出面找进步工会代表去社会局谈话。

“四大金刚”听说，早有了气，敌人想要什么花招？安的什么心？他们要叫压迫人剥削人的伪旧工会代表们参加到进步工会里头，这像什么话？别说工人不依，就是几个
代表也不能依呀。一路上，前往社会局的几伙人议论纷纷，准备应战。

跨进社会局的大门，“四大金刚”就一个个的气愤地说：

“我们选的代表为啥你们不承认？工人有选举权，也
有罢免权，你们为嘛不承认，还叫我们合作，再合作就要
杀死我们了！”

几个女工七嘴八舌了好一阵，宛宝璜和张建南见工人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不好说话，就一个劲儿张罗大家坐下。等女工们骂了一阵，宛宝璜才说：

“好好讲理，不要骂街。”

“四大金刚”更生气，嚷的更凶：

“咱们一个大男子买个粗碗，粗腿粗身，这就是给你们
讲理！”

宛宝璜不响，转身朝孙世琚这边走了过来：

“老弟，我是诚心诚意和你们交朋友……不过，我劝
你们还是不干这个好，你们看，这多么危险，多操心，一
人难称百人心，你们出来做，反正也有人会说不好，还是
到政府来工作吧，职务、房子，都由我保证。”

“和你交朋友，我们可是高攀不上！”孙世琚抑止住
气愤地说。

秘书长张建南插过来说：“老孙要做官，政府也有工
作。”又指着“四大金刚”说：“这几位呢，到那儿就
到那厂，到政府机关来也行。我给你们介绍，到东亚、仁
“四大金刚”就不客气的顶他：“我們那儿也不去，我們不是为了自己找工作，我們是为了大伙！

“好，你們这些青年人，容易被人利用！”苑宝璜自从听说五厂选举工会主席的场面，就对五厂工会怀疑了，他说：“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我都是看得出的。有人說，五厂有八路軍，有共产党。別看現在国共在谈判，可我們并无tec意，我們准备就打。最近，国軍就要进攻东北了，等着全面进攻了。至于社会发展，唯物论唯心论这些，告訴你們，我都明白……”他厉声地说着，谈了一会，便大背起大众哲学上的質量互变论，破坏一点等等辯証法定律。这位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苑宝璜，原来出身是天津恒源紗厂的工人，个儿瘦高，尖尖的臉，长的一副阴险奸诈模样，老是斜着眼睛看人，外貌像似一个知識分子。他在大革命时代是工人中的叛徒，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一直做着破坏工运的工贼，爬到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的地位。他是一个十足的工贼，打着工人的旗号往上爬。

工人张锡元听苑宝璜講了半天，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說：“我們什么也不懂，光知道吃飯干活，挨打受罵，可是太欺侮人了那就不行。光懂个这，別的什么也不懂。”

“四大金刚”孙士荣、苗玉珍等也說：“嘛叫八路軍共产党呢，我們还没听说哪，你跟我們說这个，我們都不懂！”
这时，孙世激已经和张建南到另外一间屋里谈判伪工会出一半人的问题去了。余下的代表有好些已经听得不耐烦，躺在沙發上呼呼睡大觉，可是苑宝璜还是不放过他们，他板着脸对没有睡的几个代表道：

“你们知道粮食为嘛涨价？”

“不知道！”

“铁路破坏了，没法运输了！八路军破坏铁道。”苑宝璜提高了嗓子，威胁地说：“有人告你们是八路军，你们厂里有煽动分子！”

工人七嘴八舌地说：“不懂嘛叫八路。”“有什么证据？”“我们从小在厂里干活吃饭！”

这天晚上，谈判毫无结果。最后的约是第二天和四厂的工人代表左振玉一块去谈，由局长胡家华请客。代表们见天太晚，过河没有渡船，就借住在伪市总工会办公室里。那苑宝璜又眼了来吓唬人：“你们别看现在国共谈判，我们可没诚意，这市里，一路上我们都准备了人，你们无论那个走在路上，也能知道你们上哪儿去！”

“四大金刚”就故意打岔说：“你们说这个都沒用，反正我们要害死旧工会。喂！咱有一天没吃上饭了，肚子餓极了，你们想点办法吧！”

苑宝璜碰了个钉子，只得掏钱请代表们出去买东西吃。

这一晚，代表们轮流值夜，把火炉烧得通红，防备万一。熬到了天明，到了第二天早晨，伪总工会理事王鲁阁
領来一个名叫王茂福的，对张家箍说：“这是中央派来的，身份可大，专门调查贪污的和汉奸们，今天跟你们一块去。”说完，把工人李庆云的衣服都脱下让王茂福穿上，王茂福也跟着孙世琼、左振玉等去见社会局的胡梦华了。这天，胡梦华还劝五厂工会新老代表各占一半，又劝孙世琼和左振玉到政府里工作，被拒绝了。胡梦华见两人不动心，只得送他们出来。王茂福在事后对五厂代表说：“你们说的还不硬，还应该硬些才好。”这王茂福到后来才知道他是个中统特务。

第二天，厂里的工人早已在杨庄子渡口等候，因为代表们一夜没回去，工人们为他们担了一份心。一见面，有的工人拉着代表的手就哭了，是欢喜也是担忧。工人们对代表的安全特别关心，只怕出了什么事。见他们平安回来，才放下了心。

代表们回到厂里就召开大会，向工人报告到社会局去谈判的经过，公开揭发了国民党机关的收买阴谋，工人们对听蒋宝珠等称五厂有八路军共产党，非但不怕，回家还纷纷和家属谈起来。工人家属们一听高兴的都说：“那咱都是八路了，八路就是八路吧，我们一家子都是八路。对，男的女的，女的八路，小的小八路，听说八路军是干净好事儿的，都是八路多好呀。”下工后，工房里家家户户都在争着“当八路”。因为人们早都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是好样的。
三利诱

孙士荣、张家福等口述

“你们都是好样的，很能干，现在厂里很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来做管理工作，你们来，不会有问题吧！”

厂长孔赞华坐在厂长室的沙发上方嘻嘻地说，两只眼睛骨碌碌地盯着孙世珂和曹鸣平，一会儿递茶一会儿递烟。这时是进步工会成立以后。

孙世珂沉吟不语。他心想，这明明是敌人在收买自己，怎么能答应？就一口拒绝说：“我们没有能力，还是做工好，谢谢厂长的好意！”

第一次没有成功，孔赞华可并不罢休。过了些日子，又通知总务科长来进行拉拢。

一天晚饭之前，总务科长跑到孙世珂的面前，拉着他的话，很关切地说：“你太辛苦了，太劳累了，营养又缺乏，脸那么黄，到我们那儿吃饭去吧。”意思是要孙世珂到职工食堂去吃饭。那时，厂里的职工食堂与工人食堂是分开的，菜饭是一毛一毛，职工吃的六菜一汤，工人成年每顿吃三个窝窝头。孙世珂见敌人不断地用物质享受来诱惑自己，早有了精神准备，便冷冷的回答：“如果工人也和你们吃的一样，那我就到你们那儿去吃饭。”

总务科长的手松开了，忙摇头道："这，得考虑考虑。"
虑。”说着，赶快走开了。

孙发华还是不肯罢休，又通过纱厂主管范技术员来找工会代表曹鸣平说：“按你们现在的事，厂方准备给你们各升一级！”

曹鸣平当下就跟他急了：“你能不能给每个工人都升一级？不能，那我们就不能升！”

虽然拒绝了，到月底发工资时，果然给她多发了工资，曹鸣平拿了工资去找范技术员吵了一场，坚决不收。

厂方千方百计想用物质的诱惑来分化工人代表们，这时，有个别代表觉悟不高，产生了想脱离不做工的思想，有的打了酒在工会办公室里喝起来，有的人不愿走一般工人出入的小门，要走厂长和职员们出入的大门了。厂方又提出，让所有的新工会代表都升成助理员，新工会内部一些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了。党就把了这些，便在工会里召开了紧急会议，把问题放到会议上来讨论。第一是讨论提升一部分工人当助理员问题，大家在最后倒一致通过了，认为提拔助理员是可以的，但必须根据三个条件让工人选择：①技术好；②能为群众办事；③不能被收买。可是，有几个问题却发生了分歧：有的代表想脱产不做工；有的主张不走小门，出去办事不向工头请假；每月账目不必公布，代表出去要坐车等等。这四个问题来回讨论，始终是不能通过。张家福心想，当初斗争时，工人斗争昂扬，大伙心齐，怎么自己的工会成立了，倒不齐心呢，气得离开了会场。
这时女工“四大金刚”和翟淑珍等都急切等待着工会赶快分工，她们一见张家春提着脑袋走回来就拦住了。张家春把情况向她们一说，几个女工就气得跳了起来，找到工会办公室里大声对几个代表道：

“你们要学旧代表呀？嗨！你们出来，是为大众办事？还是为了嘛？”在七八个天真纯洁的小工的愤怒指责后，几个代表都认了错，四个问题得到了正确解决，进步工会的行动又一致了。

从此，党抓紧了工会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对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教育。无论谁有了错误都开会解决。工人代表李庆云在工会小组长会议中检讨了自己在工会办公室喝酒、跟人发狠；张玉堂检讨了自己当联络员外出化钱不报销。以后发现谁有缺点和错误，就动员他自己检讨，不给掩盖。党提出：工会必须团结得像铁桶一样，不能让外边的任何污水渗进来，特别是工会代表，要检点自己，防止犯错误；有了错误要检讨改正。工会小组里也随时展开批评。在这时，工人中间就开始听到“坦白”、“检讨”等等新词儿了。正是党领导的工会展开了自我教育，新工会才领导着群众轻装前进，永远前进，继续斗争。

（写作组：整理）
四维架

孙世.FloatField

进步工会成立不久，工人代表们发现有两个陌生人常常在工人代表周围转来转去，有时跑来和工人代表套近乎，装做很熟悉地和工人代表搭讪说：“某某某你们认识吧，某某某某你们熟悉吧。”

一天，孙世浮到国民党市党部去交涉问题，他骑着自行车从中纺五厂出来，过了杨庄子摆渡口，沿海河走下去，过了棉纺二厂拐弯的那个路口（那时，那儿还是比较僻静的地方），忽然后面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刚停下自行车转过身来，就看见那两个来历不明的人奔了过来，一把拉住了他，掏出手枪就想绑架。

正在这紧张的时候，工人张玉堂和张锡元、徐鸣和等骑着自行车赶来了。他们赶到跟前，下了自行车连忙抢救孙世浮，那两个陌生人见势不好，才悻悻地走开了。

原来，自从厂里出现了陌生的人，地下党组织和工会就料到敌人会进行陷害，提高警惕。后来赶来抢救工人代表出险的四个工人就是派来保护代表孙世浮的。那两个敌人派来的陌生人，原来就是刑警队的特务。

（摘自“回忆双喜纱厂的斗争”一文）
五 向李宗仁請願

张家樞、王老五 口述

三月十五日傍晚，天空灰暗、阴沉，像要下雪，路上行人稀少，在郑庄子陶家瓦房李玉祥的屋里，来了不少客人，有五厂工会的党代表们，有附近的流氓打手们，桌上摆下了酒菜，李玉祥正请客人喝酒，计谋杀害工人代表。女工齐淑花的家也在陶家瓦房住，见情况不好，就立刻把事情报告了进步工会。

孙世瑾正在工会办公室，得到消息，他猛的站起，锐利闪烁的目光瞪得老大，又是惊又是喜，惊的是，流氓打手们又来了，得准备战斗，喜的是，李玉祥逃出去不久又回家来了，可以设法把他逮捕了。这李玉祥在日本统治时期，曾是把我们厂里整理工人李敏的丈夫和黑军杀害，进步工会早已上告，在市党部、社会局、警察局都备了呈文要求逮捕，后来，警备司令部下了文，其中曾说：“……如见李玉祥时，可随时指控成訟。”孙世瑾心想，这下，可不能叫他跑了。就立刻派几个工人代表，前去堵住李玉祥，他自己也拔起脚来飞也似的奔派出所呈报，要求逮捕李玉祥。

几个工人代表进了李玉祥家院子，都忍不住气愤地高喊：“李玉祥在屋吗？”
有个工人拉开了他家的门往里一瞧，嗡，派出所的王副官也坐在里边，屋子里挤得满满的，人们正在喝酒。只听得李玉祥跳起来大骂道：

“小王八蛋们，我正要找你们，看你们能进来！”说罢，他挥舞着胳膊指挥左右的打手们：“打，逮住了，把腿给敲折了！”说着，左右的打手们如狼似虎扑了过来。李玉祥又掏出手枪拍的一下扔到桌子上说：

“看你们能进来！”

工人们见李玉祥掏出了手枪，流氓们扑了出来，就退了出来。到了门外，遇到孙世瑶赶来，他在派出所找不到王副官，谁料王副官还在李玉祥家呢。几个工人代表一边跑一边喊：“李玉祥掏手枪要开枪了，后边追上来了！”孙世瑶回头一看，果然，有几个人飞奔而来，就约着几个工人直往郑庄子派出所奔去。进了派出所的门，后边流氓就停住了。

孙世瑶拿起派出所的电话，要了市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他根据进步工会成立前军法处签的保证工人生命安全的保证书，要求警备司令部保证工人生命安全：同时，告诉他们李玉祥已见过，要求派人逮捕。警备司令部回答：要工人代表找当地派出所逮捕。但派出所和李玉祥是一伙儿的，派出所的王副官还在他家吃饭，眼见李玉祥是不会不成了。

这时，天已黑，飘起了雪花，工厂左右一下子来了几十个流氓，只听得骂骂咧咧，看光景要趁黑夜闯进工房

\* 152 \*
杀害工人，工人们都有些恐慌。

张家福得到消息，立刻召集骨干们研究。当时，伪工会虽已下台，但八区党部书记李玉祥从始至终是支持伪工会的。伪工会下台后，李玉祥还在那里忙着活动，策划推倒进步工会。李玉祥这个祸根子如果不除掉，进步工会就没有法子安生下去，虽然已屡次上告，但一直传不了他。这时，正巧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到天津，工会代表们一块研究后，决定第二天清晨向李宗仁请愿，要求逮捕李玉祥。决定后，由党支部秘密布置给党的小组及党员们分头活动；一切行动要通过合法手续，不给敌人借口，又公开指定王老五、孙世瑜、徐明和、孙文杰去和孔赞华交涉，第二天算是请假，到礼拜天补工。孔赞华也同意了。

这天晚上，工人纠察队队员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在大雪纷飞中通宵值班，沿着工房巡逻，防备流氓捣乱。工人积极分子们挤在工会办公室里连夜赶制游行用的大小旗帜，写标语，在白色的大门旗上写了“要求当局逮捕汉奸李玉祥”十一个大字。代表们连夜开会，研究游行队伍的组织分工，并分头通知工人。

紧张的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晨七点钟，由司机刘少清（积极分子）开着汽车载着工人代表，拿着请示伪政府许可请愿的信到国民党各机关，各机关值班员按一般规定写了个“知”字（意即批准），又给了我们收据。这天气阴沉，下着小雪，还夹着微微的细雨，天气冷极了，可是工人们热血沸腾，在汽笛长啸声中，赶来集合，不管天气多
么冷，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赶来了。
孙世荣向大家说明了这次请愿的意义，工人高喊：
“不得胜利，绝不回来，走啊！”

六百多人的请愿队伍就迎着风雨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四大金刚”，还有齐淑花等敢死队员，打门旗也是敢死队员孙学桐等。到刘庄，手持旗过来挡路；到台儿庄路时，每过一个路口都有十几个手拿武器的军官和宪兵队过来阻拦队伍前进，他们凶恶地喊：
“你们有什么事，跟我们说！”

打门旗的敢死队员继续向前冲去，勇敢地回答：
“你们管不了！”

说着，直往前冲。敌人高喊：“再往前走，开枪了！”

敢死队员勇敢地扛着大门旗挺起胸膛走去，不理敌人的恫吓。游行队伍冲过好几道敌人的阻拦，终于来到了李宗仁的“公馆”利顺德饭店（现在的天津饭店），队伍

154
停了下来。里边有人出来问：”干什么的？“工人说：
”要见李宗仁！“回说：”李宗仁不在。“工人说：”不在，我们就在这儿等他吧。"

这时，从门里边突然走出来一个神气十足的军官，身穿草绿色呢军服，戴了草绿色呢军帽，披着草绿色呢斗篷，走一步，就见斗篷底下的皮子一抖一抖的，他两手插着腰，撑圆了斗篷，腰挎大洋刀，走起道来大马靴咯咯的响。一走出来先是手扶着眼镜，装得威风凛凛的，朝队伍两边看看，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在大门前“括括括！”的走前几步，又回转身来括括括走几步。走了两圈，这才问：”你们干什么来了？"

工人代表上前回答：”找李主任！“
”找李主任干什么？“
”我们要求逮捕汉奸李玉祥！“

国民党军官满口喷着脏话骂道：”你们反动！“

我们把呈请愿书的收条给他看说：”我们请愿是经过政府批准的！“他马上收起那凶恶的面孔，奸笑着对工人说：”你们的表现既然是爱国的，那么，派代表来谈吧！“

这军官看了代表们一眼，把孙世铭、张家枢、徐明和、张锡元等几个放了进去。这军官约摸四十来岁，自称是副官长，一坐下就问：”怎么回事！“

孙世铭陈述了一番李玉祥过去和现在的罪恶，并说李玉祥带着流氓，现在想要杀工人等，副官长就阴险地问：
“不对吧，你们里边有赤色分子煽动，这是捣乱，反动！”

工人代表里面有同去的叛派国民党手下的刘世泽，这时就走上去说：

“李副官长，我们，都是国民党员。还是老国民党员了！”刘世泽是说的他自己，可是，这李副官长倒相信了，他的口气变了，说“很好，你们的行动很好，爱国，帮助政府抓汉奸，只要不是赤色分子，政府可以保证三天以内逮捕！”说到了这儿，副官长瞪住孙世瑜问：

“你真不知道有赤色分子呢？你哪儿人？做几年工了？”

“我们都是打小儿做工，天津人，住这里好几辈子了。”

这副官长沉思了一下，说：“回去吧，以后你们不要这样闹，这没什么，事情交给我就是。”

说着，在工人們的请愿書上签字。

孙世瑜立刻走出门外，高声对大伙宣布：

“今天李主任沒有在，李副官长接见的。我們的要求他签上了字，大伙回去先干活看看怎么样再說吧！”

队伍里立刻爆發一片欢呼声。雪落着，工人們在雪地里狂呼：“工人团结万岁！”“打倒汉奸李玉祥！”

游行队伍回来时，走到郑庄子派出所门前便高喊：

“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汉奸李玉祥！”
这时，工人們在雨雪泥濘的道路上走了一天，滿身污泥。派出所門前有一堵花砖牆，雪落得很厚，大家就把游行的小旗子插在上面，对着派出所門里怒罵起來：

“打倒你这个貪官污吏王副官！
王副官和汉奸一个
鼻孔出气！”

“打倒王副官！打倒袒护汉奸的王副官！”
大伙气的可着嗓子大声喊，王副官早吓的从后門溜了，
人們喊了一阵，孙世培说：“走吧，李玉祥也快进去了！”
工人們这才陸續回了厂。
二十日，李玉祥被天津市高等法院审訟后，关起来了。国民党警察局也派来一部分队伍来双喜工厂，伪装保护工人安全，其实是暗中监视工人。

可是，青帮头子李洪生又一而再再而三的托人信給
王老五。王老五只得去了。李洪生这一回軟了，他說：

“你就是害了我，我还要管这件事，这是咱一家子的事呀，弄出来叫人笑話，将来闹下去，打头碰脸的，冤家
宜解不宜结啊！

王老五心想，什么一家子的事？李玉祥是工人的死对头，我绝不能在封建子面前低头，就坚决地回说：“这是工人大伙的事，对垒都是工人自己去的，咱可主不了工人的事！

青帮老头子被拒绝了，他想用封建关系调解的阴谋粉碎了。

李玉祥终于被判了八年徒刑。工人们为了庆贺除掉这个祸害，买了红粉皮，吃橡面庆祝胜利。郑庄子从此少了一条地头蛇。

（写作组 整理）

[附]  厂方在李玉祥被捕后

给中纺公司的报告

为呈报事据工会代表孙世琚、张家枢、王贵弟、孙文义、徐明和、曹鸣平、李庆云等于本月十五日午后十时半，前来报称：于今日（十五日）下午六时，工人五名到郑家庄松竹里二十号五区党部执行委员李玉祥家中，系奉警察司令部稽查处督察室聘查长面嘱前往逮捕李玉祥，事前通知郑家庄警察派出所借同办理。王警官以李玉祥系党员无权逮捕，工人仍自行前往。李玉祥见工人到来，持枪拒捕，家中并潜伏流氓王洪宾、史二昌、田老九、王老三、
孙三旦、曹老八、张玉四等二十余人，手持斧把、腿刀等武器齐声呐喊，除将工人路凤岐抓着痛加殴打之外，其余工人见势不佳，拼命逃走。逃回工人报告警所后，该所警士，应即负责逮捕，双方起哄，然经十分钟许前往，李玉祥已逃逸无踪。故请厂方核夺协助办理，并呈转总分公司，速达各官署，迅予解决，以安人心。工人等以生命危险及恐吓等情印入脑海，大有罢工请愿之势等情前来。事关厂外，未便擅处，理应据情备文呈报，恭请查核。此呈。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

天津第五厂临时负责人孔致华谨呈

六谋福利

张家福 口述

由于工人斗争的胜利，进步工会的成立，工人们在生活上有了改善。过去随便打骂工人、压迫工人的拍头和特务腿子们也不敢压迫工人了。因而对其他厂和当地的居民有了一定的影响。

进步工会从建立那天起，就经常有其他厂工人和当地居民，通过一些工人关系，秘密的找孙世琚、张家福等，研究办法如何推倒压迫工人的伪工会和如何反对国民党党委任乡长等。中山钢铁厂在1948年的三、四月间就推倒了伪工会，成立了工人自己的工会。中山钢铁厂和裕太纱厂的工
人经过数次斗争，也选派了工人代表到伪工会内为工人办事。

由于这样的联系，双喜纱厂的斗争得到了当地群众和周围工厂工人的很大支持，如审判汉奸李玉祥时，有郑庄子和汪庄子的居民做了证人，以及掩护我们工人代表。十五庄联保被押在稽察处的工人代表。

进步工会一方面领导工人继续和敌人斗争，另一方面，着手工会的建设工作，几个委员进行了分工，建立组织，群众工作就深入细致了一步。

首先，工会抓紧解决福利，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当时，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吃的是对不上味的棒子面窝窝，连一口菜也吃不上，食堂里面都是皇亲国舅，这些人反倒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挺起了大肚子。党通过进步工会就派委员曹鸣平亲自掌握食堂。曹鸣平同志就想尽一切办法完成党给的任务，她到食堂里以后，争取了炊事员，分化孤立坏分子，把一些极坏分子赶走，她自己加强督促检查，亲自过手粮食蔬菜，并努力教育食堂工作人员为工人办事，成立了有工人、炊事员参加的伙食委员会，向厂方交涉，每个工人每天增加了四两大米，于是，每顿饭都增添了大米粥。当时，工人群年都吃不到大米了，七七事变后谁吃大米日本人就要押起来，一顿三个窝窝头，许多年都这样苦下来了。在伙食委员会的努力下，早晨，工人吃到大米粥，馒头，窝窝，咸菜，中午是棒子面，下午是白面，两顿都有熟菜、稀饭，每星期节余下来的钱，还改
善生活，吃肉、包饺子。工人们见自己的工会一组成就改善了生活，个个高兴极了，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的工会给自己的办事的好处，更热爱新工会了。

工会又发动工人们义务劳动，在厂里几十亩空地上种了菜，供给伙房，又把剩下的菜低价卖给工人家属，改善生活。

那时，大工房里又臭又潮，臭虫都长了尾巴。到春天，打死的死狗堆在屋子里蛆，炕上连一张整席子都没有，工会就在大工房里搞清洁卫生，把大工房刷上白浆，并和厂里交涉，给炕上买了新炕席，弄走了死狗，屋子里又白又卫生，工人们高兴极了。

工会还开办工人夜校，把有文化的一些职员组织起来义务教学，有二百多工人参加了夜校，把日本时期弄坏了的电影机也弄出来修好，搞了电影队，工人们自己放映电影；工会还组织了球队，女工们下班以后也参加打球了，闹剧社、话剧社、消费合作社，都接着手搞了起来。到了礼拜天，工会把厂里的大喇叭挂进工房，放送音乐。

车间里，修理了一下通风设备，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工会还发动工人挂牌识字，小学生写一个字挂在机器上，或者钉在机器上，让不识字的工人学，当时，绝大部分工人一个字也不识，看到一个字被自己认得了，就像得到了宝贝似的。马润华就在市里教别的工人认字。有些工人后来有了一些文化，就从这时开始学习的。当时大伙儿学习认字，觉得做梦似的，他们连做梦时也没有梦到自
已居然会識起字来。

工会为了保护工人利益，与厂方交涉好，凡是工人被开除或者上新工人，必须通过工会，不准厂区行政随意惩罚工人。工人生活大大地改善了，每月关钱的时候都是发的新棒子面。

就在这时，伪工会的旧代表们，因为不能压迫剥削工人，却恨得咬牙切齿，千方百计地想要破坏，一些封建把头们，也因为进步工会给工人撑了腰，他们不能再欺压工人，暗地进行勾结，阴谋破坏。进步工会虽然处在这种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但始终不懈地为广大工人谋福利，因而，工人们就自觉自愿地纷纷起来参加工人纠察队，保卫自己热爱的工会。

（写作组 整理）

七 工人纠察队

李庆云、孙世栋等 口述

“一！二！三！——四！”进步工会成立不久，每到下班以后，人们就听到工人纠察队跑步时的喊声。男女队员围着工房一边跑步，一边大声喊着，整齐的步伐声，雄纠纠的喊声，震惊了伪工会残余的流氓打手们，他们气得手发抖，心发颤。进步工会的声势愈来愈大了。随着斗争一天天尖锐，纠察队员的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于是，
外边的人们纷纷传说，中纺五厂的工人快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了，因而敌人更加注意起来。

这支工人纠察队是从斗争中产生的。自从党提出了推翻伪工会后，李万清喊着要杀人时，工人们就自动武装保卫进步工会代表。在选举进步工会时，纠察队员们在会场里维持秩序，而敢死队员们就成了纠察队里最勇敢的骨干。新工会成立后，斗争更尖锐了，又号召工人们自动自愿参加，立刻就有几十个工人报名了名，每天轮流值班。每天下班以后，工人就自动去工会报名，值班的时候，自己提了棍子到工会听候分配。工会建立了签到簿，谁值了班谁自己在上面签名。参加纠察队的人数愈来愈多，后来，有二百、三百人了，队长李庆云就带着大伙在下班以后跑步锻炼，加紧锻炼。

“豁出这一百多斤去！”工人纠察队队员们抱着投入战斗的决心加紧锻炼，时刻准备和伪工会的流氓打手斗争。他们在工房附近的球场上练习齐步走，沿着工房四周跑步，慢慢的就形成了习惯，一到下班后，纠察队员先吃饭，然后到工会门口集合站队，跑完步，一部分人就分配值班，一部分人休息。一个晚上，往往有四五十个人轮流值班，工会办公室的桌子上都睡满了人，随时都准备着一跃而起投入战斗。站岗的队员们沿着工房四周巡逻，站在围墙边看着工房外面的动静。有时，遇到伪工会的代表们深夜回来，就在他家门前放上个哨，观察他们活动。工房后面的木栅栏门边，也经常站着岗。女队员们一个个戴上男
帽，穿上大棉袄，和男工一样值班。

女工们参加的人数愈来愈多，女工队就设立了分队。女工大队长是孙士荣，分队长是田宝珍、苗玉珍等。参加的女工大都是青年，女纠察队员们在曹鸣平的建议下，还自动做了蓝布反领的工人服，就像当年解放区女同志穿的列宁服，一到外出时，她们就换上，整齐一律。有一次，市里集中烟草公司在女青年会礼堂选举工会，纠察队长李庆云就带了四十多个男女队员去列席，女队员们换上了制服站在一边，显得格外的整齐。烟草公司的工人代表在台上演讲，说：

“……我们工人，要争取吃饱穿暖……”

我厂的纠察队员们就忍不住地齐声喊：

“对！咱们要争取这个条件！”

这晴天霹雳一声喊，潜伏在会场上的流氓打手就想要来打人。幸而烟草公司工人及时送了口信过来，纠察队员们才及早离开了会场。

女纠察队长孙士荣表现勇敢、积极，她和几个好友田宝珍、苗玉珍、孙士兰是纠察队里的主要骨干。孙士荣自从得到地下党员陈小兰同志的帮助，在日本投降以后，她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活动。这期间，就被党组织吸收入党，入党后，就更积极的领着女纠察队员们干起来，保卫着工会。

当时，有一个和伪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张振远，进步工会为了争取他们一块斗争，就叫他当了纠察队的副队长，可
惜，他貳性不改，最后还是成了可耻的工賤出卖了工人兄弟姐妹，在敌人壓迫时做了敌人忠实的走狗。

但，全体寍察队員都是英勇、坚决的，他们在斗争中有力地保衛了进步工会。

（写作组 整理）

八 女英雄怒打李万清

孙士荣、黄淑珍 口述

李万清是日本时期双喜紗厂的一个杂工，工作是在赁里打扫大道、干杂活儿。可是他与其他杂工待遇不同。他虽說是个杂工，但是从来也没摸过条带，什么杂活儿他也不干。他争干些什么呢？

他歪戴着帽子，穿着一身绸子裤褂，緋衣鞋，腿上扎了飘带，手里拿着两个小铁球，整天围着人事課日本人清水跟前转，真像狗不离主似的。有时給清水引着路到工人宿舍里乱窜，工人为了吃穿要到紗厂里点东西，瞒了日本人也瞒不了他。原来他这个“杂工”，实际就是溜溜躂躂到处打听工人谁偷东西啦，谁“破坏”啦，拿挂名钱的。他是日本忠实的管家狗，小日本清水连手槍都叫他挎着。

有一次，紗厂一个姓韩的工人，不知“犯”了什么“罪”，李万清就挎着手槍追赶，结果，这工人被抓到人事課，日本人清水又打了一顿，李万清站在一旁哈哈大笑。
工人們為了少惹事，就得离他远点，可是他呢，还以为工人們怕他，没人敢惹，所以在人群中常挑起大嘴指，眼皮往上一翻，拍一拍胸脯說：“李二爷就是这样，看誰敢惹。”工人們一听他說話，早就不爱听了，心里說 “你別洋气，君子报仇十年还不算晚呢！早晚要等上你。”也有的工人說：“骑驄看書本咱們走着瞧吧！

一九四五年苏联出兵东北，小日本被打的落花流水，日本投降了。这个消息很快地傳到了双喜紗場，工人们沒有一个不乐的。心想日本鬼子欺侮的我們够瞧，这回可該自由了。有的工人拿着棍子到处找日本人，准备狠狠地揍一顿，打死几个撈撈本，也有的想不打日本人，連他的狗腿子也捎着。誰知道事情并不是工人們想像的那样，厂里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馬上收买了大批流氓坏蛋，又从新压在了工人的头上。李万清这个小子，真够“机灵”，馬上搖身一变，又抱住了伪工会的大腿，仍然和过去一样，整天监视工人们的行为。因为他是“有功之臣”，被伪工会看中了，不久便“赏”了个保长的職位，权威就更大了。他在宿舍内说么是么，真是无人敢惹。这个“寸地王”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吃、喝、玩、乐，五十来岁的人也娶上了二十来岁的小老婆。

一九四六年二月間，中紡五厂地下党组织领导准备推翻伪工会，便組織进步工人和地下党員到中紡四厂开会，不愷消息被李万清知道了，便打發他小老婆偷偷摸摸地前往四厂探听消息，被进步工人赶了出来。李万清知
道以后，急红了眼，到处宣扬他有电刀子，谁要‘捣乱’就算死谁。

进步工会成立以后，组织了纠查队。女纠查队员常常在工房周围检查行人，有陌生的人就来检查。李万清就在工房里骂道：“现在叫一伙子臭女的给吓住了，小黄毛丫头要遭殃啊。”人们听到以后，就告诉了“四大金刚”孙世荣、苗玉珍她们。“四大金刚”听了，气的齐声说：“赶明儿揍他。”“四大金刚”就找胡艳霞，胡是整理工的女工，挺有劲儿，约她一同去打李万清。

一天，“四大金刚”和胡艳霞、黄淑珍等六个女工，一块儿站在工会办公室门前，手拿着棍子，有个男工把李万清从家里请出来了。胡艳霞往前一窜，上去就把他按倒在地，后面几个女工一拥上前，举起棍子狠狠拍拍的打了起来，只听李万清一个劲地叫着讨饶：“大姑们！大姑们饶了我吧！”女工们谁听他那一套，一边打一边说：“姑奶奶们情着你啦！”谁也不肯罢休，路过的人们一看见打他，谁也不管啦。也有的工人喊：“这个老混蛋早就该打。”霎时，李万清成了个疯子，披着头，唾沫落了满脸，跪在大道上，好像等待执行枪决似的。李二爷的威风，保长的劲头，早给打飞了。他急的向旁边工会办公室的人求救，高喊：“呀，世琚！他们把我可打坏了呀，救救我吧！”女工们骂道：“叫你说，你再看不起小黄毛丫头，小黄毛丫头没招你惹你。你还说不听。”打着打着，孙世琚和王老五从工会
办公室走出来，假装着拉架，对女工们说：“嘿，你们怎么了？”女工们这才放手叫他跑了。

女工们打完李万清，心里还有气。原来这李万清的小老婆崔凤兰（在整理车间做工），仗着李万清的势力，也在车间里骂街，胡艳霞早恨透了她了。回到车间，气凶凶地又把李万清小老婆也打了一顿。小老婆当然不饶，大哭大闹，胡艳霞说：“我把你丈夫也打了，你怎么着吧，再骂街？”

打了李万清不久，工人家属就自动选出了自己的保长孙景周，把李万清赶下了台。

（张金凤 整理）

九反扑

张家框、王老五 口述

八区党部书记李玉祥押在狱里，伪工会失去了靠山，把伪工会的一些旧代表打死了，他俩泄足劲，纠合了一批流氓打手，企图反攻。

伪工会头头的流氓头子是冯培如和万宝起。万宝起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叛徒，当过伪总工会执行委员，眼下是国民党八区党部的委员。三月二十四日，冯培如拿着菜刀还带了几个打手返工房“卧底”，万宝起就正面出头当打手。

三月二十四日早晨星期天，工人代表徐明和三步并作

168
兩步進了瞿淑珍家，他氣喘吁吁的對張家樞道：

“坏了！外边儿万宝起領着流氓要打过来，他們搞了里应外合！”

徐明和剛說罢，进步工会理事长孙世弼走进来。

张家樞沉思了一会，說：“你們兩個快去告訴工人，
大家关起門進屋子去，他們想要造成群毆，想打咱們。咱們一个也不出去，那就打不着人！咱們跟他們走法律手續！”

徐明一听，覺得不错，就分头跑出去布置了。孙世弼这时就到职员宿舍，找给厂长办事的炊事員，以买菜为名到新钢厂报讯，不一会儿，两边宿舍的围牆里敢死队员一个个出来站上了岗，有的就地撿下了砖头，放在牆上，准备砍流氓。

流氓們直往里边投砖头石片，砰砰拍拍的砖瓦声，使工房里造成了一片恐怖，可是家家都紧閉着門不出来，流氓們没辙儿了。

住在中纺三厂宿舍里的工人李子和，不知道这儿发生了情况，朝厂门口走来，流氓打手瞿恩荣就猛的一跳，大喊：“打他！”

流氓們一拥上前，顿时把李子和打了一个大血臉，身上受了重伤。里边的敢死队员用砖头朝流氓身上扔过去。
等将李子和抢进工厂抬到人事課内，当时工人们想給李子和擦去脸上的血，张家樞这时对大家說：“不要給李子和擦脸，我們还要带着血人和他們打官司去。这就是敌人
行凶的证据，叫孙学桐赶快找大夫为李子和打强心针。”因为当时李子和受伤很重，请求来了大夫一直看着他。

这时想里应外合的流氓们再也找不到机会捣乱了。可是“队伍”在工房内的冯培如，就沉不住气了，他就拿着菜刀从屋中闯了出来，想见人就打，造成群殴。他到院子后，看家家紧紧闭着门，没有什么人就打，就一直跑到工房大门口，看孙世培等都在大门口站着，他上去就拿刀砍。孙世培一转身把他抓住了，交给了驻厂军队，把冯培如活捉了。这时新中山钢铁厂的大枪队也来到了郑庄子，驻在郑庄子的纱场女工秦凤龙等当了大枪队的向导，抓流氓打手及国民党党部的特务。

新中山钢铁厂的大枪队原本是李宗仁派来以保护双喜厂的工人安全为名来监视双喜厂的工人的。党支部根据大枪队的贾队长和汉奸李玉祥的矛盾，由孙世培负责向他作了争取工作，因而他也做了一些对工人斗争有利的工作。

王老五把大枪队领到八区党部，在大门口一堵，好家伙，院子里站着七八个流氓！王老五从十岁就在郑庄子住，土生土长，哪个流氓打手他都熟，就领着大枪队进去邃。那万宝起初慌了，想要开脱，连忙分辩说：“我不是，我是来串门的。”

王老五不理他的碴，嘴一呶，大枪队的贾队长就举起盒子枪命令万宝起解裤带。这天，大枪队来的急忙，忘了带绳子啦，贾队长就想出了这个妙法，让流氓们一个个把
裤带解下，提着裤子没法跑。万宝起不肯解，贾队长说：
“不解我崩了你！”

万宝起软了，解下裤带，可他还想开脱，对王老五求情：“你还不知道我！老实八脚的，咱在一起多年了呀！”

王老五心想：是啊，老实八脚，你今儿一早就带了人打进来，看你那威风那儿去了。王老五不搭理他，大枪队带上走了。

这一天，到了郑庄子流氓的窝，一共逮捕了十三个流氓和旧代表，如赵铭海、崔家林、万宝起、冯培如、王梦符、时宝发、曹桂廷、张万明、肖振歧、刘宗英。十三个流氓解了裤带蹲在工会门前墙根底下，平时的威风一扫而光了。

工人代表徐明和等在当天下午把流氓们送到了警察局，因为有受伤的工人李子和见证，流氓们和伪工会旧代表都判了徒刑，扣起来了。

这时，进步工会眼面前的敌人李玉祥、伪工会旧代表、狗腿子流氓们先后被逮捕。由于进步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一次次战胜了敌人的反扑与破坏，工人们自己的工会便愈来愈巩固了。

（写作组 整理）
十 奪 刺 刀

孙士荣、徐明和等口述

四月里一天下午，中纺四厂的五、六个工人代表骑着自行车来到双喜工厂门前，正要进工房，厂门前的伪军突然大声喝道：

“下来！”

四厂的代表王玉起、沈文光等从车上跳下，扭头看了伪军一眼，没说为什么就推车进去了。

这天，四、五两厂的代表共同研究了如何对付中纺公司散播的谣言问题，以及分化流氓问题，自从四、五两厂工人选举出自己的工会后，国民党机关及中纺公司想尽办法支持伪工会和李玉祥，进行破坏。工人进行了数次斗争迫使国民党将李玉祥和伪代表们押起来了。一宗过去了紧跟着就是第二宗。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国民党特务头子“邵华”来津后，敌人的办法就更阴险了，他们由中纺公司派了两个最得力的厂长，到中纺四、五两厂担任厂长，人事课也换了摇身一变的日本特务担任课长。他们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混进工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欧阳潮，进行分化工会内部，将一部分不坚定的群众用金钱、地位利诱进行收买，分化我党党员和群众的关系，然后再收买流氓打进步代表、捣毁工会。因为当时中纺五厂（双喜）为
了反对流氓，也掌握与争取了一批参加过青帮的工人。他
们和四厂那些要打代表的流氓也认识。四厂代表来的目的，
在公开方面是研究生产，实际是研究通过五厂的工人
从流氓内部分化，破坏他们的计划。四厂代表出工房门
时，护厂军队凶狠地拦住了四厂代表王玉起喝问：
“刚才你骑着车，我叫你下车，你怎么还不满意？”
王玉起道：“我并不是进你的厂，我是进的工房，你
叫我干嘛？”

厂里的军队原是和李玉祥一鼻孔出气的，自从李玉祥
和旧工会代表、流氓们被逮捕后，军队与厂里的一帮封建把
头们勾结，有时故意鸣枪吓唬工人，经常找进步工会的岔，
这时，见王玉起顶了他几句，那个兵就蛮横起来，嘶声喊道：
“混蛋，我说了你还不愿意！”说着，“叭”的一下
打了王玉起一个嘴巴，一手抓住了他的胳膊，王玉起手里
正推着自行车，他搡开了胳膊扭转身去锁边拦自行车，这
当儿，王老五正送四厂代表出来，见伪军打了四厂的人，
急得跳了起来，一把抓住这个兵痛骂道：
“你们这帮子畜类，你们这是干嘛，整天吃了工人喝
了工人还要压迫工人，你们这是干嘛？”

那个兵凭着有枪，蛮不讲理，“叭”的一下又打了王
老五一个耳光，王老五大怒，飞起腿来踢了那个兵一脚，
那个兵倒退两步，踉跄地摔在锁边前，可他一骨碌又爬起，
叫了一声上了刺刀冲来，这时屋里的别的兵也都上了刺
刀，端着枪冲出门来。王老五一把抓住枪杆，向身后的工
人代表們大喊：“打呀！打他們王八蛋。”

四、五兩廠的代表們一个个怒气冲天，十來個人奮不顧身迎着刺刀前一衝，扭打了一陣，只听得七里咔嚓一片响，代表們一个个抓住了軍隊的槍杆把刺刀拔下了。軍隊一見刺刀給拔下就又拚命地推上子弹，代表們哪兒怕它，一手抓住了槍口，一手用刺刀掄他們，兩邊工人愈聚愈多，有的工人也上來動手。正扭打着，地下党支部張家樞見情況不好，就給電力部工人曹鳴鐘打電話說：“外邊仿軍打代表了，要立刻向各兄弟廠發出鬥爭訊號，拉響大笛吧！要求別廠支援。”

曹鳴鐘和地下黨員顧景章兩人會同被部爭取過來的工頭姜延棟一同前去，拉響了汽笛，鳴鳴鳴的汽笛連續响了約二十分鐘，向各兄弟廠發出了警報。在此同時，孫世瑣已堵住廠里的交換台，向各兄弟廠打電話聯繫，各兄弟廠立刻關車罷工，大隊工人從全
市各条道路向五厂奔来支援了。

厂内关车的工人队伍直奔厂门门口，“四大金刚”和女工积极分子们都跑到最前面。这时，伪军班长、排长都到了，下命令不准军队再动手。工人代表们也放开了手，王老五向车窗外奔来的工人喊道：

“工人兄弟姐妹们，他们拿刺刀刺你们的代表了，打了代表了！”

工人一听，气得一拥上前，个个伸出拳头要打，“四大金刚”奔到头里，护厂军队一见工人都出来了不敢再逞威，直往厂院里退去，一直退到大院里。孙世琚与各兄弟厂联系完毕，就朝人群走来，对工人高喊道：

“大家停止吧，咱们有话跟他们说，兄弟姐妹们，咱们跟他们讲理！”

说完，大家逐渐静下来，由孙世琚跟吴排长及护路队副司令等开始了说理斗争。

这时，张述楠走进人群，把王老五、“四大金刚”等拉到了一边说：“四厂来人支援我们了，可是现在杨庄子摆渡口不叫过，他们把渡船截到了河中心，过不来了！”

王老五急道：“咱们去迎接！”说着，带了一帮子工人朝郑庄子渡口飞跑而去。

这天，中紡四厂来我厂研究工作的代表中有一个名叫李之华的，当两厂代表和伪军发生冲突时，就飞快地骑着车子回四厂去了，于是四厂工会就立刻组织了工人，关车，到我厂来支援，一路以苏志新为首，从杨庄子摆渡口
过河，但队伍到了渡口，杨庄子水上警察局把渡船早已摆到了河中心，他们拥挤在渡口过不了河。

我们厂里的工人代表王老五、徐鸣和、李庆云、"四大金剛"、秦凤荣等十来个人直奔到郑庄子渡口，对渡船高喊：

"过来呀，摆渡的摆呀。"

"不是我们不摆呀，水上警察局不叫我们摆。" 摆渡的人站在船上高声回答。

这时，两厂工人就都隔着海河扬着手嚷嚷，"四大金剛" 们都急的直骂，大家气的磨掌擦掌不知怎么办好，王老五急了，把手一拍，说：

"我下去！"

旁边有个女工一把拉住了他，说："五哥，你别……"

正说着，只听卜通一声跳下去了一个人，大伙一看，原来是王玉泉，他身穿着裤子过河去。这时节，是五月初，水还冷凉，河浪又高，王玉泉跳到中间就沉不动了，眼看着水流往下游流去了，两岸工人着急了，喊道："救命啊，快啊！"

河对岸的四厂工人就通通通的又下去了几个，急忙下去救王玉泉，工人们就大声喊船老板：

"你要俺死一个人，你全家偿命！"

船老板有些害怕了，打开舱，跳过船，四厂的几个工人把王玉泉救上了渡船。船老板对工人说：

"水上警察局不让我们摆，他们都在院里喝茶呢。"
工人們一听气更大了，沒等到船到岸，五厂的几个工人就一个个跳上渡船，准备找楊庄子水上警察局的人說理去。对岸出现了几个水上警察局的警察，当船到河中时，他们高声嚷：

“弟兄們，别着急，不是我們不叫摆呀！”

“誰不叫摆？”

“我們的副官！”

船已撈岸，工人們就急問：“副官那儿去了！”

“那儿！”李庆云往前一指，說着，四厂的一部分工人就跑前面找去了。五厂里的工人們拥进了楊庄子水上警察局，院子里果真摆着一个小圆桌，几把磁壶，茶碗里还正在冒热气，分明是剛斟上呢。工人們怒火上升，拿起茶壶茶碗哗啦一声砸了个稀烂，張錫元跑进屋子一把拉下墙上的电话机朝海底河里扔去，通的一声掉到河里了。工人們拥进屋去，把門窗上的玻璃狠狠地砸了，滿院子只听得一片乱砸声，外边的工人满肚子气没处发，就勢一推，把花墙也推倒了，还有砸椅子的、桌子的。正砸得起劲，我們厂的工人李庆云把副官揪来了，王老五抢上前去朝着那佐官怒問：

“河那边，軍队打我們工人，刺刀刺了人，你們不保护我們，还不给摆渡，这是嘛理？”

李庆云輕輕把王老五推开，揪住副官的衣领，揉了他几下子，那副官还分辯：

“这是上级的命令，不是我呀！”
王老五上去打了他一个巴掌：
“今天差点没淹死人咧。你见死不救？”

李庆云也狠狠地打了他几下。这时，愤怒的工人全
上来打开了。正打着，忽听一声喇叭响，门外来了一辆吉
普车，跳下个军官，腰挎手枪，朝人缝里挤来，一边喊
道：“弟兄们，别打别打！”

这时，人们打着打着都打到杨庄子河沿摆渡口了，副
官的帽子早打飞了，正给打的没处躲藏，那军官就伸开两
臂把副官的头抱住。
“我叫你不打！”四厂一个大高个儿工人愤怒地喊。
一边喊一边从后边
给这军官一个耳
光子把帽子也给他
打掉了，军官慌忙
拾起帽子戴上，两
手捂住帽子，扔下
副官，自己使劲往
外挤奔，吓得两步
一窜的逃上汽车。
“快开，马上走！”他慌忙地命令司机。那司机也
带着枪，可是不敢
动弹，工人们就大

178
喊：

“把那王八蛋揪下来，打，打！”

军官立催：“快，快！”

吉普车飞也似的逃走了。

人们又继续追那副官，副官抱着个脑袋躲到墙根前，有人就把他脑袋朝墙上碰了几下，这才稍解了点恨。

这当儿，土城的一个警官领着分局的一批警察赶来了，高喊：“算了，算了，别打了！”

说着，进来忙着拉架。这时，副官的军装已经扯烂，上身也没穿的了，下边光剩了个裤叉，工人们这才罢手，把队伍整理好了过河。

过了河，五厂的工人和四厂的工人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喊口号前进了：

“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压迫工人的军队！”

“要求护路队从我们厂里撤出去！”

队伍来到郑庄子，只见天津市各兄弟厂前来的支援的工人们已经从我们厂门口一直拉到了郑庄子街道上，厂院里也挤满了工人，口号声此起彼伏，上万工人集合在这里向敌人示威，抗议国民党军队对工人的压迫，口号声震天地动。

伪护路队的副司令及副团长来了，天津市国民党机关的头头们也来了，工人们派代表孙世琚、王老五及其他厂的代表等和他们谈判，要求立刻把军队撤出去，惩罚行凶
士兵，赔偿工人损失，负责治疗重伤工人。在工人们强大的压力下，反动派答应了。这时，王老五就出来对工人们讲话，他说：“我们胜利了。”他把和国民党机关代表所谈判的条件和过程向全厂和各厂工人报告，并征求大家的同意，最后又说：“这主要是靠工人团结，如果不团结，什么事也胜利不了，咱们做事，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厂有厂规，咱们只要遵守厂规，任何人不能欺侮咱们，他们要想欺侮，工人兄弟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打倒他。感谢今天各厂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天晚了，大家回去吧！

斗争胜利结束了，天色已晚，那护路团的副团长却不走，他把王老五找了去，一个劲的奉承说：“你真能干，这么多年青，真卖力气，你是那儿人？

王老五一边回答，一边心想：这家伙准没有好事。副团长又问：“上过学吗？”王老五说：“没上过。”副团
长就露出来意了，说：“你很能干，我愿意跟你交个朋友，你拉家带口的，注意别让人利用你，将来别那么干事，以后我可以给你找个好事做。”

王老五淡淡一笑，说：“多谢你，我不识字，我还是干活好，别的事我不干不了。瞎字不识一个，在厂里，为工人兄弟们出点力，是好事儿。”副团长还是不放他：“以后有事，你可以找我。”王老五一口拒绝道：“你把军队调走了，我没什么事可以找你。”

副团长见什么也打动不了他，就只得让他走了。到深夜，这位副团长还在想她找别的工人代表她们谈话。工会里的徐明和说：“人们都回去了，找不到了。”他才罢了。
然而，敌人是凶狠狡猾的，说第二天撤退军队，却并没有撤走，相反的，更毒辣的阴谋，就在不久之后策划成了。
形式变了，环境更残酷了。群众也有些疲劳了，大的斗争再搞下去就会造成损失。可是一时又不能和党接上联系，得不到新的指示，只有按照原来的方针坚持下去。为了使工作不受更大的损失，将斗争作了些收缩。同时也将暴露了的同志撤下来，换上群众出面领导斗争，如这次出面讲话的就是王老五。不管怎样想办法，因五厂当时在天津市闹红了，不只敌人注意，就是我们兄弟厂有事，或是全市的事，也需五厂参加。我们在斗争上虽然胜利了，但从此以后，工作上却被动了。由于我们不善于在不利条件下机智灵活地迁回作战，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写作组 整理）
逮捕前后

一 伪二中全会以后

张家樑 口述

伪二中全会以后，敌人改变了手法，有计划的对付我们。戴笠亲自到了天津。三月份，伪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到过天津，对各反动工会的头子讲了话。五月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委时子周被撤职，五月以前，市党部内部不统一，五月以后，邵华上任，苑宝璜害怕新的主委不重视他，就对邵华百般赞扬，大吹大擂。但邵华到天津第一天工作，就有工职派苏砚田在市党部委员李墨元的支持之下进行倒苑活动，领着数百工人到市党部请愿，控诉苑宝璜破坏工运，曾经参加过共产党，说苑宝璜曾在恒源纱厂贪污。当场，邵华表面解释了事，但对苑宝璜就万分怀疑了。邵华听说五厂选举工会时有学联散发革命传单，大为惊訝，认为五厂有共产党操纵，就召集了工职派、工联派的人召开紧急会议，询问五厂工会历史上的领导关系，并且当场威吓苑宝璜说：“事情要你负全部责任，北平行戟都知道了，天津工运...
复杂，共产党不少，警备司部令已接到北平行密电，正要调查你。”张宝璜极力解释，说五厂工会没有问题，是由他手下人刘世谭、孙宝钧在搞，但邵华已不信任，便极力支持工职派，并介绍工职派头子苏砚田，付秀山等到稽查处陈仙洲处与王朝新调到专门调查中纺五厂与四厂的问题。

这时，地下党组织早已得到上级指示，不能再大搞，要注意隐蔽，但过端午节时，因为日伪时期过节放一天假，还发点白面，可国共军队来了什么也不给，照常上班。三、四、六厂出头组织连续罢工三天，五厂也就只得跟着罢了一次工。当代表们到市党部去请愿时，邵华就出面说：“这事是中纺公司的事，我们这里，只能备案，不能直接解决。”说着，随即把张宝璜手下特务刘世谭叫进里屋问：“你们厂里经常罢工，是不是有共产党？”

刘世谭当时已经参加了军统，与稽查处陈仙洲挂了钩，便说：“没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同盟！”刘世谭自从到五厂混入进步工会活动后，一直受张宝璜直接领导，经常接受指示，监视进步工会内部的活动，也屡次向张宝璜反映，但张宝璜自己争权夺势的野心很大，总想抓住五厂工会与工职派的人对抗，也就不去正视五厂工会的内情。

而此时，邵华便直接指示工职派付秀山、苏砚田的活动，付、苏与五厂修理工头张树发等联络好，计划推翻进步工会。在五月端午节罢工后，敌人便决心镇压。端午节的白面刚发下去，第二天，稽查处就下令去传讯孙世琚，在工人宿舍里挨房搜查。徐明和代替孙世琚前往稽查
处，稽查处把他放回，非要孙世琚不可，工人们就掩护孙世琚撤退。不久，敌人有计划的逮捕了三十七个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五人：张家榴、马润华、曹鸣平、曹鸣钟、孙士荣，也有七、八个国民党员。第二天，迫于群众反对，释放了三十人，共产党员马润华、孙士荣、曹鸣钟、曹鸣平都放了出来，张家榴便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去了。

（这段材料，是根据张家榴同志口述以及天津市公安局档案科所存的档案、刘世泽供词整理的）

二 代替孙世琚到稽查处去

徐明和 口述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咱厂进步工会和兄弟厂一块儿斗争，要求了五月节奖金，不几天，一个礼拜日，稽查处来了两个带枪的人，一到咱厂工会就找咱进步工会主席孙世琚，孙世琚这时正在工房里。我一瞅，情况不妙，那两个家伙神色不对，像要逮人，心想：他们莫非要把孙世琚逮去，孙世琚是进步工会的理事长，要是他一逮捕，进步工会可能要出事儿。心里这么一捉摸，我就打主意，不能叫他们找到孙世琚。我说：

“孙世琚回家去了。”

“他家在哪儿？”

“在土城呢。”
那带枪的人又问：“你是干嘛的？”

我说：“我是值班的，你们有什么事，我代表孙世瑶去好了。”

那两个家伙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

一路上，郑庄子的大人小孩们看稀奇，跟着我们瞧，我就像个小犯罪的。虽然这样，可我心里倒挺自在，一来，我是为了大伙的事才给捆起来的，二来，我这么一去，孙世瑶得到信儿，说不定就可以跑了。只要逃不掉他就好了，我去一趟怕什么?

过了河，咱厂修理场的把头张树发早已在河边等着。我思量：这小子怎么跟稽查处串连在一起了？这准不是一件好事。到了稽查处，他们绑着我，叫我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张树发和带枪的人进屋子里嘀咕去了。我一个人坐着，准备听他们摆弄。心想：我出门那会儿，我家老父亲，我老婆孩子都还不知道呢，这会儿他们还不知急成个什么咧，他们准担心死了；我在这地方，稽查处会怎么摆弄呢？不管它吧，哪怕枪崩了，也是为的大伙儿利益。正想着，他们出来，倒把我放了。

原来他们想逮捕了孙世瑶以后接着推翻咱进步工会，把我放去没用。我回到厂里，听说孙世瑶已经在工人掩护下藏起来了。心里觉得格外高兴。一趟稽查处总算没白跑。

（写作组 整理）
三 我放走了孙世琚

张广秀 口述

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天，厂里的警备队得到伪当局的指示，想把中纺五厂的进步工会代表的首脑人物逮捕起来，然后大举镇压进步工会的力量。这天晚上，厂里的警备队队长张树槐和伪人事课长赵大民商量，决定次日出动全厂警备，到工房中挨排搜户，一定要把工会理事长孙世琚逮捕，送警备司令部。

当时，我在当警备，听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我上六到九点的班。我想，孙世琚领导工人群众得到了很多好处，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恨得厉害，如果把他逮捕了，一定会有生命的危险。像他这样的好人，我那能看着不管呢。何况我和他又是同乡关系。所以我就设法离开岗位，和工人于文起联系。张家福找我来说：“后门有钥匙没有，开开后门。”我说：“行。”就商量好由我设法到警备办公室去拿钥匙开后门，给孙世琚送信，于文起与汽车房联络开车的老刘。张家福对老刘说：“老孙不能留在厂里了，只好走啦，咱帮他逃跑吧，你把大汽车开到大门外宿舍墙角僻静的地方。”老刘答应了，并答应掩护孙世琚到郊区于文起的姑母家中去。

我利用值勤的机会，假装有事到办公室去。伪队长张

• 186 •
四 撤退

于文起 口述

我們推翻了伪工会成立了进步工会后，工人们选举孙世琚为工会理事长。当时我也是进步工会里的人。由于孙世琚和工人们一道进行斗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厂方也
把他看成眼中钉。

在五月节后的一天，国民党侦探队和宪兵队二团开来卡车，要捉孙世居。驻厂的伪军也把工房围起来了，满以为布下了天罗地网，国民党侦探队和宪兵队二团口口声声向进步工会要人，没有人他们不走。后来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家枢跟我商量说：“三哥，你是不是出去和他们应付应付，打发走算了，不然老孙可太危险了。”她接着小声地说：“你不是知道老孙就躲在工房里么！”他这句提醒了我，刻不容缓，我必须挺身而出。

侦探队这些混蛋们就开始声动我了，问我们把孙世居藏到那儿去了，我回答说：“弟兄们，我们不知道，他回乡过节已经十几天，没有回来，可能最近这几天就会回厂了，是不是弟兄们过几天再来。”他们不相信，也不走，后来把徐明和抓走了，但是他们还不甘心，工厂和工房继续被伪军及侦探队围住。这时我溜进了厂，找到开车的老刘，要他把汽车开到宿舍的墙角。掩护孙世居从后门溜走。他带着口罩，戴了大草帽，穿一身白小褂，跟着上了车。我把他带到辛庄我姑母家，我告诉他不用担心，这儿是我们自家亲戚，十分可靠，只要你不到处走动保 险没事。我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在家里有我表嫂侍候他。我表侄每两天上来给他买一张报纸看。就这样一共在我姑母家里住了二十天，白天带着草帽在园子里，晚上就回到屋里休息。

不巧，有一天，老孙不慎被我厂的一个人发现了，

188
这个人是否有其它企图，当时还不能判断。不过为了防止意外，我建议老孙马上转移，于是过了几天，在一个晚上就化名周雨亭，由辛庄经张贵庄坐火车走了。
（毕海荣 整理）

五 小庙烧香

孙士荣 口述

稽查处的人在工房里搜查孙世居时，人早已走了，可是把工房里翻腾得人心慌慌，空气紧张，地下党支部张家枢就对积极分子们说：
“情况不太好，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大家要提高警惕。”

纠察队女队长孙士荣倔强地说：“死就死，我们不怕死！”

事后，她带着一帮子纠察队员聚在一块纷纷议论，大伙儿一想到将来，就揪着一把心，不能想像，如果伪工会又上台工人该遭什么殃。
“我们可不能给他们拆散！”孙士荣说。她一想到就要采的可怕的局面就焦虑。

纠察队队长李庆云头一昂，两眼盯着大伙说：“咱们哪个不怕死？”

“谁也不怕死，不怕的咱上庙里烧香磕头，谁不怕死
的，跟了来，咱磕头去。”一群年青的纠察队员，你一言我一语便纷纷站了起来。

在工房后院里，有一座小庙，这地方，平素都是老太太们常来，庙里正中间坐北朝南坐着一位红脸泥塑的关帝爷，左右两侧各站一名小将，满壁彩画，一边是当年关公斩蔡阳的场面，另一边是关公护送皇嫂的场面。北面墙上有个小小的圆窗洞，射进来一缕阳光。这天，几十个青年男女拥进了这儿，严肃而安静，仿佛怕惊动了那泥塑的关帝爷似的。

纠察队大队长李庆云手里拿着一枝香站在大家面前，他的脸色严肃，坚定，点燃了香，插进供案上的香炉，回过头来对大伙说道：

“我们今天在这儿，是个生死会，咱的命是值钱的，可这个时候谁怕死？能叫他们那帮子给压下去吗？谁不怕死，谁就跟我来，往后，有一个牺牲的，大伙儿一块儿拼。谁有三心二意就出去。”

说着，几十个人团团围住他。

李庆云返身跪下，朝关帝爷磕了个头，大家也不约而同的跪下磕了个头，表示不怕死的决心。

这时，香已燃着，一缕缕青烟袅袅上升，纠察队员们一个个跳起来拍了拍膝上的土，神情肃穆地走了出去。

年青的纠察队员们走出小庙，心里感到踏实了不少，每个人都感觉到周围有不少兄弟姐妹在支持着自己。

“一个人牺牲，大伙儿一块儿拼！”
团结使他们增加了无限力量，在工房里的恐怖气氛下，不再感受到恐怖和孤单。因为大家都是为着大伙的事在斗争，狂风暴雨尽管来吧，咱们队伍这时都抱着决心，准备迎接战斗。

（写作组 整理）

六 不巧的事

张家権 口述

孙世瑞撤退后，一天黑夜，中纺七厂一个工人送来了信，说敌人已经开出了黑名单，明天上午八点就要遭人。张家権考虑了很久，如果连夜让一部分已经露出了头的地下党员撤退，时间是来不及的，可是，她想到上级党组织把自已派到这儿来坚持工作，没有上级的指示怎么可以随便开小差呢？就决定不走。

同一天，天津地下党组织领导机关也很焦急，因为工委已得到了敌人要逮捕五厂工人代表的消息，可是派地下党员几次到五厂找党的负责人都找不到，什么原因呢？这里还有个波折。

四月里，张家権找上级楚云同志报告工作时，楚云吩咐她下个礼拜去一次，要把五厂党的关系转到天津工委领导，因为楚云是学委的，领导工人工作不方便，也不能按系统的下达工作，五厂党的关系交给工委领导要方便得多。
不料张家樑回厂后发现特务常跟着自己，没法子脱身，等到一个星期后，张家樑去转关系时，汤云已搬家，找不到人了。

这时，汤云已把五厂的党组织交给城工部，又由城工部转到天津工委，工委接到关系，立刻派李瑞林到五厂来找，不幸的是，汤云在转关系时把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家樑的名字写成“苏更”了，这是张家樑同志在解放区时用的化名，李瑞林向五厂工人打听，谁也不认识苏更，因此，关系接不上，又转回中央局城工部，城工部再转过来，工委还是怎么也找不到苏更，便又到学委找汤云，到这时，才发觉名字写的不对头，改成张家樑后，李瑞林到五厂来一问，张家樑倒有，可是，恰巧这天被捕了。

张家樑当晚找到敌人要逮捕的消息，和几个地下党员商量了一下，大家都镇定地等待事变的发生，她又把孙世昆的衣物包了个小包，第二天一早叫王玉泉送到小辛庄于文起的姑母家里，让王玉泉告诉孙世昆立刻离开天津，从北京逃往张家口解放区去，自己准备被捕。“要革命，就不能怕流血。”她想起这句话，心情坦然地迎接着即将要发生的事变。

（写作组 整理）
七 工人代表被逮捕

齐淑花 口述

当五月节约金斗争和四厂派工人来我厂联系受阻所引起的罢工取得胜利后，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产生了新的阴谋。厂方勾结了流氓准备对我们工人进行反击。有一天我正干活干得好好的，突然有好多带红袖章的人拿着枪把我逮走了，被他们押到我厂俱乐部小楼上，包括我在内共有我们的工人弟兄三十七名。在那儿，工人代表王老五等人受到他们的严刑拷打，但是我们一个也没有屈服，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参加的一切斗争都是正义的，我们没有任何错误，当然就没有可说的。

三天后包括我在内的七名工人代表被押解到军法处。而其他三十位同志都被解雇释放了。在押解前敌人架起了机关枪，由厂方召集全体职工进行训话，内容是叫工人们不要闹事，否则我们七个人就是榜样。似乎这样搞一下就能惩一戒百。事实上只会引起工人同志们的更大的愤怒。弟兄们看见我们被押走，一个个都以同情的眼光注视着我们，而扭过头又以愤怒的眼睛虎视着人群中的厂长孔贤华。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内心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就这样的，我们离开了工厂。

在军法处我们被关了四十七天，在那儿经常受到了审
问，要我們供出是否受过训，参加过什么组织活动是不
是八路。审问了好些次也沒有从我們嘴里讨出任何的口
供。后經他們調查，找不出什么证据，我們才被释放出来。

我們被释放出来后，为了防止伪工会的流氓們繼續
迫害，没有敢马上回家，依靠进步工会的关系，住在市
一个人家里。家里的人还不知道我們被释放出来的消息，
伪工会的坏蛋們到我們家里去詐财，叫每家人家拿十块
钱去暗人。有些家里连吃饭都吃不上，那有钱去暗人呢。
我們家还比他們那几家生活好一些，也只有砸锅卖铁给他
们钱。结果钱给了，約定某日下午在土城大桥接人，等到
晚上，家里的人也没有看见我的人影，就这样，钱就給他
们几个小子白白的骗去了。后来我們碰见一个老乡，叫他
转告家里，说我們已经平安出来，家里这才放心。

我們不能总住在人家家里，以后有部分人先回来了，
回来里到家里谈起詐财一丁十分气愤，因此我們联合起来
到警备司令部告他們；警备司令部說以后他們若有詐财之
事立刻到司令部报告。后来伪工会的坏蛋們又想到另外一家
詐财，該家一方面殷勤款留，一方面派人到司令部报告，
才算把这些騙子們抓住，詐了的钱又全部退给了我們。

以后家庭的生活是格外艰难了，愁吃愁穿的一直熬了
二年的时光，天津才得到解放，我們才得到翻身、自由，生活
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一。与解放前相比，真是天一地之隔，
现在我們只有以更好的工作来感謝共产党，感謝毛主席。

（毕海深 整理）
八 回忆大逮捕

徐明和 口述

那阵子，传讯，过堂，就像吃崩豆一样。有一回，我们去过堂，伪工会理事馮培如自己拿刀子在头上划了一道口子，官儿问：你们干嘛把他给砍了？我们说：他自己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问了半天问不出个结果，就把我
们关在拘留所里了，我们就大骂，骂得他们没法，只得放了我们。

可敌人愈来愈猖狂的镇压工人。一天上午，厂里突然下了道命令，说有人要来参观，叫大伙好好干干活。我们
一看，事儿不太妙，厂里那些流氓狗腿子都在胳膊上绑了
红箍，布场的拿着打搅棍，纱场的拿着钢丝车上的花杆，就
感到要出事。我跑到试验室找张家楣，他也看出来了。事
先，我们就了早已得到消息，只有镇静地准备被 捕了。这
t天，全厂一共被抓了三十七个，一块儿给押到了厂门前进
达室里。正是大热天，可狠心的狗腿们却把暖气给们打
开了，热得我们直冒汗，伪军在室外还故意的问：

“热吧?”

“不热！”我们说。

可“四大金刚”气急了，齐声嚷道：“给姑奶奶们开
开窗户，凉快凉快！”
伪军在窗外哼喇了一声，说：“还不老实哪！”

“四大金刚”在窗里边说：“你看这屋子这么热，不信你自己进来试试。”

伪军不理解，等到大家都站齐，就把我们押到职工宿舍楼上。张家榆趁敌人没在，对我们大伙说：“敌人要拿我们当共产党八路军办了，咱们这儿有共产党吗？”我瞅了她一眼，明白她说话的话，便说：“咱这没一个共产党。咱为工人办事情就不能是共产党吗？”张家榆又说：“那咱在什么清平之下也别承认，不说是他们没法儿。”大伙儿全同意了。

第二天，挨个儿叫我们。第一个叫王老五。后来，一个个给打了十几军棍，逼着我们问：谁是八路军？谁也不说。老实说，像张家榆那样热心为工人办事，知道她是共产党也不肯供她出来。过了一两天，把三十个工人放了，单独下了张家榆、齐淑花、王老五、李庆云、张锡元、张玉堂和我七个人。

再说当天下班后，敌人把我们被捕的人押到厂门前圆池子那儿。我抬头一看，下究的人全站在大道上，打手们胳膊上绑着红绿箍，手拿铁棍，在工人面前巡逻，不许工人出厂，谁要想走就打谁。不一会，那厂长孔赞华就出来对工人讲话了，他说：

“你们看那，这几个都不是好人，他们是八路军。以后，大伙都要好好的安分守己干活，要不好好干，得像他们一个样。”

196
工人們都低着头，不敢看我們，女工們难受得暗暗拭眼泪，工人們心里明白：进步工会的代表就是为工人办事，是真正的好人，不是坏人。

过了几天，敌人把我們七个代表五花大绑押出了厂门，门前停着大卡车，卡车的四角都架起了机关枪。我們要上车了，只听得宿舍门前一片哭嚎声，房里的人家属和老太太们有的坐在地上哭起来，伪军不断的在驱赶人们，王老五被打得连车也上不去，走一步，血就顺着裤管往下流；李庆云扶着他从大伙面前过去，老太太们哭声响得我心里也有些难受，齐淑花的妈妈晕倒在门口了，伪工会的坏蛋們还嚷：“把车开出去！”有个卖菜的一把把老太太拉开开了。

我們被押到了河北区五马路护路队的团部，刚上楼不久，就把半尺粗的扛杆子放到我們面前，敲着扛杆子说：“誰是八路，你們要不說，看这扛杆子砸你們，把你們腿也打折了！”

誰也没有供出什么，当天又把我們押解到稽查处去，这地方，我来过一趟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呆了一小时，这儿还不“收留”我們，又转到警备司令部，蹲在门台一个多钟点，似乎还不收。伪工会押送的人在一旁说风凉话：

“要讓你們回厂呀，还得闹事，公司里早拿钱把你們买死了。”

这么着，我們就都押起来了。敌人可黑心哪！在这地
点，又来回过堂，被传的人在屋里问，别人就一个个坐在外间屋里等着。我一进去，见官儿坐在上边，旁边有人记录。官儿问：

“你是不是八路军，快说！”

走到哪里，他们也是这么问，你就别想问出个结果。我说：“咱不是，”我有些生气了，“咱从十二岁学徒，自给人干活，光管吃饭，一直在厂里干……”

正说着，官儿拍着桌子咋呼：“唱的歌是谁教的？”

他问的是逃难那天学联来人教歌的事。我说：“谁教的，人家就学呀！”

“还不说，刚才出去的那个都招了，谁是八路？快说！”

“谁知道谁是八路，是怎么回事啊？”我听出敌人用了计，想咋呼我们招。我心里明白：我们七个人里边不会有人出卖谁，任他咋呼去吧。过了几次堂，什么也没招。后来听说，拷问李庆云时，官儿还问：“你们还下操，想组织武装暴动呀？”李庆云尽给他说，官儿都气的下凳用板子亲自打他，一边打一边气得骂：“你尽给我唱戏，你尽给我装着玩。”这样，敌人弄不出什么玩艺儿，就把我们分在七下押，谁也见不着谁，只有一个礼拜放一次饭的时候见到。可我们互相都很信任，大家守口如瓶，相信不会招出什么来。

厂里的工人们不断派人来看望我们，送来吃的、盖的，还送了钱来。有的工人一见我们就在外边哭了，我也挺难受的。

198
关了不到两个月，我們誰也不招什么，敌人沒有証据，就把我們放了。这时，我們七个人无处可投，就在南市附近找了个住处，厂里工人們听说我們出狱，都赶来看我們，送錢送东西，有乐的，也有掉泪的，我們总算自由了。

张家樺因为被特务刘世澤跟得挺利害，在一天早起走了。自她走后，心里觉得挺空，没有了主心骨。有一天，我和李庆云、王老五在南市一带闲逛，見到吳楼前停着咱厂里的大篷車，走近一看，原来是伪工会那帮子坏蛋在請宪兵吃飯，咱一看，心里火冒得丈把高，大伙一商量，就决定去揍他們一顿出出气。在一个澡堂附近，把那帮子坏东西揍了一顿，正打着，宪兵队上来，又把我們逮捕了。

这次放出来，我没有工做，就摆个小糖摊子。那 年 头，攤贩也尽受敌人欺侮。后来，我在旧日租界找了间房，蹬了三輪，闖了也修修自行车，勉强过个饱。快要解放前，一陣陣的传来消息，說八路軍快要进城了，我想，这一下張家樺他們也快来了。我心里真是说不尽的高兴，觉得蹬着三輪也不累的慌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了，听说张家樺跟八路軍进了城，回到五厂了。我扔下三輪，跑到五厂，一看，张家樺的穿着完全改变了，大棉袄大棉裤，一副軍队打扮。当初，我心里就揣摸她是个共产党，可不，如今事儿就愈是明白了。从此，我回到了咱们厂里，半年以后，党把我送到党校学习，我也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真正当起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了。过去的日子那么险恶，咱也为大家
办事，如今日子这么顺心，咱更得加劲干，让咱子孙孙孙都过起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

（写作组 整理）

[附] 敌人供词

按：解放后，原中纺五厂推倒进步工会的一批流氓特务已大部被捉，今摘录原中纺五厂伪工会干事们被捕后的供词与法院判决词，从中可以看出敌人当时疯狂镇压工运的实况。

以下摘录几个主谋人策划推倒进步工会的供词与判决词：

（一）敌人阴谋推倒进步工会

张树发自供：“一九四六年春，认识孙荣友等，又认识了付秀山、苏砚田……由于散布谣言，说男女工在一起早晚要成大肚子等……张家福在工会和工人讲话时说：‘这种行为是特务，工贼破坏分子的行为。’就是说我。因此我就想方设法通过郑庄子流氓孙荣友等研究推翻进步工会。……我说男女工人扭来扭去是对电气吴廷楠、张玉山说的，他俩到试验室就告诉女工；当时工人聚集了二十多人，派人来找我去责问：为嘛骂他们？我说：‘没骂。’当时张玉山就说：‘你不是骂他们要弄成大肚子完事？’我不得不承认，并假道歉，从此下决心报复……五月间，郑庄子流氓孙荣友、关星五二人来厂找我，他们是厂里的脚行，秘密向我联系，关说中纺经理×××跟他是朋友，总
想找几个能干的工人到他家里谈谈厂里的情况，就我我和张振远、刘芳清、彭道三、刘魁、高金山、柳树林、郑大福等十余人，约在刘庄茶馆约齐去×家……讨论中纺五厂工会的情况……

彭道三自报：“……一九四六年三月，当钢丝工头时，孙世瑞、王贵弟（老五）已组成进步工会，关于厂内工人提出的意见事，孙世瑞建议以选举方式产生。我以为要经选举我自己选不上，故和张树簧、刘魁三人在刘全太家中共议，赶快联络人也组织起工会，想法推翻他们。三人随在厂内联络了何祝华、刘锡明、高金山、张志华、杨少元、孙金铭、左学增、柳树林、张振远、刘芳清，连同我和张树簧、刘魁，共十三人，到张志华家开会，并接受了苏砚田的任务……四六年四月，我和张树簧等十三人计划推翻进步工会，柳树林向我调查，报告给×××的情况有：进步工会领导到李宗仁行辕游行一次，有中纺四厂进步工会来往开会数次，成立进步工会时唱革命歌，有学生参加教给，与军警冲突时喊口号：‘打倒国军’，四厂工人也来援助，并砸了水上警察局……”

刘魁自报：“……四六年二月，王老五等成立二次工会，曾领导工人开会反对工头们的压迫，曾将大工头孙永生开除，以致形成我们一般落后工头不满，工会为工人福利组织工人请愿，也引起厂方不满，四月上旬，工人刘全太把我叫到他家，以言语试探，我对二次工会（即进步工会）有意见，我说：‘现在工会搞得臭不成样子，把大
工头孙永生也开除了，你想咱们还长的了呢？’数日后又在刘全太家中与彭道三、张树发同我共四人商量推翻进步工会，先提议暂时组织秘密团体以对付工会，并由我开始伪装，拉拢进步工人程德庆、张春发、刘芳清、孙玉轩、刘锡明邀我七人拜盟，常利用吃肉喝酒机会刺探工会对落后工头的消息。期间，我又在张志华家中和另外十二人拜盟兄弟，从此由我各自拉拢厂内各部门工头与工人，逐渐扩大巩固，推翻进步工会组织。

张振远自述：‘……间津后找朋友刘魁家中求其谋事，住了几日，适逢五厂工人曹国锋被二操工会（即进步工会）打跑，我就由刘介绍顶着曹国锋的工本上班，当缝布见缝，刘怕被二操工会打跑，跟我说：’你看你盟娘这么大岁数了，有你嫂子侄女，要像我打跑了，他们吃嘛去？’托我给他办，我就给他托工会靠近人姓孙的，后就没有什么被挨打……

四六年五月间在参加推倒王老五工会活动中，为了搜集情况，所以表面上与孙世聪保持联系，暗中进行活动，将进步工会黄纯江、宋栋等人情况报告给彭道三，以便推倒他们时加以监视……

‘一九四六年由张树发、彭道三、刘魁、柳树林、郑大福、刘芳清、杨少元、刘锡明、高金山、张志华……等人，在谭德庄张振华家中拜盟后，张树发、彭道三联络孔赞华，商量推翻二操工会。刘魁对我说：‘咱们推翻工会你要是不参加，到时候你也干不了了，也有危险。’我就立
刻答应推翻工会，后由刘告诉我到马场道×××家开会。”

彭道三检举张振远供词：“……四六年三月间，张振远混入了进步工会内，明知在进步工会内服务，暗里却把进步工会内决议秘密告诉刘魁，刘从张嘴里听到进步工会准备推翻反动工会的情报后，就报告给工头张树发，彭道三，三月间，张树发找了彭道三、刘魁一同到刘全太家中开会，决定与进步工会中的特务分子张振远、刘芳清、孙金明及其他反动工头磋头，组成反动集团，进行推翻进步工会活动。三月中旬，在张志华家磋头烧香，并宣誓守密。次日，五厂工程师孔贤华（按：孔曾代理厂长）便知此事（从刘全太处知道的），彭道三也告诉他，孔又告诉厂长陈毅德，陈又告诉×××，×××得知便联络并告诉苏继田等，苏继田等便找了孙荣友介绍这个反动集团，每人都记录进步工会的斗争情况，报告给惠中饭店三楼六十八号付秀山。此后，进步工会的一切计划、决议，到何处开会，与何处联络，来往的哪，都由张振远报告。这样，×××将情报报给杜建时，由杜联络五厂护路队，随时逮捕进步工人，由付秀山报告给韭菜营、中统等机构。张振远在进步工会中做特务工作一直到进步工会被颠覆，张振远这一阶段的罪行如下：

1. 背叛进步工会到四厂去开会，与张振远联系；
2. 背叛进步工会与学联有联系；
3. 背叛进步工会组织进步工人家属，以便了解反动工头及匪特情况，张并详情报告。
4. 三月底（按：时间有误）进步工会要求调整工资，张振远就把决议报告给发动集团转告孔祥华，厂方早有了准备，并由护路队押丁孙世琚、张家福二人。

5. 六月初，中纺四厂工人来找孙世琚开会后……六月八日，付秀山在兹中饭店六十八号开会，将张振远、刘芳涛、孙金明、彭道三找去介绍四厂的包护厂队队长郑某，并决定翌日由该护厂队逮捕进步工人，并由张振远、张树发、彭道三将进步工人三十二人黑名单给长作逮捕根据，并给了付秀山一份，并写了一张呈文，由付秀山交给查处。文内容说：该三十二人是共产党员嫌疑，煽动工潮，由张振远、彭道三等盖章，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张树发、张振远将写好的电报九十多个秘密交发动工头，派人把住汽笛与电话（张振远报告过，工会决定在发生紧急事故时就拉汽笛与别厂联系……）。

商树林供词：“四六年在五厂当工头时，与中统特务张树发等十三人结盟，我为大哥，自称十三太保。”

苏炳田供词：“……四五年十月至四六年十二月时，任天津市职工救急委员会，曾……勾结五厂工人张树发、彭道三等，打击进步工人孙世琚、张家福，强迫接收了进步工会，并将孙世琚、张家福开除，由张树发为干事。”

（二）商订行动计划

彭道三供词：“……到×××家去（按：约三月底），×说：现在厂方的生产力最低，我派去的职员，孙世琚，
不叫进厂，厂方一切事情不能进行，布机连一半也沒有开动，恐怕以后不好維持，厂长也对我说过，你们在厂内也联络了一部分人，你们就可以重新組織工会，要保护厂内机器，你们多联络工人，厂外由公司厂方负责，并说在惠中饭店三楼开一间房为临时办公室，进行四、五厂事，有事找付秀山、苏砚田、王荣廷、王浩田等……

“孔赞华在金刚桥金城旅馆楼上第一次约张树发等，第二次约柳树林、刘全太和我等开会，孔说：×××和厂方说，叫你们多联络工人，保护机器，千万要秘密，有事要随时联络。如有事，告诉刘全太与我就可以，我们问他，要作成不成失了业怎么办，孔说：×经理还能叫你们失业吗？公司里多几个人算什么。又说：孙世琥他们一定有八路从中煽动，咱们看最后的五分钟吧。与驻厂伪军发生冲突后，来了数千人呼口号打倒国军等，我和张树发等人到惠中饭店告诉付秀山，付说：已经知道了，并说：厂方和×经理说过了，与护路团长联络，要他们抓他们，他们背后有八路煽动，你们有什么事，下星期来再谈……。

“又一次，我和护路队驻中纺四厂国军郑连长也来到惠中饭店，他说，团长叫我来与付秀山接头。……付秀山领我到饭店吃饭时，连长要进步工人名单，我当时计算约三十二人，连长说：你们在厂内要准备好，再叫军队进厂。

……付秀山并买来粉红色布，做百多个袖章，上写‘中纺五厂护厂队’，并写了许多标语交给我们，并由付秀山、苏砚田二人力写呈文，请求警察司令部以八路嫌疑惩处，
写完也交我們。在逮捕后，便联名盖章送警备司令部陷害。

张树发供词：……当晩（按：指在×××家中开会后）都跟了付秀山到惠中饭店吃饭，又在那里介绍了苏砚田、王渐田、王翼廷認識，大家商量由付秀山指示，由我們联名向匪警备司令部告孙世琚是八路軍。到端午节时，傳票下来后，孙世琚就跑了。跑后，我与彭道三天天到惠中饭店去，与付秀山、苏砚田见面，計划推倒进步工会。苏砚田、付秀山已与驻厂軍队联系好，由我与彭道三叫护厂军根据我等指点抓捕。指点的人，除我与彭道三外，还有张振远、刘芳清、刘奎、柳树林、郑大福……苏砚田写的标语……

张振远供词：……第二次在惠中饭店，主持人是付秀山、苏砚田，还有一个姓王的，参加者：张樹發、刘奎、郑大福、柳树林、刘芳清、张振远。苏砚田說：你們在厂内保护机器，別叫他們砸了。厂外由张树發将臂章交给你们，联络驻厂軍队，我们現在写好臂章（水红色），到推工会时，给你们送了去，你們带上，跟军隊說明了带臂章的都是自己人。軍队不抓我們……

四六年四、五月間，开会的地点是本市一区国大饭店三楼李祥生房间内，刘奎說：你們临走的时候，不要一块走，不要叫二摆工会的人看出原形来，看出来就坏了。到国大饭店集合。由彭道三、张树發領着到×××家中，在×家見到了付秀山。付秀山說：推翻工会我們是有
計劃的，有特別的，到推翻時，不要亂了，你們不要特別的事……保護著機器，不要被二撥工会的人破壞了……會後，付秀山帶著我們到一區監牌電車道新泰飯店吃飯，中間，快行头李祥生也趕到，一同吃飯。李說：咱們趕快把他們弄倒了吧，咱們也弄个工会干干吧，叫他們小孩子們挤罗得咱们都干不了啦。六月間，張樹發召集原班人在一区惠中饭店三楼苏砚田房间内开会，也是先在李祥生处集中，到会有张樹發、付秀山、彭道三、郑大福、柳树林、刘芳清、刘奎、王沛田和我，先由张树發介绍了苏砚田，领大家……吃饭后，即到惠中开会。苏说：咱們这推翻工会的计划，你们几个人在厂里别害怕，要放心，你们在厂里要保护著机器，在厂里要压着工人，不要停了车，不要叫他们乱了，厂里有彭道三，孔贊华联络负责，外边有张樹發連絡五厂的驻厂軍队，到推翻工会时，由张樹發领着軍队到厂抓人，进厂时，必须有个暗号，每人臂上带一个水缸臂章……张樹發說：我們就照着二撥工会的人抓，苏砚田說：由明天起，我們就开始插手啦。会后，大家在惠中飯店住了一夜，轉天张樹發留下繼續商量……”

（三）推翻工会

刘奎供词：“四六年六月二十日（按，系九日之誤），由刘芳清率领一部分工人与进步工会干事李庆云借故口角，将要殴打时，即由驻厂军来分头逼人，得后，由带袖章工人在厂内巡查，迫令工人开工。”
张树发供词："逮捕三十七名，当日下午工后，由彭道三、刘芳清、刘奎等打手迫令工人到大场去，匪军把五等押到大场给工人们看。那时，我对张家春说：你是不是特务，破坏分子，我就是，你们还想怎样，后来，就把他们押起来……"

张树发一案判决词记录："……匪警备司令部下令拘拿孙世 jurors，孙他逃，未获，见孙世既逃后，复在惠中饭店与付秀山，苏略田开会，决定由苏、付向驻厂匪军连长郑学礼、排长吴明举联系，必要时听张犯之指挥。该犯于四六年六月九日上午进厂，携带大批红袖章及反对新工会标语，与张振远、刘芳清等流氓，手持木棍、铁叉，带领匪军进厂点名抓人，当场被捕三十七名……后，先后以共产党嫌疑人与新工会有关开除一百七十余工人，并令迁出宿舍……"

彭道三供词："……下午三时，一切准备好，就由张树发去领驻厂匪军，主要由我们组织的十三人率领军队逮捕三十二人（按：系三十七人）当晚，迫于群众反对，释放了二十五人（按：系三十人），余下七人。当晚由匪军严刑拷打，次日转送匪团部，又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后押往法院……，逮捕后，我还怕进步工人集会，便和张树发、张振远、刘芳清、郑大福、刘魁各拿斧把、木棍，在工人宿舍行走，专门示意进步工人不准他们集会，逮着七、八天威胁并联系匪军弹压……"

柳树林判决词记录："……逮张家福时，柳树林与打手张志华等，均手持铁棍，将南场封锁，禁止工人出入，
并亲自率领匪军逮捕我地下党员进步工人等，并诬赖王老五工会贪污舞弊，向众工人宣传，致使部分工人黑白不分……”

张振远供词：“……当天，张树发回来，将臂章交刘芳清与郑大福分发，过了一回，张树发领了连络好的匪军队到厂内抓人，我手拿尖刀、打棍棍恐吓工人不准停车，……逮捕进步工人代表后，拘留职员宿舍时，我曾到工人宿舍，手持战刀镇压工人。我曾身带剪刀一把十多天，以威胁没有被逮的工人……”

（摘自天津市公安局档案科保存的材料）

九被捕后

王老五 口述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下午，我跟张家煜、徐明和几个人在合彩车间过磅的办公桌边研究情况。头天我们都知道要出事了，一早布置了三个工人，盯住张树发、彭道三、刘芳清、张振远等几个坏蛋，防备他们凶打，这时，钢丝工人阎和急匆匆跑来说：

“不好了，张树发跑的飞快，从打棉科大门跑到钢丝保全部去了。”

我们一听，知道事儿要来了，钢丝保全部里有彭道三和刘芳清。我说：我去看看。正上保全部，半路上遇见刘
芳清一边飞跑一边大喊关车。钢丝都关了车。

我走过去问：“嘛事，你说呀！”

“别说了，别说了。”刘芳清支吾着穿过并条车间粗细纱，往布场奔去了。

自从进步工会成立后，这刘芳清表面上也混在我队队伍里，可他背地跟那些反动的封建把头们勾搭。我们也知道，他这个人做事，倒是什么缘故？我想着，就追上去。

正扭头往外走，从打棉科那儿过来了几个人，手里提着浆糊桶，拿了标语纸，头上都结了白手巾，正往墙上刷标语。我问：“你们干嘛？”他们回答说：“没你们的事儿。”

我走到钢丝和并条中间，问彭道三道：“你们这是干嘛？”

“你干什么？”彭道三盛气凌人反问。

我怒气上来了，我说：“你们要夺工会吗？这是为工人办事嘛，你们说说！”

说着，他身边有两个打手都拿着刺儿毛棍，一下子围住了我。我问：“干嘛？好呀，胆子可真大，你们想打架，敢摸我一下？”打手们把棍子扔下，彭道三说：“没你的事，不是跟你，以后再细说吧。”说着，扭头就回打棉科。

在这时，见刘芳清又绕着我飞跑过去。我走到细纱间，张树发便带了伪军迎面走来，一进门就指着我说：
“有他！别动！”

两个伪军急步走来，端着枪把我推了一下，押到车间门口的小屋子里。我一看，屋子里已有好几个人：徐鸣和、孙士兰……又一会儿，张家楣、刘世德，好几个人都押来了。

我对张家楣说：“坏了，上了他俩的当了，他们跟伪军勾结起来了。”

一个伪军走了进来，把我们押到厂长室门外的那间大屋子里。孔同华从厂长室里走出来，我上前一把拦住他说：“孔厂长，你别走。”这家伙立即瞪圆了眼说：“怎么办？”我说：“你把女孩子们都放回去吧，我们几个代表都在嘛，你把小姑娘们放出去，天大的祸我们来顶着。”孔同华不理，上办公室去了，接着见张树发也进了厂长室。

第一天，没打我们。张家楣对我们说：“大家要主意，他们如果问我们有没有政治背景，不管怎么咋呼，谁也不许承认，说什么也不说，只要抓不到证据，敌人没法！”我说：“没关系，他们要打就打，嚷起来他可以少打些，犯在他们手里了，死也没关系，为工人啊！”张家楣又说：“他们要问孙世瑶那儿去了，我们就说不知道。”一会儿，厂里的工人这个送东西来，那个送东西来。工人们说，外边儿都乱了，工人在设法保我们出去。

第二天一早就过堂，吴排长在屋里喊：

“王贵弟！”
“有！”我走进了屋子，吴排长又说：
“站着！”
一个白班长又喊：“走，到外面站着！”
我走到屋外，吴排长过来咬牙切齿的说：
“王贵弟，这回你还骂我们吃私舞弊吗？还睡我们一脸吐沫吗？还打我们吗？如今犯在我手上了，没说的了吧，这回你可明白了嘛？”
我一直不言语。最后，我忍不住说：
“这一百多斤肉都在你手里了，随便吧！”
一群伪军扑了上来，把我按倒，按住两头，用棍子打了几十下，打罢，又拉我起来，跟着他们踢，我咬着牙，忍住痛，踢了又叫我趴下打，又打了几十棍，再拉我去出去时，血就从裤腿哗哗地朝下流了。我站都站不起来，伪军报告：
“已经打坏了！”
排长一听，才说：“好了，拉下去！”
接着叫李庆云，又听得叽叽的打。我已经疼得不大理会事儿了。
我浑身起了大紫泡，屁股上肉也打烂了，女工们过来围着我哭。这之后，我不会走路了，人们拿来一碗猪油清倒在裂开的创口里，抖了半个来碟点，把那些淤血抖了出来。就这样，还是走一步流一地血，从厂里又把我们押到团部，人们扶着我上的车。一到团部，那副团长在我们夺刺刀那次，到厂里来过，就问：“王贵弟速来了吗？”
“来了。” 又问： ‘孙世镯速来了吗？’ 回说： ‘没有。’
团长骂道： ‘混蛋！好！把你们可速来了，你们都闹翻了
天了，一人打五十棍子，先打王贵喜。’

从这儿又把我们送到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关了四十
多天才释放。

我们出狱后，在南市一家住着。一天，张家楣把我找
到眼前说： ‘特务跟我跟得挺厉害，敌人把我们放出来是
想察看我们，说不定过些日子又要把我们抓回去，组织上
命令我离开天津，我不能不走了。’

我急了，说： ‘你可不能走，你走了谁领导我们干
呢？你不能走！’

‘不能，组织上要我走了，不走我还得进去。你要多
照顾些，多接近孙士荣、梁淑珍，要注意加强联系，搞好
团结，不准分散。你们好好干吧！’

‘既然是组织的命令，那快走吧！’ 我说，这事情发
生前，我就知道张家楣准是共产党员，现在果然证实了，
我感到又兴奋又难受，党领导我们斗争了一阵，现在快要
离开领导，心里觉得挺空的，有些不忍离开。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下了传票，又把我逮进去
了，原来是和我们一起斗争过的工人程德庆，王玉泉等又
打了伪工会的腿子们，狗腿子上告说是我的主谋。敌人拷
问我：

‘孙世镯、张家楣、左振玉那儿去了？快说，张家楣
那儿去了。’
我不言语，他热就狠狠的打我，一连过了好几次堂，都是问这个，我咬着牙忍着痛，什么也没说。打得最厉害的那天，一共打了我三次，用大板子使劲打，一边还问；
“张(environment)都哪儿去了？”
“不知道！”
“你们组织了什么活动？有那些人跟你练习去了？”
我哭：“没活动，都是些工人和群众来来了。”
“说，张ResourceManager究竟那去了？说出来没你的事，她不是跟你在一起的吗？”敌人又逼问。
我哭：“她是个姑娘，怎么会老跟我在一起？”
“她以前是干嘛的？”
“我怎么会知道！”
“前天还跟你在一起，昨天就不见了，打！”
说着，又使劲打，我哭：“不知道！”敌人吼叫道：“你要再哭不知道，我就撕裂了你！”
我哭：“我真不知道，要是告诉你假的，不是没事吗，何必呢！”
敌人怎么拷问，我也拿不出张ResourceManager和孙世琼去的地方。没有法子，敌人又把我放了出来，我没有办法生活，就背着小箱卖冰棍去了。

有一天，走在路上遇见董淑珍，她问：“你干嘛呢？”我哭：“卖冰棍儿。”她很自然地说道：“我到你那儿去坐一会儿！”我心里打鼓，也许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呢。就领她到屋里坐了一阵，我又扯一阵子厂里的旧事，说这
个人到那去了，那个人上那儿去了，说起孙世珂和张家桢来，我讲：“他們还不回来呀！”曹淑珍看了我一眼，就轻声说：“有个人要来找你，张大姐有下落了，他派人来找你了。”我一听乐得什么似的，孙世珂临走前曾经叮嘱我好好干，将来有人来找我，帮助我们好好干起来。我这时忙问：“人在哪儿呢？”

曹淑珍稳稳当当地说：“你要去的话，明天在国民饭店汽车站上，有人，他穿一身深蓝色衣服，手里拿一把黑折扇。你呢，还是穿你身上这件老港式的夏威夷衬衫，还骑着你那辆自行车，穿青缎鞋，蓝裤子，青麻丝袜子，你见到那人就这么问：‘你是不是张先生’一问，他就认得你了。”

第二天我去了，果然有那么个人，我们就联系上了。他提醒我：“你要注意，现在，特务总跟着你。”第四次见面，他问：“事情不好找，你愿意不愿意到解放区去？”我问：“我很愿意去。”他又问：“家里会不会叫你走吧！”我问：“我不跟他们说就走了，可以告诉他们说我外找事由。”他问：“好吧，下次我来告诉你由谁来接你。”约定时下十二点在法国花园门前见面。凑巧，我在这天十二点前到朋友陈福介家去吃饭，我好一阵子在这家人家请他们找事由，这天正好就告诉我去主生革厂帮我找到工作了。我十二点和姓张的那人碰了头，我问：“有个朋友帮我找到事，你给我出个主意。”他问：“要上工，因为你要找不到事由特务就会怀疑你，找到了事由，你可以...
以不必走，但是有任务给你，在最近，你不能活动，以后听信吧。”隔了很久，再也见不到这人。我在达生纱厂上
工，我恨后悔，我想：坏了，可能他怀疑我了，以为我不
愿意出去，不可靠了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再也接不上党
的关系了，可怎么办？这是—九四七年五六月里发生的事。
—九四八年春天来了，我吃过午饭正在达生纱厂院里
玩，传达室的人走过来对我说：“老王，有人找你。”
我走出门—看，是个年青人，留着分头，穿一身蓝制服，
圆口军鞋，头上梳得溜光，可我并不认识他。
“你是王喜奎吗？”他问，这时，我已经改了一个名
字，我说：是。”他一步上前搂着我，热情地说：“我
跟王庆弟是莫逆之交，你们在仁立毛呢厂不是有个亲戚
吗？我托你哥哥在仁立买的毛绒。钱不够，昨天说好叫你
g给送去，你是不是能到那边路口等我一下，我到那儿拿
钱去？”王庆弟是我哥，可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人呢，我
说：“我得跟工会理事长请一下假。”我请假出来，那人
扶着我肩膀离开了达生纱厂，走了一回，就突然说：“我
do不认得你哥，你认得孙世祥吗，认得张家福吗？”
我一惊，朝他打量了一回，心想，难道是国民党的特
务吗？是想套弄我逮我吗？我又不能说不认识，说道：
“认识。”那人又说：“孙世祥和我是莫逆之交，你们很
好吧？”我提高警惕道：“很好，跟孙世祥磕过头，张家
福是同事。”那人见我态度冷淡，就毫不避讳地说：“不
要怀疑我，我从解放区来的，我绝不是国民党的特务，

216
你放心，国民党的特务不做人事，我可是完全真诚的，我很佩服你，我已經了解了你好多日子，你正在等他們，我告诉你，张家樞和孙世明已經结了婚，有了孩子，张家樞叫来找你，你有事就告诉我。”我还是不放心，我淡淡地说：“我們没有什么关系，在一起做过事儿嘛，他們真心为工人办事，是好弟兄，可没别的什么关系。”他不管，还是接着说：“他們在 regression 有了小孩，张家樞到了石門了，她現在的名字叫苏 Mercury，孙世明也改名叫周羽亭了。”

他的話说得具体又详细，我曾經在姓张的那地那儿听说过孙世明和张家樞已經结了婚，所以想到不是瞎扯，他又提过工人的事情，又問起厂里一些进步工人的事情，说到最后，他約我礼拜天到海关上的一个机房附近碰面，約好了他穿什么我穿什么，在哪个茶摊上坐着等我。

我慢慢儿在心里琢磨，是真的来了呢，还是假的呢？要是真的，我好容易才熬到了这一天，要是我一个 努 力 的 跟他走，他要不再来了呢，我就拉他一下，说： “你别走！”

“什么事？”

“张家樞有了小孩，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沒有誰！”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說：“好些人都知道，請你以后注意。”說这話的意思，我是暗示他，我跟外边解放区的人已有联系，也愿意同他们联系的意思，不过不明說罢了。

他说：“好吧。”就走了。

结果，第一个礼拜日，沒有找到他，我就愈 发 怀 疑
了，礼拜一那天，家里突然来了个老朋友，这人是裕大紡
厂的老工头×××，他来了，就跟我说东说西，说起了当
时五厂闹工会的事，又说谁好谁坏，他问：“这些人都
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他又问：“孙世瑞是不是
八路軍？”我又说个不知道。他还是问：“是不是上解放
区去了？”我还是还他个不知道，他说：“你别蒙我了，
他是。”我心里嘀咕起来，怨不得那个姓张的人说有特
务到处跟着我呢，要不，怎么×××也来问这些个事
呢？

停了一会，他突然说：“有个朋友带了信給你，他约
你会面，你怎么不去了呢？他等你等了好几个钟头，后
来，他怕特务要逮他才离开了。”说着，我就明白这是那
人托他来探自己的，我急忙道：“我也去了，我也等了他
很长时间呢，没找到他。”他扯了些闲话走开了，隔了几天，
他又找我来了，说：“上回你找的地方不对。”接着
又把接头的地点詳細給我說了一番，我再去时，打扮成个
流氓样，头髮撮得高高的一朵花，穿一身青，綁子鞋，驢
了车子在约定地点打了两个来回，突然，就見到了那人，
他坐在茶摊上呢，我就推車上前招呼：

“吃了吗？”

“少见了啊！”他说。这天，他穿了蓝呢子上身，皮
鞋，像个跑买卖的人打扮，这个人就是李克簡。

从此，我们就常接头，我被吸收入党了。在沒入党
前，我像个没娘的野孩子，入了党，我就像干得更有劲
十 反动势力上台

主席台上，伪市总工会派来的监选代表苏砚田正在向工人讲话，工人们没有兴趣听他的，眼睛向一盘绳子瞅着。在空地上，那绳子像毒蛇一样威胁着工人，会场里的狗腿子流民们不时发出一声声的咒骂：“妈的，谁不选，就用绳子捆走，看清楚了吧？”

驻厂匪军荷枪实弹在会场外面包围了一圈，会场里到处都是凶眉恶眼的狗腿子，还有那威胁人的绳子。工人们站在会场里，深知自己的命运，又将开始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了……

这是四六年六月，进步工会代表被捕后不久的事，这天在工职派秀山、苏砚田的支持下，强迫工人选举的结果，伪工会由张树震当选为常务干事，张振远、彭道义、刘荫清、刘魁当选干事。郑大福、柳树林当候补干事。工会成立后，张树震身佩手枪，出入大摇大摆，常常在菜园子里鸣枪恐吓工人，又把郑庄子和蒋德庄的流氓田玉珠、时士奉、崔家林、曹见亭、孙凤汉、马宝林等十几个人介绍上工，这些人就成了工会手下的打手。从此，工人要想保住自己的饭碗，就得勒着腰带给这些人送礼，外边失
业的工人想上工，也得先给他们送礼求情了。

反动势力上台后，把原来和进步工会靠近的工人一百七十多人开除了，像工人于文山，伪工会特意派人到澡堂子里打了他一顿，然后再开除；又像織布工李汝琴，一天夜里停电，张振远就强奸了她偷布，报告厂方开除了。更毒辣的是，伪工会又通知了全天津市所有中纺公司下面各厂，对五厂开除出去的工人一律不再给他们上工。

乌云密布在工人们头上。伪工会把进步工会当初推倒的王梦符又派到布厂保全部当了工头，布厂的总头刘魁又恢复了欺压工人的幕怪，手里拿着棍子，常常借故打
进步工人，夜里常常到工人住房前偷听，工人姜凤山因而吓得藏到煤堆里好几次不敢出来。住在头等宿舍里的工人被赶入了二等。所选出的反
动工会的干事们搬进了头等宿舍，把工房中家属自己选举出来的进步保长孙景周也推倒了，又把进步工会为
工人谋福利种的菜数千斤送给了驻厂伪军，勾结着伪军好便于镇压工人；河边十几里青草叫脚行头子流氓李相生割去烧了，工人上烧不上了。把头刘魁在车间里又用高价出卖东西，到关鬼的时候硬从工人的工资中扣掉，甚至放起印子票来；他又在彭道三的指示下，监视工人杨恩太（地下党员）活动，把王老五、田宝珍、张玉堂等进步工会的代表赶出工房，本人不准回家，经常向进步工人找茬打。这些伪工会的干事们在时还仗势奸污了厂里不少女工。

一九四六年九月，张树发在苏砚田领导下，在厂里发展了四十多个国民党党员，在工会办公室里开会，成立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中纺五厂八十五区分部。成立的当天，市党部还派人监视，选出张树发、彭道三、刘魁、刘芳清四个人当区分部执行委员，郝金贤的书记（按：书记书记工性质）。到了一九四七年，这批伪工会干事都先后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监视工人活动，为反动统治阶级疯狂镇压工人，成了工人们的死敌。

（根据公安局档案材料整理）

【附一】

工厂开除七名工人代表的布告

布告（人字第六号）

查工人王贵、徐明和、李庆云、张锡元、张玉堂、张家福、齐淑花等七名，因被逮捕押狱，本厂照章应予除名。
特此通告，仰即知照为要。

此布
（陈毅德制）

人事课主任赵大民
六月二十日

[附一] 厂方下今灌开除与停职
工人移出工房的布告

布告（人字第九号）

查本厂新用工友日增，住房减感不足分配，兹为解决新来工友居住问题，凡非本厂工友，业经除名停职等工
友，务希于一星期内移出工房，万勿延误为要。

此布

毅德

[附二] 厂方开除被捕之三名助
理员给分公司报告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二三号）

敬启者，案奉钧处本年十一月十六日通人字 第115号
函，以各厂员工请假或消假登记及人事考核须按期填报考

[1] 陈毅德为中纺五厂一九四六年时期的厂长。
表及奖惩月报，并限文到五日内，迅予补报，俾凭转报等因奉承。查属厂考勤表自奉示后，即己按月列报送核有案，奖惩部分则自本年一月迄十月止，除六月份有助理员张某、李某等三名因违反厂规，而予除名外，其余职员同仁，大体尚能勤勉从公，用特备文送请察处照，祈报为荷。此上
分公司

第五厂厂长王达甫

【附四】

在工人被捕后贴出

二十七名工人停职布告

布告（人字第七号）

查前被逮捕之本厂工人郑春茂、刘少清、刘世泽、阎和、王玉泉、刘金生、杨春、高相彬、张玉山、夏春生、樊庆祥、孙文义、孙家骏、路凤歧、曹鸣钟、曹鸣平、胡勰霞、孙士兰、孙士荣、苗玉珍、田宝珍、李敏、秦凤龙、翟淑珍、刘凤菊、马润华、崔开琴等二十七名，于该案未完结之前，本厂决予停职，不准上工，特此通告，仰各遵照为要。

此布

（毅德阁）

人事课

十月六日
（附五） 张家福等被捕释放后向社会局控告 中纺公司接社会局公函后抄致五厂之公函

天津市社会局本年九月十七日会工第1312号函内开，案据工人王贵弟、张家福等呈略称：查中纺五厂新工会（按：指第二任伪工会）联络本厂驻军，以武装包围旧代表（按：指红色工会代表）张家福、王贵弟、李庆云等，及与工会稍有联络之男女工人，计被捕者共计三十七名。除理监事被送稽查处强迫以政治及其他背景羁押。事后经各方详察，并无其他行为，方为释放。其余被捕之男女工人，亦经拘留审讯六七日之多，释放后限三日内所有被捕工人，令即迁出宿舍。按社会部为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已颁发布告，无正当理由，不能无故解雇工人，近来中纺五厂解雇失业工人不下百余名，一者不但影响家庭生活，二者失业工人增多，实足影响社会安宁，理合备文呈请设法等情。前来查该工人等所称关于解雇工人等各节，是否属实，本局无从查办，相应函达，即希查照照复为荷。附抄解雇失业工人名册一件。等因奉此，查未面各节，究系如何实情，相应抄同名册，即希查照，详为见复，以凭核转为荷。

此致

中纺五厂

经理×××

224
兹将被捕之三十七名失业工人录后：

徐明和  王贵弟  李庆云  张玉堂  张锡元
路涛歧  王玉泉  张锡忠  孙景周  孙家骏
郑春茂  孙文义  刘金生  姜延栋  宋  栋
高象彬  曹鸿钟  张玉山  刘世泽  閔  和
刘少清  夏春生  樊庆祥  张家樑  曹鴻平
齐淑花  翟淑珍  秦鳳龙  崔凯琴  李  敏
馬潤华  胡艳霞  苗玉珍  孙士荣  孙士蘭
田宝珍  刘凤蘭

无理由被解雇之十七名工人列下：

陈福顺  王文汉  陶景海  孙学桐  史寿延
程德庆  李恩沛  李汝琴  黄纯江  孙宝鈿
刘春林  袁敬山  张广成  于德錄  路鳴琴
黄淑珍  李宝珍

十一  胜利是我們的

张家樑，曹鴻鐘 口述

晚霞抹红了天空，海河上一片晶亮的红波在忽闪忽闪
的蠕动，天渐渐地黑下来。在暮暮里，揚庄子一家小院前
前，站着五厂电气部的年青工人曹鴻鐘，他点起脚尖，仰
着脖子，紧瞅着摆渡口。从对岸郑庄子 正 划 过 来 一 艘渡
船，借着晚霞的红光，他看到船上有一个紫红的人影，使
欣喜地往前走了几步，想朝渡口走去，却又像碰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缩进了屋门，“别人会发现我在这儿的，对她也不好”。他暗自想。

那紫红色的人影走近了，原来这是厂里交换台的接线生、地下党员李慧佩，她早对曹鸣钟有了感情。自从曹鸣钟在厂里被捕后，这小姑娘就常去探望，给他送饭。厂里把曹鸣钟开除后弄到了这儿，她每天下了班就提个饭盒过河。她不仅给曹鸣钟送菜吃的，还把厂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安慰他。曹鸣钟从心底里深深地感激着他的小爱人。

这天，李慧佩把饭盒搁下，曹鸣钟揣测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有没有找到呢？”他自己问自己，当然，从李慧佩沉静的表情中，他给自己作了答复，还没有找到党啊！

自从代表们被捕后，外边的工人们就一个劲的设法保他们出来。张春福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自己放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就把在艰苦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忠实同志曹鸣钟、曹鸣平俩找到一边说：

“工人们在外边活动，看样子你们可以放出去，出去以后，要隐蔽下来，多跟董振珍联系，我们必须改变办法，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干了。”

曹鸣平听了这话，忍不住哭了：“不，他要不放你，我们都不走，再跟他们干。”

“不能，”张春福严肃地劝道，“群众现在已经疲劳，敌人的决心又很大，我们再像以前那样干下去，要叫敌人一网打尽的。现在，要争取都放出去，能放出去就是
我們的勝利，我呢，眼前不可能放。”

曹鳴鐘又急得掉淚道：“那今后我們怎么办？”

“你們出去以后，要趕快找黨，楚云同志走了，我們現在和上級黨失去了聯系。是要趕快找黨。你們出去后，太紅的同志不能堅持下來的讓他回解放區去，能堅持的一定留下。”張家楬說着又轉過身對曹鳴鐘說：“今后，你出去了要改變一下打扮，長期隱蔽下來，能隱蔽下來就是勝利。你要多找‘四大金剛’和翟淑珍她們，一塊想法去上工。能到別工上工也就是我們的勝利！”

接着，張家楬又把屋里地下黨組織關係都交給了曹鳴鐘，要他出去設法找黨，同時，要他好好和屋里隱蔽下來的地下黨員們聯系，等候上級黨的指示。

兩個小曹釋放出來，屋裏便把他們開除了。曹鳴鐘無法在工房活動，便暫時在楊庄子找了个地方藏身，通過地下黨員劉增祥和屋里的黨員們聯系。這時，劉增祥也已被屋裏開除，家裏沒法住，常常睡在工房附近的地里，為了堅持黨的工作，等待上級黨來找，他克服著艱難困難在工房附近堅持着。

曹鳴鐘又設法和地下黨員楊恩太聯系，因為解放區里常常有同志到楊恩太那兒住，可是，偏偏這一陣沒有來。年青的小曹，當時雖說比他到五工來時大了一點，可是還只十八歲，經歷了這樣大的風波，他沒有倒下，卻不見着急了。张家楬在獄里呢，上級黨又不來，這以後工作怎麼搞呢？
正这时，刘增祥在大王庄一个工人家底会看见了一个卖破烂的。卖破烂的一见他便亲切地问他：“苏更现在在那里？你快告诉我吧。”

刘增祥打量了对方很久，想了想，不知道苏更是谁。便想：这是谁呢？是上级派来的人吗？可又没凭没有据的。想了一下，便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你要找谁！”

卖破烂的急说：“你们党的领导关系在我这里呢，你要不信，我可以把你们支部的党员说一遍。”接着，他便说起一些党员的名字来。

刘增祥静静地站在那儿，他想：党曾经教育过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向外人泄露党的秘密。自从小曹离开后，地下党员就靠我联系，万一这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我一个人不要紧，大伙的事不能随便。我决不能承认为这些人是党员。

卖破烂的见他老是不承认，急得没法，还说：“你要再这样不肯说就该坏了，快告诉我吧。”

刘增祥怎么不肯说，冷冷地走开了。

可他立刻就跑去告诉了曹鸣钟。曹鸣钟一听，霍的站了起来，机警地看了看刘增祥，又半闭着眼想了想，拍拍腿说：“对的，他找苏更就对了。张家福在解放区的时候叫苏更，一定是上级党来了，你快去吧。”

之后，工委派来的李瑞林同志便和曹鸣钟取得了联系。指示：地下党员能隐蔽的隐蔽下来，必须撤退的要求。
赶快撤退，赶快动身。

曹鸣铮和李慧佩兴奋地一同去探监。在送给张家信的衣服里夹了一封信，暗示已找到，外边一切都安排好了，正在设法营救他们。

这时，工房里人心都惦记着被捕的代表们，老太太们自动地上小庙烧香磕头，祈祷代表们的安全；工人们联合了十五个乡去保代表们出狱，又不断去稽查处找陈仙洲要求释放。厂里许多女工在代表被捕后，上班就哭，干活了，她们商议着怎么样赶快救人。虽然狗腿子特务们监视很凶，但许多女工都大胆走进翟淑珍家的院堂，她们常常是身贴在墙上朝两头了望，见没人时就揭开窗户进屋把钱塞下。翟淑珍又把大伙凑的钱送到李慧佩那里，拿出去设法营救代表。

不到两个月，敌人因为找不到证据，就把代表们放了。敌人疯狂的逮捕没有使我们力量受到什么挫折与损失，我们终于胜利了。

张家信出狱后，特务日夜跟踪，无法再坚持活动，党把她安全地送到了解放区。曹鸣铮带了地下党员刘增祥、黄纯江等也先后撤退回厂。一部分地下党员像郑昌耀、范仲轩等人，就隐蔽下来，由工委领导；另外一些被开除的和被迫离厂的地下党员和斗争中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改名换姓，到了别厂上工，像马润华、翟淑珍等九人到了中纺二厂，“四大金刚”孙士荣、孙士兰、田宝珍、苗玉珍等到了中纺四厂，李慧佩到了中纺六厂，孙学桐到了中纺
三厂，王老五失业了一阵后，到了达生纱厂，江庭洞到了发电厂。这些党员和斗争中的骨干并没有在反动派面前气馁，他们到别厂后，又继续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间播革命的种子。

一九四七年冬天，与工厂党的地下组织联系的李瑞林同志在静海被捕后，组织上又派曹鸣铮同志回天津，把五厂地下党组织关系交给何毅同志。从此，何毅同志便通过李慧的姐姐李淑芬领导五厂地下党组织，何毅同志又分别与分散到各厂的地下党员和斗争骨干有了联系。在迎接解放大军入城时，他们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成了天津市各纺织厂护厂斗争中的骨干，怀着兴奋与热情迎接了最后的胜利。

（写作组 整理）

[附] 他们是地下党员

工人赵淑珍的母亲 口述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工人照样挨打挨骂。我的大女儿叫赵淑珍，当时在中纺五厂准备车间上工，她每天低头进厂，低头出厂，一听见上班汽笛，就像等着挨刀一样难受。

淑珍在厂里不敢出一口大气，在家里也总是闷闷不乐。不久，她和张子福做了好朋友以后，这才欢乐起来。
好像有了什么奔头。

张家樋也是厂里的工人，她剪着短发，圆圆的脸盘，待人接物特别和气，大伙都叫她张大姐，其实，她在当时年纪不大，也就是二十岁多些。她常到我们家来，有时一来就是好几个人，像孙世瑞、王老五等都常来。他们一来，就是低声嘀咕着，好像商量什么大事。后来，我听淑珍说，他们这些人，都是搞进步工会的，领导大伙向国民党斗争，可是大伙拥护啦，只要他们出个道道，大伙就紧跟着干。我想：人家也是一个工人，白天上班，晚上还要为了大伙的事工作，我从心眼里佩服他们，所以只要他们上我家，我总是尽力照顾。

“霍娘，您在门前门后看着点，那些坏蛋来了就招呼一声。”

这句话，张家樋每次来时，总要说一下的。我也很乐意为他们出点力。坏蛋嘛，我也看得清，就是厂里那些特务流氓，像伪工会理事张树敷等。

他们一开会，就是半夜半夜的，开完了会，还要来抄一些小本子，小纸条，看呀，报纸什么的。我一看心里就明白，这些东西不能随便让人看到，就把这个收藏任务就担起来了。

时间不长，张大姐等人就把我当作自己人一样了，有时，她还让我干点什么呢！有一天，厂里的几个坏蛋在离我家不远的张树敷家附近开会，张大姐走过来说：‘霍娘，您上张树敷家附近去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那时天快黑下来了，正是鸡鸭上窝的时候，我就借着找鸡找鸭，一边嘎嘎哈哈哈，一边就在张树发家窗底下听着。回来后，把听到的一切，都告诉张大姐，她就夸我有本事。我想：这一点算得什么。

又过了一个时期，淑珍也显得忙起来了，她不光和张大姐一起开会，一到礼拜天，还要同她一起到市里去。到了礼拜天，一清早她们就起来了，把自己打扮成女学生的样子，拉着她的弟弟、妹妹（这小哥俩现在都是棉纺厂工人）说：“跟姐姐上市里看电影去。”或者：“咱们去公园去。”一去就是一整天。开始我不太明白，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心里说：“你们别在我面前演戏了，这准是去联系工作的。”果然，不久，天津纺厂的大罢工就发生了。

那年头，我可替这些年青人担心，她们一出去，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一直等她们回来后，才一块石头落地。她们倒好，天大黑才回来，一进门就胡乱地吃点东西，又接着开起会来，一直到半夜还不散。

当时，张大姐等人领着大伙成立了进步工会，向厂里的封建势力、汉奸、工贼、伪工会理事等作了几次斗争，工人才算吐出几口恶气。这个张大姐呀，真是好人，工人有困难，她就不辞劳苦地设法解决，她自有了困难，可是一声不吭。她到外边联系工作，都是花的自己钱。她的每月工资全为大伙办事花了，甚至把心爱的大衣卖了，作为大伙的车费。就是这样，我也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一句不高兴的话。她这种大公无私、乐观的精神，我很感动，所以
我更願意挺身为他們做掩護工作。

一九四六年的端午节，张大姐、孙世璐等人在我們家里过节，大伙高高兴兴的談笑着，我看了心里也很高兴。誰知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时候，我看出张大姐的脸色不太好，就問她：

“出了什么事了嗎？”

“国民党反动派要抓人，还要上这儿来搜查呢！”张大姐看了看我又問道： “您害怕嗎？”

“我怕他們作什么？”

“他們来问你什么，你就說不知道。”

“嗯！”

接着，我就和她一起，把一些小冊子、書報都藏起来了。

张大姐走后不大时间，孙世璐也来了，我正准备给他弄点吃的，他攔住了我說：“瞿娘，給我兩個馒头就行了。我得离开这儿，呆不下去了，特务要抓我。”

我真吃了一惊，孙世璐为了大伙利益，罢工走在头里，为了大伙办事，甚至把自己的自行车都卖了，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被抓走，当时我还不明白国民党特务把这些好人看成是眼中之钉，有了他們，特务們就不能肆意横行。

“瞿娘，我这就走了，以后再来看您。”

我看他馬上要走，就掉着眼泪，帮他穿上大褂，戴上口罩。化装好了，他又问我：

“瞿娘，您看我脸上那塊紅記还看得清嗎？”
我掉着眼泪说：“看不见了。”我送了他一阵，告别时，又给了他两个馒头。

等我回来时，简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一群国民党大兵和特务正在我家搜查呢！我为孙世琚庆幸，他要跪走五分钟，就算没命了。当时，伪工会理事张树发把金牙一叼，瞪着眼问我：“

“孙世琚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张树发乱闹一阵，找不到人，只好垂头丧气走了。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张大姐、孙世琚等人都来看望我，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地下共产党员。

（王义久 整理）
野火烧不尽

一 反抗提前开车

薛新春

自从进步工会被推翻以后，官僚资本家和伪工会流氓们对工人的压迫更狠毒，总是想尽办法剥削工人，欺压工人。工人对他们的仇恨更深了，工人团结得更密切了，常常想着法儿和资本家斗争。可是官僚资本家们也想尽办法来镇压工人，剥削工人。我们中纺五厂当时有一个青年小伙子，名叫张怀海，个子不高也不矮，圆圆的脸，两个大眼。当时，他有二十来岁，说话总是带了笑，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和工人一条心，所以大家都尊敬他，拿他当自己亲兄弟一样看待，因为他关心大家的生活，给大家办好事。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四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布场的工人提前一、二分钟跑出了车间，到饭房去领窝头，窝头，门里聚了二百多工人，等待领大眼窝头，可是伪警不放工人出去，工人很气愤的说：‘咱们一天干十二
个点钟的活，这还不算，資本家想出下流的办法来，利用吃飯時間提前十五分鐘開車干活来捉弄我們，白干十五分鍾的活，又不給錢，早出去一二分鍾就不行，真是气人得很。”又一个工人說：“喺咱们二百多口人，挨个領大眼窝窝，每人三个窩窝头，不等領完也到点開車干活了，回去晚了被工头、狗腿子們看见，不挨罵就是挨打，如果不領窝窝头回車間干活，就得餓着肚子干一宿的活，簡直没有咱工人活的路了。”

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語的说著，张怀海从車間里出来了，大家像一窩蜂似的围上去說：

“张怀海，张怀海，你看还差一、二分鍾，門岗就不讓我們出去領飯，現在又提前十五分鐘開車，不等領完窩窝头也到点开车了，回去晚了被工头、狗腿子們看见就得挨打受气，有心不領窩窝头回去吧，就得挨餓，你看怎么办？”

张怀海說：“工友們別忙，不到点咱們別出去領飯，不到点，咱們也不給資本家干活，哪有这么便益的事！工友們，記住，差一分鍾咱們也不干，我說的話行不行？”

大伙齐声的說：“行，不到点我們一定不开車！”

这时，正巧红灯着了，吃饭的鐘点到了。

領飯回来，我和范仲軒、张怀海、陈恩税四个人走在大伙后边。张怀海說：

“咱们四个都是见过（即現在的帐篷工），回車間去告訴不知道的工人們一声，不到正式鐘点不許開車，并
且說明這一點，按鍾點吃飯，按鍾點干活，誰也不許提前開車，如果提前的，咱四個去把車給他關上。”我們三個
齊聲說：“對，差半分鐘也不給他開。”回到車間裏，還差十
五分鐘，天軸轉了，可是全場三百來工人站在布場大道上
不開車，天軸轉的快，布機可一聲不響。这时，狗腿子們慌了，工頭也發毛了，管理員也急了，工人隊伍里有
個敗類田玉良就偷偷的溜出了車間到偽工会給送信去了。
不一回儿，偽工会的代表来了，头一个走的高个，四方腦袋，兩只三角眼，好像一个喪門神，他的名字叫張振遠。
第二個，剛剛喝完馬尿，光着背，通紅的眼珠子，身上臉上全是紅的，像个臭虫，他叫劉芳清。第三
個，細高条，一臉的連鬢鬚，黃臉皮，亞蠻一個大猩猩，
他叫劉奎。后边跟着偽工会大头子張樹發，还有十几个流
氓打手也跟在后边。他們到大道中間一站，劉芳清头一个
說話：

“你們为什么不干活，站在这干嘛！”

工人們齊聲說：“还不到鍾点哩，我們就不干活！”

劉芳清听了大家的話，楞了一下，張振遠就搂着說，
“他媽的，天軸都轉了，还說不到点咧，你得是流心橋
蛋。”

張樹發便对偽代表說：“你們几位看着表，現在是十
二点二十分，还差十分鐘呢！十二点三十分才是干活的
時間。”

刘奎接着說：“不是提前十五分鍾开车嘛！”
张怀海说："为嘛提高十分钟干活，不给咱们加工钱，让咱们白干活，是嘛道理？你们代表也不替我们工人想想，工人们劳累了一天还要加班加点，于心何忍？"说着，张怀海又回转身向大伙说："工友，咱们不能白干！"

大家齐声应道："不能！"

刘芳清一步过去照着张怀海脸上打了一个滿脸花，张怀海嘴和鼻子都流出了血。陈恩祿从工人队伍里站出来，说：

"有理好好讲，为什么打人？"

这时，伪工会大头子张树发见工人队伍强大，面色不好，便回头对狗腿子们道："给我把这两人带走！"

上来六、七个人拉张怀海和陈恩祿。张怀海把他们一推，说："走就走，到那里我也有理，何必拉拉扯扯！"

这时，我和范仲轩站在工人队伍前边，领着工人们想营救他二人，向前冲。张树发狮眉笑脸的用手拦住大家说：

"工友，别跟这两个人学，他两人成心捣蛋，和八路军通气，赶快干活吧！"

大家恨得齐声说："快把张怀海、陈恩祿放回来，不放我们不开车。"

张树发退退缩缩的说："工友，现在已经把张怀海、陈恩祿带到工会去了，我们回去劝劝他俩，别上八路军共产党的当，马上让他俩回来干活。你们看，现在一点多..."
了，赶快干活吧。”大家又齐声说：“告诉厂里，不能提前十五分钟开车，不准随便加班加点。”张树发等工会的代表们向外一吆喝，又向工人点头哈腰的说：“照办，照办！”说完就溜了。

我们的斗争胜利了，再也不加班加点了，更不提前十五分钟开车了。可是，张怀海、陈恩禄被捕入狱了。我们大伙想办法营救他们，并且暗地里和厂方斗争。我们的斗争方法很多：消极怠工啦，甩担子啦，砸机器啦，割断经轴啦，往粪坑底扔裤子啦。忽然间，霹雳一声，天空的黑云散了，太阳出来，天津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完了，帝国主义赶跑了，流氓特务们斗倒了，厂里过去被捕被开除的工人们来了。张怀海也上工了。在镇压反革命时，张怀海出力不小，支部吸收他成为共产党员。以后，在每次运动中，张怀海也睡不着，又找干部又找群众，搜集材料，找证据，讲道理，喊口号，场场有他，天天有他。把反革命，封建把头，流氓特务斗倒了。不久，上级便把他调到国棉四厂去当支部书記了。

（附）厂长在张怀海、陈恩禄拒绝提前开车被捕后给南区稽查处的呈文

敬先者，奉于本月三十一夜八时二十分，敝厂纺布场内忽然秩序大乱，当由工会代表张树发随同驻厂稽查处王翼
廷先生入厂视察获悉，系陈恩禄、张怀海二人所煽动，当经
王先生将该陈恩禄、张怀海逮捕，并晓谕其他工人安心工
作，秩序始告恢复。经询据该陈恩禄、张怀海等二人称，
系因电台开广播点不同，经伊二人询问点点，不意引起工
人喧噪，并无其他企图。同时，并探知在陈恩禄家中住有
未报户口来历不明一人，复经逮捕，经询据称名廖义海，
在九十四军补充团当号兵，现请假病假，因与陈恩禄原在一
起当兵，故住他家等语。惟查伊等所称多有不符之点，事
关厂方安全，除该陈恩禄、张怀海、廖义海三名由王先生
押送讯办外，相应将经过情形函请查照为荷。此致
警备司令部南区稽查所

厂长陈毅德

二 失业工人要求复工

陶景海 口述

进步工会代表被捕以后，不几天就无故开除了纱场工
人号称“四大金刚”的孙士荣、孙士兰、苗玉珍、田保珍
和布场的宋栋、高象彬、刘金泉等三十多名进步工人。但
是伪工会的工贼们并不死心，黑夜白天还到处搜寻进步工
人。

六月的一天，早晨七点，布机“摇哒摇哒”的震响，
我正在修布机，我班喷露工陈凤岐（陈是伪工会代表刘
• 240 •
魁的朋友）对我說："喂！陶廈子，告訴你，昨天晚上我到茅房小便去，听人說：有你和张广成。" 我一听，什么事有我，就愣啦！緊跟着我就問他："什么事，快說吧！" 陈凤岐繼續說："在茅房外边我听人說，你和张广成一定得弄出布场，不弄出你們去是禍害。还说你們如果不住，就打跑你們，一个也不留。咱倆不錯才告訴你的，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我立时就停止了工作，心想：不住，看你們能把我怎么样。于是我一边干活，一边琢磨，一定是刘奎叫陈凤岐告訴我，不是在茅房听的。正在这个时候，工贼头子张树發、刘芳清、张振远等人，还有几个流氓打手圈上我了，大眼珠子直瞪着我，在我的工作范围轉了两个圈，又不言而去。我又想，于文起是被他們打完后开除的，胳膊撑不过大腿，光棍不穿眼前丐，可是走也不能不清不白地走。于是我就放下搬子，去找謄錦 İstanbul，将伪工会头子和流氓打手要迫害我的事情告訴他。当时伪工会的代表郑大福正在場，两个牛且子眼一瞪說："你个人想想吧，是走好，还是打走好，你个人决定。" 这时謄才慢騰騰的說："你到人事課去吧。" 世也不知怎么回事，从工程师室出来，就向人事課走去。我一进人事課門口，人事課一个職員就看见我了，拉开抽屉，拿出早已算好了的工资。往桌子上一放："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工资，" 二句話没說。我气愤地说："我不是来关錢的。" 他慢不經心的說："我們不管这些，你現在已經被开除啦。" 在黑暗的社会里，工人沒有说理地方，从此我就失了业。第二天修車
工张广成也被开除了。连续好几天，又开除所谓有八路军嫌疑的工人二十多名。

我们失业后，伪工会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通知各棉纺厂，不许我们这些人上工，开除的工人一律赶出工房，不准再进。尽管伪工会毒辣，并没有削弱我们的斗争意志。

一天，‘四大金刚’孙士荣等，还有徐明和王文汉、王小秋，我们二十来人研究如何向伪工会进行斗争。决定保持力量，并找王小秋的师傅高帮头子刘广海帮助。为了集中力量，我们都住在刘广海家的小楼里，大家在一起吃饭，住了有半个来月，什么消息也听不见。后来我们才知道刘广海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和伪工会是一个鼻眼出气的人，怎能给工人办事呢？过了几天，王老五和张家福被释放出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满以为可以向伪工会进行斗争啦！可是不几天，王老五又被警备司令部逮捕了，斗争困难就更多啦。于是我们二十来人分别研究，认为如果呆下去，钱花光了，就会造成生活上的困难，同时也容易暴露目标。于是决定孙士荣、孙士荣、苗玉珍、田宝珍等女同志，在二厂、三厂、四厂，由王小秋的师兄弟联系上了工。还剩下男同志十几人，没办法上工，徐明和卖糖豆萝卜，剩下王文汉、刘金泉、孙文义，我们四个人回到郑庄子卖柴禾，晚上住到秦家胡同刘金泉家里，仍想办法向伪工会进行斗争。后来刘金泉托人到警备司令部去活动想办法，可是没钱怎么办呢？钱又从那里来呢？我们都是失业
工人，连生活都保不住，那里来钱？因此，当时决定嫁给
小能够上班的，赶快想办法上工。我和孙文义、张宝顺、
孙学桐四个人就到中纺三厂去验工。那时人事课负责验工
的是李玉海。李两个大眼珠子瞪的圆圆地，直看我的脸，
（因为我眼有病）说：“你姓陶吧！你是陶麻子，陶金
海。” “不，我叫陶金财”。他因为平常不認識我，又没
有根据说我是陶金海，没办法就领我们去验工。我们几个人
都验上啦！

上工后，每月关的钱，每个人都拿出一部分积攒起来，
交在一起，好忙人忙到警备司令部活动，向伪工会进
行斗争。过了几个月，我们积攒了一些钱，就由刘金泉和
王文汉去联系，确定利用一天传讯伪工会代表到警备司令
部问话的机会，带红绸进厂，要求复工。大家听了，非常
高兴，并准备了红绸，写上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字样。在
九月的一天，王文汉、刘金泉、沙维民、孙学桐、孙文义
我们十几个人，吃完饭就准备着，并由孙学桐在二道门看
着伪工会的代表几时走。不到半小时，伪工会代表就坐汽
车去警备司令部了。这时我们每个人都带上了红绸，向厂
门口走去。值勤警卫问我们是干嘛的，我们说：“失业工
人，找厂长要求复工。”警卫没办法，只好打电话找厂
长。后来从厂长室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说：“要求复
工，厂长不在，明天再说吧！”想支吾过去。我们就追
问：“不在干嘛去啊？”他不大理采就走了。不一会儿，又
出来一个人，说：“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出来。”我们在
大门口等了下来，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厂长出来。可是二道门却有很多大枪队。不一会，伪工会的代表坐着汽车也在二道门下车了。我们一看风头不对，才知上了当。警备司令部怎么会给我们工人办事呢？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时伪工会的代表和一群伪军手持着枪，已经向我们扑上来，不问青红皂白，拿大枪托子捣我们，随后就将我们捆了起来，把我们关进了传达室。伪工会和警备司令部的头子们都上厂长室去啦。大枪队把我们捆了起来，不到半个多小时，就把我们带上了汽车。这时，伪工会的头子彭道三从厂长室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面袋（据说里面是钱）和警备司令部的大官们一起去上了小汽车。宪兵端着大枪，踏上了我们坐的汽车，一起开回警备司令部，把我们押到一间屋子里。屋子里有一个光着头，穿着军装的军官，还有一个宪兵，在屋里走来走去，看样子是早有准备审讯啦。我们一进去，他就站在一张桌子的中央，故作镇静，两眼向上一翻，仰着头问道：“你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吧！”我们回答说：“不懂什么叫共产党八路军。”“你们带红箍，带红箍的就是共产党八路军。”我们说：“我们是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红箍是我们的记号。”这位军官理亏词穷，没办法，就向我们耍起熊来啦，说：“混蛋，你们一定是共产党。”这时旁边站的那个宪兵没精打采地走了。军官：“毛古”起来啦！一边问，一边溜，不敢安定的坐在那里，随后就大声的喊：“来人，把他们带走。”我们被带到禁闭所时，有一个军官，两个眼睛直盯着张怀海。
随后过去就是一个嘴巴。张怀海的脸立时就肿啦，原因是张怀海不久以前因拒绝提前开车被停过。我們十几个人分押在五个小屋子里。在第二日的晚上，对我们开始审讯。审完后，几个屋子就串通消息，谁也没有暴露什么，都是一问三不知。在提问我张文汉时，一上来就问：
“誰是共产党？”我們說：“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他还說我們拿着刀到张振远家里去行刺。我們說：“连工房都不讓我进，怎么刺的他呢？”军官没说话，故意找岔儿，看王文汉穿着二道棉袄，光着头，不顺眼，用木板子照身子就是几下子，还說王文汉是共产党，随后又问：
“孙世瑶那去了？”我們說：“不知道。”其实我們知道孙世瑶在北京，因为我去看他。这个军官一直问了半个来小时，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不得不让我們回去。回到禁闭所一摇头，证明没说。这次审讯完以后，一直有半个月也没有进行审问。一天上午，又提出我們七个人，什么也没说，挨个点名，随后就讓我們解掉腰带，叫我們取保释放。王文汉等四人没被释放，我們被释放后，不久就去接济王文汉他們四个人，途的干粮和钱。这时才知道他們四个人在我們释放后就弄到西狱所去啦。我們释放后，三厂就把我们开除啦！没办法生活，就每天到钢厂作散工活，赚的钱除自己生活外就去接济他們。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們四个人也被释放出来。

我們第二次从警备司令部出来，厂里的进步工人都不敢接近我們啦！因为工会对进步工人监视的更厉害。有
一个工人因病小秋家去看小秋，后来就被伪工会开除了。
在伪工会的严密监视下，活动越来越困难，同时又在生活
的逼迫下，我们就会散乱开，自求生活，但是我们每个人
的心，时刻不忘斗争。

（杨金信 整理）

三黑夜里

王金芳

1949年的冬天，天津正在被解放军包围最紧张的时
候，外边的炮声和机枪声不断的传进耳朵里来。炮弹不断
从头顶上嗖嗖的飞过，工友们都躲进了地洞。可是大工房
男单身的工友三一伙，一群正在谈着：八路军进来了。我
走进了男单身四号时，在大门口旁边站着一个人，我仔细
一看，原来是小张。“你在这里干嘛啦？”小张说：“我
在这里放哨啊！你到里边去吧。”我到里边一看，他们正
在收听唐山广播电台播音。那时唐山已经解放了。我也与
他们在一块听起来。

大家正在听的高兴，突然外边传来了咳嗽的声音，我
赶 紧 把 电 阔 关 了，大家都躺在炕上装睡着了，有的还装
着打呼噜。就听外边大皮靴子的声音咯支咯支的 进 了 屋
间，有人在说：“他妈的，小鬼子们都睡着了。”说话的
是大个子，手里拿着电筒，走进屋间里边来。挨着他后

• 246 •
边，紧跟着一个小个，手里端着美制最新的卡宾枪，嘴里还说：“小王八蛋不好好的睡觉，拿枪把你们一个个的都打死。”说完了，回头一脚把门踢的光当一声就走了。大家好半天也不敢说话。后来外边皮鞋声听不见了，大伙这才把电门开开，你看我，我看你的看半天，都说：“咱们还是接着听。”就这样，一夜不知闹了多少次，可是我们那管它这些，还是想听。因为我们大伙都等着解放，心里急盼了，听到唐山的播音，大伙就像眼前也解放了一样高兴，虽是在黑夜，也好像见到了太阳一样的光明。

四护厂斗争

范仲轩、靳昌耀口述

一九四八年八月间，东北各大城市都已经解放了，黎明前的炮声逼近华北平原。京、津、唐的国民党匪军们个个狼狈不堪，缩着脖子在街道上慌张的走着，那些国民党官太太们也显出十分慌张的样子，手提皮箱，乘上火车、飞机在逃命，他们要完蛋了。有一天，在北宁花园的小河岸边，站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中等身材，身穿蓝布大褂，黄皮鞋，戴着眼镜。这人三十多岁，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小学教员，其实他是我们党的地下领导者刘同志。其余两个人是纺纱厂工人，地下党员靳昌耀和范仲轩。老靳
和老范来到北宁花园，是接受党的重要任务的。刘同志详尽的叙述了东北解放的情形，并说：因为敌人要完蛋了，他们必定要破坏工厂，压榨工人，所以我们必须组织工人保护好工厂，安定工人的心理，并监视敌人的 一举一动，随时向上级汇报。

地下党员靳昌耀接受了党的任务以后，马上进厂进行工作，他一方面秘密的组织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斗争的老工人和进步工人，一方面把东北解放的情况进行宣传，当即在中学五班国术馆（老靳常在这儿练国术）里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和布置保护工厂组织纠察队的问题。积极分子们个个精神焕发，表示一定要保住工厂。地下党员范仲轩用自己的钱买了 一匹红布，叫他老婆放着哨，便和老靳在屋里将布撕成布条做成臂章，写上“工人纠察队”的字样。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快完蛋了，厂里的伪工会打手们和匪警们到处对工人进行监视，他们经常到国术馆去巡逻。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员靳昌耀分别给伪工会理事张树发、张远、刘魁写了三封警告信，告诉他们要保障工人和工厂的安全，不得有任何损失，否则要负完全责任。在这个时候，各个车间里的纠察队已经组织起来了。纠察员们手持木棒，臂带红臂章，监视着敌人一举一动。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纠察队成立以后，天津市大部分工人回到了工厂，人们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地下党员这时召开了纠察队队员和党员大会。老靳激动的向大家说：“咱们
的亲人快来了，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们要孙世昭、张家福都要来了。我们要保护好工厂，绝对不能叫敌人破坏。工厂是我们工人的命根子，饭碗子，要随时注意流氓坏蛋们的一举一动。”

会刚散，厂里的伪警队长和薛振江，巡夜走到国术馆，见里面点着灯，进来就瞪着眼问：“你们干什么，还不睡觉？”靳昌耀、张福德等十几个小伙子，一边翻着土（国术馆里练武的土）一边回答：“你们看我们干什么啦!”

薛振江围着屋子在四处检查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就狼狈的走开了。就在这时，天津郊外大炮轰隆隆的连天响，地下党员们和纠察队员日夜不离工厂巡视着工厂和机器设备的安全。地下党员靳昌耀半个多月都没有脱衣睡觉。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晚上，解放军进入了天津郑庄子的中纺五厂，纠察队员们不顾多日的疲劳，火速向各个家属和职工传递喜讯：解放军来啦！共产党来啦！中纺五
厂的工人个个喜气洋洋，在郑庄子欢迎自己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军。解放军进入中纺五厂以后，地下党组织将已经调查好的匪警枪支清单交给了解放军。

不久，工厂党组织召集了奖励护厂有功人员的庆祝大会。在会上，这些不顾个人生命保护工厂的工人个个受到奖励，党员靳昌耀将面库打开，给侦察员们做了一顿雪白的大馒头吃，工人阶级受压迫、饥寒交迫的日子真正的结束了。

（王恕岩、王文又 整理）
第三辑

解放以后
工作組来厂

杨玉宗

解放军渐渐逼近天津市郊了。时而打炮，时而稍停，市内的蒋匪军慌乱不堪，特别是城防前沿的匪军更是乱成一团，到处抓兵、抓伕，挖战壕修碉堡，做垂死挣扎。

誰願意給他們冒险干活啊，所以匪軍抓不到人。他們凶惡的如狼似虎，按我厂保卫甲办公处的户口规定每天必须出民伕十五到二十人，非法必究，弄得人人心慌，加上每天的物价暴涨，工人时常挨个排队也买不到粮食。工人們上班挨饿，不上班又怕被抓去当伕，后来逼得按户凑人去当伕，有的家庭生活困难拿不起粮，只好硬着心自己的孩子去卖伕，押点钱来维持生活。

光抓民伕还不行，匪军为了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把过二十五岁的青年人一律强征入伍。名册公布出来以青年人个个低下脑袋，愁得徹夜不眠。就在这危险的时候解放军的炮火打得越来越激烈了，日夜不停。工厂停。过去压在工人头上的那帮作威作福的流氓坏蛋們
也知道天下要变，见了工人不再是硬塞子瞪眼，而是离着老远就笑嘻嘻的打招呼。人们都高兴的想：这黑暗的天快明了！炮声越响，工人心里越乐，有的人很关心解放军的情况，就围在收音机旁听新华社的广播。只听到收音机里说：“工人农民兄弟姐妹们，……你们都受苦了，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队伍，打垮蒋匪帮，解放全中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声音温暖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真比过年还愉快的多呢！

不多几日，解放军就解放了天津。厂里由地下党领导组织了工人护厂纠察队，我们都抢着参加这个工作。纠察队分为男女两个大队，日夜巡逻，都带着警章。

十五日深夜，工作组的人来厂了，其中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时期领导工人斗争，分别已久的工会干事们，像杨远（曹鸣声）、高更（张家赋）等人。听到这个消息，有的人高兴的掉下眼泪来，见面后握着手，很久不知道说什么。
她們眼裡也有了泪水，但抑制住伤感，安慰自己的兄弟姐妹們：
“不要难过，坐下来谈谈今后的工作。”我們互相述说著过去经历的事情，互相鼓励。张家樑对大家说：
“今天解放了，天下是咱们工人自己的了，有共产党领导，有毛主席給咱们撑腰，不用怕了，今后好好干吧！”大家听后都笑了。

工作组和军事管理委员会接收了中纺五厂，日夜忙着帮助工人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帮助工人恢复生产秩序，搞红旗和“五四七”生产大竞赛，又成立了工人消费合作社等福利组织，有事就和工人商量，办事待人亲切。工人觉悟提高了，干活非常带劲，心情非常愉快。下班后就扭秧歌舞，到处都是锣鼓喧天。人人都欢欣地歌唱着。
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

李夏聪、郑焕年等 口述

1949年2月7日，正是最冷的时候，往年，中纺五厂的工人们，会一家子围着一床破棉被，蜷成一团，蹲在工房里的冷炕上；那些为了活命，一天赚得两个窝头的工人，穿着褴褛不堪的衣服，赤裸着双脚，跑向车间，为资本家去卖命。可是，这一年的一月七日，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虽然天气寒冷，但工人们个个喜气洋洋，好像春天已经来到，一个个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走向车间去开会。

这一天，中纺五厂的伪工会被彻底推翻了，伪工会的理事柳树林、郑大福已被工人看走了，人们欢欣鼓舞。“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深深印在每个工人的脑海里。

厂军代表在车间里对工人讲起了林祥谦等同志当年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事迹。“二·七”斗争是我们工人阶级为争取自由和幸福的伟大斗争，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
的光荣传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的口号震动着布场车间。

接着，军代表又讲到共产党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选举自己的工会，为我们自己办事，当即发动工人们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出工人代表。工人们是多么欢乐呀！自从一九四六年进步工会被反动派推倒以后，民主选举在工厂里还是头一回，记得伪工会也进行过选举，可是，那个时候是什么选举呀！伪工会理事们印出了选票，提出他们自己的名字，打着绳和麻绳在车间里，工场的大道上来回穿来穿去，监视着工人们，强迫人们去选举，如果不选，棍棒会落在工人身上，麻绳会把工人捆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工人们看到打手们拿着麻绳和棍棒，就知道一定又是强行选举了，说不定又要出什么不祥之事，谁要倒霉，就得挨这群畜牲们的揍了。工人们为了不选他们，也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有的工人把选票用麻绳串起，系成圆圈挂在脖子上，以示反抗，有的干脆用选票去擦屁股。

人们回忆起那样的“选举”，看看今天的民主选举，真是天地之隔，而且今天自己能提自己信任的人来当代表，可真是自由啦！翻身啦！

各车间像赶庙会似的，人们欢笑歌唱着，军代表、工作组的同志们，和工人三一群两一伙又说又笑，分不清你是工人，他是干部，可感是解放军老百姓一家呀！

接着，全厂各个生产小组选出代表五十四人，这些代
大都是工人，他们中的不少是工人的代表，也有进步的工人。他们有的在解放前在地下党领导下，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英勇战士，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工人。

二月十日、十一日，又从五十四个代表里选举出职工代表委员会，里面有地下党员范仲翰、杨恩泰，进步工人李良勋等共九人，这就是解放以后的第一届职工代表委员会（临时工会）。临时工会成立以后，工人个个扬眉吐气，搜刮的制度取消了，工人个个扬眉吐气。

哺乳室建立了，食堂改善了。在过去，女工吃饭喂奶都是站在工厂门口，家里人送来盆子面窝窝头、咸菜，女工一边把孩子抱到怀里，喂孩子喂奶，一边站着吸一口窝头，啃一口咸菜，三九天，要吃上一口水，西北风早就把工人淹饱了。如今呢，工会给女工们设立了哺乳室，食堂也可以自由入职工了，吃的不是黑面面，山芋干，而是雪白的大米饭和馒头。

工人们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大大激发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人们不再像过去给官僚资本家干活那样磨洋工了，为了增加生产，支援大军南下，他们曾要求领导批准在开饭时关车。工人们说：“今天干活是为我们自己了，不是给那些人白吃了。”

四月十二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厂里又实行了民主管理，也是以民主投票的形式由全厂工人选举出“工厂管理委员会”，“工厂管理委员会”由二十多个委员组成。
他們都是各个生产小组选出来的代表。“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工厂的重大事件，如生产计划、工资制度、民主改革、组织变动、人事变动等都要召集委员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来管理和处理全厂事务。在过去那听说过有这个大喜事呀！

五月三日，“工厂管理委员会”开会，就决定了几个重大问题：职工和工人团结问题，保证红五月计划胜利完成问题，职工疾病治疗问题，怎样实行民主管理问题。全厂工人代表个个争先恐后热烈发言，工人阶级真正的当家做主了。

（王怒岩 整理）
槍斃張樹發

柳敏弟

一九五一年四月里一天早晨，下夜班的同志們都不回家，三五人一伙，聚在在一起喜悅的談論着，似乎出了什麼大事。我為了要知道什麼事，湊上去听，他們正說的熱鬧。有的興奮的說：“這一回报仇的日子可到了。”有的惱怒的說：“解放前他可把咱們欺侮透了。”有人接着說：“那時候咱們算老几，人家叫你死你就不能活着。”我正在摸不着頭腦的時候，忽然保衛科王同志興沖沖的跑来对我说：“小柳，快扛槍去，今天咱們在女專門宿舍開大會公審張樹發，你們糾察隊都去，你去當警察。” 啊，原來是這么回事。我一溜煙似的跑回糾察隊，拿我的步槍挎上了子彈。当时我高興極了，扛著槍跑步向會場奔去。我一边跑一边想：解放前，像我这样的“臭工人”，走路都不敢抬头，今天居然拿着武器來壓服大家的死對頭，真是翻身當主人啦。

會場上大約有一千多人，除了在班上坚持生产的人以
他們都是各個生產小組選出來的代表。 “工 廠 管 理 委 員 会” 是工 廠 的 最 高 劃 事 机 关，工 廠 的 重 大 事 件，如 生 產計 划、工 資 制 度、民 主 改 革、組織 变 動、人 事 变 動 等，都 得 召 集 委 員 討 論， 充 分 發 揚 民 主 來 管 理 和 处 理 全 廠 事 务，在 过 去 那 听 有 这 个 大 喜 事 呀！

五 月 三 日，“工 廠 管 理 委 員 会”開 會，就 決 定 了 几 個 重 大 問 題：職 員 和 工 人 団 結 問 題，保 證 紅 五 月 計 划 胜 利 完 成 問 題，職 工 疾 病 治 療 問 題，怎 样 實 行 民 主 管 理 問 題。全 廠 職 工 代 表 個 個 爭 先 恐 后 热 烈 發 言，工 人 階 級 真 正 的 当 家 做 主 了。

（王 悠 名 整 理）
擦着眼泪紧握着枪和大家一齐哭。

陶大娘儿子陶傻子的死是—九四八年的事。想起来谁都难过。陶景海同志因参加进步工会被开除了，他哥哥陶傻子在布场作工，大伙都知道他，人非常忠厚老实。陶景海被开除了，他们——以张树发为首的流氓伪工会头子们，并没有放松对老实实的陶傻子进行迫害，百般侮辱虐待，张树发指使他的亲信狗腿子刘八，每天对陶傻子打骂，拿他开心，终于被折磨病了。那时生活都成问题，哪有钱治病。病一天天加重，陶傻子拖着重病的身子到伪工会去给他们叩头求他们，张树发不但不管，反而恶毒的一脚把他踢倒。不久，陶傻子就死去了。当然，在那时候死个工人真不如死个小鸡，在工贼流氓们看来，所谓安分守己的工人病死了，他们都不管，何况陶傻子是“八路嫌疑”的家属呢？

人们都沉浸在悲痛的回忆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枪毙他！”这时，大家都一齐喊：“要求政府枪毙张树发！”

“逮捕坏蛋刘八！”“给陶傻子报仇，给大伙报仇！”人们愤怒到了极点，有人要上台去打那个恶霸，下面的骂声，喊打声响成一片。那个称霸一方的流氓发抖了，经法庭研究，由区公安局孟局长代表政府向大家宣布：政府接受大家要求，依法判处反革命罪犯张树发死刑，立即就地执行，并根据群众要求马上逮捕坏蛋刘八。这时一片欢呼声，人们沸腾起来了，发自内心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感谢政府英明判决！”“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外，都参加了这个大会，会场很严肃，听不见有大声说话的，人人都紧张、焦急的等待着。到九点多的时候，一辆囚车开进了会场，大家都看着囚车，一动也不动。车门开了，首先下来了两个武装整齐的公安战士，随后，那个被绑着的万恶的工贼张树发，由公安战士押下囚车走进会场，人们都愤怒的瞪着他，这个王八蛋不得不低下他那罪恶的头，样子很狼狈。这个大名鼎鼎的伪市参议员、厂里的伪工会理事长、中统潜伏特务、流氓工贼，没想到以前他随意摆布，随意侮辱的一些“臭工人”，今天居然自己组成了法庭要审判他。旁边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唉！这次不知道是不是枪毙他，要是枪毙才好。”看样子还有顾虑。当然啦，这个流氓在五厂统治这么多年，确实够厉害，难怪有人顾虑。但是世道变了，这回是逃不了他的。

这时，由公安局的代表、本厂军代表、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和工人所组成的人民法庭开庭。万恶的特务恶霸张树发被押上了法庭，血泪的控诉就开始了。进步工人齐双花、徐明和的老婆……等一个接一个的上台控诉，台上台下都泣不成声，人们愤怒高呼：“枪毙张树发！”这些血泪的控诉，不只是控诉了这个特务流氓，而是控诉了支持他的阶级，控诉了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吐出了工人们多少年的冤仇。我们那能不哭呢，我们那能不愤怒呢？这时陶景海同志（解放前因参加进步工会被张树发开除）扶着他年老的母亲陶大娘上台了，陶大娘一上台就哭着要儿子，要张树发还她死去的儿子，这时大家更哭成一片，我
工人大翻身。

楊伯苗

一九五四五年，厂里掀起生产竞赛的高潮。当时，由于工人热情高，布场的产量逐渐上升，穿筘间的供应越来越吃力，这就不得不采用点的办法来维持供应。可是，当时党的工人开办了工人业余文化学校，使大家早日不当文盲，学习真理和生产技术，这真是一件过去工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因此，都要求学习。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上学不能加点，不加点不能满足布场供应。

党当时教育我，要依靠群众，渡过“提高穿筘产量”的难关。当时，车间里用的是二人穿筘机，只能穿那么多的活，所以我有些胆量不足，犹豫犹豫，党知道我这个心理后，几次的帮助我，鼓励我，支持我。在保全工人李良聪（现在是布场付主任）、穿筘工人花桂珍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研究，终于将二人式穿筘机改为一人式穿筘机，总产量比原来的提高了一倍左右，供应充足了，大家不再加点了，还能按时学习文化。我为这个改进成功
人們跳着，喊着，不少人高兴的流着泪，都说："这下子可好了，" "可给大伙出气了。"

判决宣布以后，公安战士押着这个恃强凌弱，到大墙外面大场子，人们都跑去了，要亲眼看到这个坏蛋的下场，我拿着紧紧跟着大伙一起跑去。到了大墙外，没等这个坏蛋站住，我们就公安战士神速的一枪就结束了一个可耻的生命。这时，人们鼓掌欢呼，别提多高兴啦。都跑到前面去朝着他那万恶的尸体唾上两口。

这时，囚车又开走了，大家又都亲眼看见坏蛋刘八被带上手铐，押进了刚才载着张树发的囚车。大家真是太痛快了，真正感到是当家做主了，过了很长时间，大家才高高兴兴的散去。我回到纠察队，躺在床上休息，像是完成一桩非常光荣的任务似的。同时我也不禁想到：我今后用什么来报答党呢？"
去担任这个工作。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自己的脸上有些发热，心也在乱跳，愣了神，不知怎么回答好。这时，书记又补充一句：“你考虑一下，不能向困难低头，依靠群众就能完成任务。”我说：“书记，不行呀！我没干过，怕干不好。我自己不放心。”“行。回去和群众商量商量，有困难找党！……”

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培养和教育下，像我一样的成千上万的青年，都成了国家有用的人材。想起我妹妹，她原是一个任什么不懂的小姑娘，只有三年文化水平的一个实验室的工人，而今天呢，在党几年的培养下，成为一个年青的大学生了。说真的，过去我们家祖祖代代还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就是连个初中生也出不了啊！

怎么叫人家形容九年大学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呢？恐怕说上几昼夜也说不尽呀！

党——敬爱的党，我的母亲。还是让我用实际行动，来给人民做更多我应该做的工作吧，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您对我这些年的培养和教育！
而高兴。记得刚解放时军事代表曾讲过：“……我们是工厂的主人翁了，这是给咱自己干的……。”真的，过去的工人比牛马还不如，不知几时大祸就从天而降。记得我十四岁那年，在天津棉纺二厂布厂加油、扫车，有一天，不知谁不小心把一个棉纱管仍在一台正开着的布机的挤开口处，绞断了一片线，一个凶恶的工头就将我乱打了一顿，我从此就失了业。解放后，还是那个工头，有了这么点技术改进，马上得到党的奖励，又许我为天津市的劳动模范，我越发感到党的温暖了。党为了进一步教育我，培养我，又两次送我入党校学习，从此我的脑子越来越开窍了，懂得不少的革命道理。从党校回来不久，党又从生产技术上培养我。

我当时是技术员仅仅一年左右，有一天，接到厂党委书记的电话，叫我过去。当时想，是不是因为工作有问题，心里有些不安。我非常谨慎地打开书记办公室的门。“老杨，你来了，坐下谈谈个问题。”书记满面带笑的说着，叫我坐下，又接着问：“近来工作怎么样，在党校学习有收获吧！”

“学习的很好，脑子开窍了，懂得不少真理，工作没经验，总怕搞不好呀！”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回答着。
“你看，生产发展了一步，群众生产热情又这么高涨，非常需要个工人干部去领导生产呀！你看呢？”书记两眼含笑等着我的回答。“群众热情是高，可是叫谁管理去呢？”我还没领会书记的意思。“准备车间需要个工人出身的付主任，我们听了群众的意见，对你很拥护，党决定派你
了黑色的小红破棉袄，上面补着一块一块的黑补丁。补丁，扣子都断了，不能扣上，总是掩着怀，一条黄不及的青夹裤齐到腿肚子那儿，鞋就更甭提了，踏着一双鞋，头髪像干草，连个头髪夹都没有，总是夹在耳朵后面，焦黄的脸上只显两个高颧骨，走路哈八哈八地两边晃，五分钟迈不了一步，常常冻得走不了路，坐在大门口哭，回去晚了还得挨婆婆和丈夫的打骂。

记得还是我们厂里进步工会存在的时候，有一次，她又冻得坐在门口哭。有了解她情况的人，就把她的事报告工会了，工会了解情况，就派人把她送回家去，并告诉她婆婆，以后不准虐待她。有进步工会在的时候还好，进步工会被破坏以后，她又重新掉入火坑。

有一次，下班后回到家，大家已经吃过晚饭了，婆婆把大家吃剩下来的一点饭叫她吃。玉兰才吃到五分饱，婆婆看了看桌子上的饭，上下地打量了玉兰几眼，就恶狠狠地说：“要是吃剩了就别强吃了，拾掇拾掇快去木厂拾木头去吧！”

虽然玉兰肚里不饱，可嘴里也不敢说什么，只好收拾收拾就到木厂拾木头去了。

那时，说拾木头倒不如说偷木头爽快。在饥荒的年代里，偷木头就不只是她一个人的了。那天，大家正在偷木头，被看厂的狗腿子看见了，别人的腿都快，跑掉了，只有她一个人被狗腿子抓住，不仅扣下了她的木头，还打了她两个嘴巴，看她是半死不活的人，才把她推了出来。
孙玉兰

王淑敏

刚进工人文化宫，听着有人叫我：“淑敏，看电影来啦？”

我忙回头看，见是一个不大熟悉的漂亮女人，新叙的头髮，红润润的圆脸，上身穿了一件烟色大衫絨的外套，脖子上还围了一块围巾，下身穿一条蓝双裤，黑皮鞋，不由得使我一楞。

她见我发楞就笑着问我：“怎么不认得啦？”

呵，我这才想起来她是咱们厂里的孙玉兰呀!

提起孙玉兰，咱们厂里人人都知道，她是被党彻底解放的一个受压迫的女工。

她家住在杨庄子，因为她从小就沒有父母，给陈家作童养媳。解放后，她和她的丈夫离了婚，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孙玉兰。

我才认识她的时候，还是在日本投降的那年冬天。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她穿了一件很薄很薄而且已经变成
么他就必須先知道一下玉蘭对共产党的認識如何。

其实，玉蘭也早就知道他的心思了，就說道："不知道。"

这时，玉蘭的婆婆也进来了，一进門就恶狠狠地坐下
吃着儿子整問玉蘭。

儿子見母亲来了，气也就更粗了。問她："你按得是什
么心？这些天回家不是挑吃就挑穿，你別认为共产
党来了，我就不敢怎么样你了，你是我买的馬，換來的
驢，我願意打就打，願騎就騎。"

玉蘭冷笑一声说："那是过去，现在，大 家 都 解 放
了，我也要解放，不叫我吃飽不行。"

玉蘭虽然鼓着勇气說了几句，看看婆婆和丈夫的凶
样子，心里又有些發怯。

婆婆見玉蘭有些發怯，就更厉害了："你安的什
么心？我把你养到这么大，你会跟我强嘴了！"說着，奔向
玉蘭就要打，丈夫抄起擀面棍也要打。

玉蘭是被他們母子打怕了的，見了这光景，就要跪下
說好的，又一想，我总这样受他們的，得什么时候受到头
呢？ 再說，工会說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受受压迫的
人民办事的，有工会给你作主。"反复一 想，这 样 的 生
活活着也没意思，不如今天就是今天吧，就大着胆子說：
"我要离婚！"

婆婆听她說要离婚，就恶狠狠地說："什么离婚，离
婚行，有一节，你从八岁进我的門，吃的穿的都得退給
玉蘭受了一肚子的委屈，晃晃荡荡地好不容易走到家里，
婆婆见她没像索要头，她满面的不痛快，指着玉蘭的脸骂道："废物，怎么人家都抬来了，就你抬不来，别提；你是不成心拾呀！"说着就是两个嘴巴子。

丈夫脱下鞋，照她后胸又是几下子。玉蘭跪在地下求饶，婆婆母子哪听这一套，还是打！在早，她就是过着这样的牛马生活。

解放后，政府公布了婚姻法，我們厂子工会女工委員也組織了妇女学习婚姻法，玉蘭也參加了學習。

虽然玉蘭参加学习，但她并不敢向她丈夫提出离婚。她想：要是离不了不是更受气吗？唉！那命吧。当然，认可命并不等于精神痛快，所以解放后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唱着歌，只有她一个人愁眉苦脸的。经过女工委員的再三宣传，她才敢提出离婚。

这天，她回到家里，婆婆仍把大家吃剩下的剩饭拿出来叫她吃。

当玉蘭吃到几成飽的时候，婆叐又說了："吃不了就別強……"

这次，玉蘭没等她说完就说："我还没吃飽呢。"

因为每次玉蘭不敢这样說話，这天竟理直气壮的问
婆婆就有点受不住了，可当时也没说什么，等玉蘭丈
夫回来，娘儿两个不知叨咕些什么，当天夜里玉蘭丈夫就問玉蘭："今天厂里生产好嗎？"

他哪是問生产好嗎，他是想了解玉蘭對他的态度，那
部說話，精神很愉快，不由得看着她一笑。

厂里人都很替玉蘭高兴，所以大家看见她都要笑的。

王鳳祥笑正被女工委员看见，她想，倒不如把鳳祥给玉蘭介绍，作个对象，也解决玉蘭生活孤单的问题了，凤祥是个警卫，工作很认真，又是个共产党员，倒是一对好夫妻呢。

不久，玉蘭就和王鳳祥结婚了。结婚后，两人感情很好，凤祥很同情玉蘭过去的生活，也很佩服她現在的工作，他見玉蘭不識字，每天还教她学习五个字。

d大家看到玉蘭生活幸福，新婚后小两口又很和美，鄰
背地里說：“这才是被共产党徹底解放的一个受压迫的婦
女呢。”

他們現在已經有三个小孩了，生活过得挺不错。
玉蓮說：“我從八歲進了你們的門，侍候你們大的小的，總有幾件不如意的事，都拿我出氣，不是打就是罵，從來也沒吃過你們一頓飽飯，一張嘴子總是空著半掛，你找我要飯錢，我还向你要这几年当老媽当丫头的錢呢！”

当天夜間就到法院过了堂，后来又过了几次堂，终于离了婚。

玉蓮离婚后生活很好，精神也很愉快，工作也就积极起来了。有一次，在小組会上，大家討論红旗竞赛的事，玉蓮说：“我看把咱们这一个大组再分成三个小組，咱们自己展开小组与小组的红旗竞赛，如果每个小組的竞赛指标要都完成了，那么没问题，大組的竞赛指标也就完成了。”

大家都同意她的意見。

这天，妇联正訪問玉蓮，問她現在的生活情況，工会的女工委员也在旁边陪着。

玉蓮說：“我现在的生活情况很好……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还有今天的幸福呢，那还不是早晚死在他們手里嗎。我的生活是很好，只是我想共产党怎么不早来呢，要不是早来，我的父母也不致于死那么早，我也不能受这么大的罪呀！現在我的生活虽然好，倒是没有一个亲人。”

說得妇联同志和女工委员又是喜欢又是同情她。

这时警衛王明祥正到工会来办事，看見玉蓮和两个干
就在这个厂里作工，每月的工资连吃饭都够不全；冬天天
气很冷了，还穿不棉裤，上班时就像一溜烟似的往厂
里跑，下班回来就围着破被在炕上坐着。到月头没钱吃
饭了，只好做工，偷着到外边去做点零活。而该工厂里是
不答应的，要是被抓住起码要挨一顿打。有一次，狗腿子
们到宿舍里去抓人，把来得及跑出去，急得没有办法，藏
在“被阁子”里才躲过这一关。……想想现在的情况，简
直完全不同了，不但生活不成问题，有了病厂里还照顾，
真好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自己给自己干活了。往后的日子
还会更好呢！想到这里，他心里一高兴，觉得病轻了许
多。他再也不愿意歇工了，病还没好，就提前上班了。

打那以后，他时刻注意坚持出勤。他知道自己的肠胃
不好，就加倍注意饮食卫生。按时吃饭，多吃热的和软的
食物。每天下班回家后，就抓紧时间睡眠，以保证上班时
精力充沛，不出事故。不漏夜。日久天长，慢慢地他练的
步越来越快，质量也越来越好了。

1953年，厂里要总结他的操作经验，派查定组来给他
测试。那时，他的胃病又犯了一次。他一边巡道一边用
手捂着胸口，自己跟自己说：“要不要休息一下呢？不
行。领导上这样重视自己的生产，不能早总结出来就最
好。再说这里有三位同志在查定，自己一歇，他们三人的
t间也浪费了。一定不能下床。”后来查定组的同志也发
现他不舒舌，让他先去医务所看病。他很干脆的回答：
“生产上是好汉，出勤上是模范”

王文义

晚上八点多钟，张学礼上中班，正在織布机旁巡回，忽然家里人打来电话，说他的小儿子病厉害了。已经烧了几天的孩子的暗红的面孔，立刻出現在他眼前。一个念头在腦中闪了一下：“可别不行了！”他忙着和工段长講了一声，披上棉袄奔回家去。他把呼吸困难的孩子抱到医务室打了一针，看她安静下来才放了心。这时已是深夜，中班早已下班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没法办，請兩小时假吧！”

請假的事，在张学礼身上說来是很少的。这两个小时还是他七年以来第一次請的假呢。

早在1949年，天津剛剛解放不久，张学礼的老胃病又犯了，疼得直不起腰，领导下看他病得厉害，就給了他三个星期的假让他养病；在病假期间还發给他80％的工資。张学礼在旧社会里做了好多年工，从来没有見到工厂这样关心过工人。他清楚地記得：日本鬼子侵占天津的時候，他
大 楊

趙 謙

早晨六点多鐘，就聽見工房四周響鼓嘩天，厂里的擴
大器放着唱片，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星期日，厂里召开技术革
新大会，这个大会不是领导做报告，也不是小組討論，是
叫大家“逛庙”。啊！走进厂就看見：大道兩 旁 紅 旗 招
展，这边是“梦想亭”，那边是“茶攤”、“小卖部”，迎
面搭着戏台，左边是紡織革新陣地，右边是布場比武擂台，
修理車間的加工廠出現在它們中間；各式各樣的形式擺滿
了厂里大院，可熱鬧極了。工人们逐漸的多起来，三三兩
兩站在關鍵台前研究課題，揭开了厂里大闊技术革新的序
幕。

革新运动展开以后，由于工人们解放了思想，早已不
滿足現在只看八百锭的水平，很自然的又掀起扩台扩锭高
潮。留着短短头髮、个子高高的細紡倉工、共青团員楊
英蘭——因个子高都管她叫大楊——在每次扩锭中都不示
弱，当她听到別厂已看到二千八百八十锭时，她想： “別
人能看，我为什么不行呢，我还是个共青团员……”这天正赶上夜班，在车间遇见团委的大李同志。 “大杨，这两天生活好做吗？”

“好做是好做，我总觉着看锭子太少了。”

“现在别的厂已有看两千八百八十锭的，你打算怎么办？”大李在她身旁喊着问。

“我早有打算啦，看十台。”大杨回答的很干脆，瞪着激动的眼睛看着大李。大李怕听错了又问一句：“多少？”大杨说：“42支这个品种一共十一台，我全包下来吧！”起初大李有些惊奇，十一台车合四千四百锭，全国纪录只不过是两千一百锭，这个进步速度实在太快了，难怪大李有些不信；但又看见大杨满有把握的样子，她马上说：“好吧！我跟行政商量一下，同意你看四千四百锭。”值班长知道以后，马上给她十一台车看。大杨接受这个任务，心里又是兴奋，又是紧张。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车间，有的人为这个创举所鼓舞，有的人也为大杨担心，还有少数人在那说风凉话：“小黄毛丫头，才来几天，就想露两手。”

“你别看她这时候有劲，到下半夜，又要求下台车，鬼子尾巴长不了。”也有人说“她多看锭子，为多拿钱呗。”这些话使大杨很难过，但她想起组织上对她说过：“要以实际行动教育别人”，想到这里信心足了。往常夜班人们总是觉得太慢，今天这个夜班对大杨来说，不是一般的，她知道：这是为了打破纺织史上的记录，这是给保守思想的人有力回击，她是在既兴奋又紧张中度过八小时的。
东方发白，晨钟响了六下，大杨交完班，走出车间，迎着早晨的霞霞，深深地吸着新鲜空气，感到精神愉快，全身轻松，这是因为她完成了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天大亮的时候，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全厂，给人们带来了鼓舞和力量。这不但轰动全厂，很快传到全市、全国。报纸也刊登了“青年纺纱女工杨英兰，首创纪录四千四百，达到全国最高记录”的消息。当天晚上，北京联合纺织厂派人来厂学习了。这天夜班，车间格外热闹，在杨英兰车间的周围，黑压压一片人，也有拿磁表测定的，也有划巡回路线的……大杨在这种情况下，心里嘭嘭乱跳，非常紧张，幸好事先党委委员曾亲切的嘱咐过她：“要沉住气，平常怎么干，到那时，还怎么干……”虽然在许许多多眼睛注视下，仍有条不紊的执行操作，在相距二十余公尺长的十一台车的格挡里，像小跑似的巡回着。这样，在八个小时，就相当走了一百余里。她一边巡回，一边打擦板，一边接头，忙个不停。要想叫这十一台车，驯驯服服的听人指挥，需要多么熟练的技术！需要付出多少精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

“七一”——这是天津市青年早已盼望的一天。这一天，团市委举行万人大会，用技术革新成就向党献礼，大杨被邀请出席大会，胸前带着金光闪闪的奖章，坐在大会主席台上。
一面红旗

王文义

今年八月的一天，细纱乙班的工人，正开小组合，值
班长徐明和向大伙报告了个喜讯：今年农民兄弟经过苦
战，棉花获得空前丰收……”值班长还没说完，细纱的姐
妹们就嚷起来了：“这会咱可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吃
半饱的日子没啦！”小刘站起放开嗓门：“那咱们怎么能
把农民种的棉花全吃下去呢？”“对呀！”又有一个女工
站起来，小声小气的说：“给细纱机加转，不就能多纺纱
吗？”“好办法，好办法。”徐明和一边赞扬她的建议，
一边问在座的合上先加转数。这个问題一提出，半天没
有一个人吭声，小组合沉寂下来。

坐在人群后边的一位三十开外，剪着头，正在给孩
子喂奶的女工，就站起来说：“我看的机台潜力大，先在
我的机上加转，试试看！”大伙回头一看原来是五个孩子
的母亲、有二十来年纺纱经验的共产党员许淑珍大姐。她不
常不说话便罢，一说就是刀刃上。“好，许大姐先试试，能行我
们都加！”

许淑珍见大伙都支持她，就说：“老徐，请你帮我写张申请‘增加车速’的请求。”她的申请得到车间的大力支持，马上海保全工，换马达，车速由330转一下子增加到400转。车速快了，断头也随着突然增多起来，四百个纱锭中几乎有一半断了头，纺着空锭子，大花成片的开者，吐出来的白棉花，像是决开的河口一样，再加冷风一吹，飞着的棉花，又像下大雪一样，在空中飘扬。抽一支烟的工夫，地板被飞花给盖上一层，机器身的全挂着白霜子。

许淑珍火箭一样在车弄挡里，来回穿梭，接着断头，汗珠从她脸上哗啦、哗啦的直流，她顾不得擦脸上汗水，小褂也全被汗水给湿透了。就在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埋怨起领导来了，有的人索性找值班长徐明和说：“增加车速是为多增产，还是为多出白花减产哪！”

许淑珍的脑子里却没想到这些。她想的先是：农民兄弟，能战胜天旱，水灾，取得大丰收，我是共产党员，难道就被机器加快点转数的困难吓倒吗？能向机器低头吗？不！不能！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要战胜它！多纺纱，让全国人民穿上更多的新衣裳！她对着正在开大花的机器说：“机器，机器，我要加转，你偏偷气，你我相处二十来年，你从来未发过脾气，顺顺从从叫我能换，今天你倒要耍起熊来啦，好呀！我要看看是你把我吓倒还是我把你制服！”

许淑珍，就以这样的共产党员应有的顽强斗争精神，
向机器进行着搏斗。

可是开花、断头还是不见少，一口袋、一口袋白花，堆满了整个车头。她用手抓起一把雪白的棉花，心痛地说：“要是这些白花都纺成纱有多好啊！”越想，越感到光凭干劲，巡回小跑，不但增不了产，还会把身子搞垮了。不行，不行呀！得摸摸车速加快断头多爱开大花的规律。她一边飞快的巡回，清除，接头，一边细心地观察断头，找开大花的原因。

经过几天苦苦钻研，终于找到了断头的原因是绽子心摆动和小纱爱吃断头等，她一个个找到解决的办法把机器制服，大花开不开了，断头几乎全部消灭了，她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又适合于高速度生产的先进操作方法。

许淑珍看管的机床车速是不是就顶到头啦？没有，在活儿比较好做了以后，她就找到值长说：“我那机床车速还差得远哪！我还没有过够瘾呢，再给我加上100转！”车间领导见她这种革命干劲，战胜困难的毅力，就满口答应。这样她看管的机器，由330到400到500最后增到520转。她成为高速生产中的一面大红旗。
陶景海闢革新

陶景海口述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窮人們終於把千年等万年
盼的救命恩人——共产党盼来了。

天津一解放，领导我們工人和伪工会进行斗争的地下
党员张超、孙世清回到了厂里，第一件事就是东奔西
跑，忙着找解放前被伪工会开除而失业的工人們，碰見一
个就叫一个。没有几天的工夫，都把我們找来了。重新回
到厂里，工作起来浑身是劲。腰板也直起来了，头也抬起
来了，高兴的不知說些什么好。

紧接着，党领导的运动一个一个的开始了，拿工人当
牛馬的伪工会代表，封建把头，流氓打手，经过了民主补
課和镇压反对革命运动，都清除的一干二凈。活活把大哥欺
負死的伪工会流氓打手“小刘八”，在镇反运动中，妈妈
向政府控诉了这个坏蛋的罪惡，政府当场就把他逮捕，判
处了徒刑。几十年的苦水，共产党来了，才都吐了出来。

我們的生命得到了保障，我們的仇报了，我們的生活

288
愈来愈好了。

解放前，我们父子四人干活，一天累得七死八活，只养着母亲一人，连碗稀粥都喝不上；解放后，生活提高了，我一九五二年就结了婚，现在有两个孩子，共五口人，每月除了吃、穿，还有钱储蓄。这是党来了以后才有，不然，我还不是就饿死了。

党关怀我们亲如爹娘。就拿这次“苦战”来说吧，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连夜不眠，和工人一起苦战，并且还给工人斟茶倒水，亲切问候，命令连续工作不休息的工人休息。可是他自己却把眼圈都熬青了，工人们劝他回家，他就坚决地拒绝了：“你们昼夜苦战，我们能回去休息吗？高产、优质卫星不上天，我们坚决不下火线！”这给工人多大的鼓舞啊！

这次党号召我们大闹技术革命，改变品种花样，进一步满足广大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把棉布的花样改的更漂亮、更美观。

在把纬方呢改山水插的过程中，因为图画的不对头，设计不好，一连好几次都失败了。我开始有些灰心丧气，心想：这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啊！……脸上觉得一阵热。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像开着电门的机器一样，不停地转动着，而且转的很有次序。党，是党给我们工人带来的幸福生活，是党赶跑了压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党对工人关怀，真是像爹娘一样。党这样相信我们，爱护我们；我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不！坚决改好
布的花样，有党领导支持，不成功，再试验！

继“纱方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五六五四三二等好几个穿综方法，这几个方法做出布来总跑不了这几个花样，三角形、人字形、四方形，总是弯弯曲曲的，费了好几天的时问，也没有想出个办法来。突然，我想起在夜校的课本上学过：米丘林用两种水果杂配的方法，结出另一种又大、又甜的果子来。我反复地琢磨，用两种花样合缝成一种样子，缝出来的是什么样呢？试一试再说。我用三角形和人字形两种花样，合在一起画成了一个图案来缝，缝出布来花大、清楚、特别好看，像山水一样，从表面看来，好像有些水纹似的。立刻，山水绣这种布在全厂推广起来。

我并不满足这一点成绩。因为党的恩情是永远报答不清的。

（李余庆 整理）
老師傅的理想

劉振鈺、王嘉琦

天晚了，何老師傅還不想睡覺。細紗機馬達的改速問題纏着他，可是女兒小敏明天還要上早班，燈亮着，她睡不著。他只得找了一支蜡燭工作。他披了件夾袄，扶了扶花鏡，便聚精會神地看起馬達結構圖來，燭光照着他那胖胖的身形，雖然睡覺很少，精神却很充沛，他一笔一筆地画着，苦苦地捉摸着……。

自从搞高速化生产以来，人們很少听到他的谈话声和爽朗的笑声。小敏总说：“我爸爸这些日子，成天画图，也不睡覺，简直是入了迷了。”真的，这个已有二十九年工龄的老工人何师傅对細紗机馬达改速度的问题入了迷。

厂里搞起高速化生产以来，細紗机的速度都提高了。最成問題的就是一部分新車，它是用三角带传动的，一開車就猛轉，不能掌握快慢速度的调节，这样，在紡小紗时，断头特别多。新車的前罗拉已經是每分钟 250 轉，如果提高到 300 轉以上，紡小紗时断头就更多，会给工人们带来
很大困难。細紗保全老師傅都說：“新車不能高速，就是馬達沒有雙速。”何師傅聽到後就想：”兩個轉速，紗小紗時轉的慢，紗中紗時又要轉的快。既要提高車的速度，又要叫紗小紗時斷頭少，這就可以給國家生產更多的棉紗，創造更多的財富。”想要更多創造財富的崇高的理想，日夜激動着何師傅。在何師傅的腦子里常常想：“細紗新車高速化生產，就決定在馬達身上，而自己又是一個电气工人，怎么才能把馬達改變速度呢？”強烈的責任心鞭策着他，使他日夜琢磨，一心想找到改變馬達速度的办法。想来想去，他就開始試驗，可是既無圖紙，又沒有參考資料。最初，何師傅在馬達上加了个阻力，經過試驗，發現降低的轉數不多，不行。第二次他又加了個線圈，再試驗，結果电流太大，保险和電門受不了，又失敗了。以后，他又利用星期日到書店找了些參考書，可是這些書买来后，由于文化水平低，不能全部弄懂。但何師傅沒有氣餒，仍然刻苦的摸索着，運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工 作 經 驗，苦心鑽研，希望把現有的普通馬達，改成單包雙速的馬達，他又開始試驗起来，先改了个4極和6極的，一試驗，6極的电流太大，和往常一样又失敗了。再来，搞4極和8極的，經過試驗，起動电流太大，又沒成功。何師傅想要把線包都拆了改節距，可是---想，不行，那樣既耗原料又費時間，不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針。在這時候，有人就說了：“你看看，弄個馬達吧！成天摆弄着玩，也弄不出个眉眼高低来，夜里加班为了好受表扬！”何師傅不听这
些闲话，摸摸的更起劲儿了，他一天最多睡上三、四小时的觉，自己总想：“这东西，研究时间长了，再弄不出来，这多么不好啊！”他一边鼓着劲儿的干，一边也不免有些嘀咕起来。机动部技术室技术员就找了何师傅，真诚而亲切地说：“何师傅，甭怕，多会弄出来多会算，别着急，要用人，给你调人，有啥困难提出来，帮助你解决！”还有那和蔼可亲的党委书记刘健同志，无论在食堂或是在车间，多会见多会关切地问：“何师傅，你血压高好些吗？累不累，别着急，研究不好没关系，一点点来，当心身体要紧。”何师傅听了这些话，感动的流下热泪。党给予的温暖和支持，使何师傅感觉自己不是四十几岁，而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浑身的劲儿就上来了。他坚决试验下去，绝不能辜负党对他的希望。

别人的冷言热语，和车间主任始终怀疑的态度，都没有丝毫动摇何师傅必胜的信心。在车间主任提供改进资料的情况下，何师傅开始了4极和2极的试验。在别厂试验时，三相电流不平衡，何师傅在试验中，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发现电压之间接线诊时，一定要在中点接线，不然，别看都是一个包，电流就是不平衡。由于何师傅日夜不辍，苦思苦想，在党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把变速马达试验成功，并装在新细纱车上投入了运行。

何师傅幸福的笑了。舒畅的心情，怎么也无法形容。他说：“党比父母还关心我，经常问饥问寒，关心我的血压高，我搞不成功，对不起党呀！”
双速马达虽然试验成功，新的问题又来了，开关还是没有。前一段的胜利，更鼓舞了他必胜的信心。“好！我一定把变速开关弄出来！”起初，研究用旧开关来改，一看不行，成本太高，又没有这么多的开关。他就想：要是用倒顺开关改呢？也不行，距离太近，容易放炮。又研究，用花钱不多买来的星形三角开关改装，最后，试验成功了。使得马达必需在4极结线时，才能起动，避免了在2极结线情况下，起动时电流过大的危险。他又突破了第二个难关。

在细纱新机上经过试验，细纱车速由285转，提高到340转，马达温度又不高，生活稳定好坐，受到了细纱工人的欢迎。何师傅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使细纱机为人民纺出了更多的纱。
机器的主人——张宝顺

冯汉群、李铭城

1949年天津解放以后，没有几天，张宝顺就以“革命工人”的身份到五厂布场正式上工，一个长住过着失业生活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没有比获得职业更愉快的了。当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从进厂的第一天起，他就钻研起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听到谁一谈技术问题，他就凑上去听，自己经常暗地里考虑，不懂就问师傅。这样，他的织布技术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全布场的织布能手了。

大跃进以来，上级要求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大大提高产量，以满足人民需要，他开始细致的研究如何能找出巧法来加快操作。在织布工的全部操作中，他都创造了既快又安全的操作方法。

说起来也真不容易，他创造这些经验，费的心血也不小。单说“斜纹布时不用找线头，快速被动换梭子”一项吧，在车间里，机器转的那么快，噪音那么大，生产
任务又是那样紧，真抽不出时间来研究。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到党的关怀以及志愿军在朝鲜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英雄事迹，他身上就增加无限的力量。下了班，别人去看电影或回家休息，张宝顺却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着，失败了他也不灰心，吃饭想，睡觉想，走道也想。胜利总是属于坚毅的人们，当他试验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从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愉快，换接时间比以前降低了一半左右，产量显著的上升了。

其他操作，如“被动处理停台”、“取梭大搓梭”等巧妙动作，都是经过这样苦想苦练才成功的。群众一提起张宝顺，就想起大拇指说：“好家伙，布场的常胜将军，称得上机器的主人。”

张宝顺真正是机器的主人。对每一台机器都能预防发生毛病，要是机器有了毛病，只要他一听一看，或一摸，就知道毛病在那里，机器在他手里驯服的像绵羊一样。因此他几年来能一贯地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多次的避免了看来不可避免的事故和次品。
快乐年

王淑敏

要提起过年本来算不了什么新鲜，因为每年都有一次。但是，今年——1959年过年却和往年不同。因为厂长说：“我們辛苦了一年，特別是在下半年苦战中，大家都很辛苦，所以要請我們来一次聚餐。”

元旦的早晨，我們都穿上了自己最心爱、最漂亮的衣服到了食堂里。

这时我們的车间主任、支部書記，早已把酒和菜給我們摆好了。

我們組的李嫂早就来了，坐在一张桌子上正向我招手：“淑敏坐这来！”

我一看没外人，都是我們組的人。小姚今天打扮的更漂亮啦，家作小花棉袄，毛料裤，两个小辫梳得挺光。她见我来，也不答話，也不讓坐，眨巴着两个小圆眼出神。我看了看她，也没说什么，就和她坐了个对臉。

我知道小姚因为这几天抢旗胜不了我，总是和我有点
别扭。

开始吃饭的时候，组长给我们斟上了酒。

李嫂说：“咱们今天可得痛痛快快喝几杯呀！大家好不容易有机会在一起热热闹闹玩一回。”

我端起杯来向小姚说：“小姚，来，我敬你一杯。”

小姚忙站起来说：“你别敬我，我也别敬你。”

大家正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小姚继续说：“咱们划拳，谁要是输了，就罚她吃酒。”

我本来不怎么喝酒，但这时也只好和她吹大话：“划拳就划拳吧，还在乎你！抢红旗胜不了你，喝酒还胜不了你，来！”

正划的起劲儿，党委书记到我们桌子上来敬酒来了。

他说：“同志们，我代表党委祝贺你们今年的丰收，敬你们一杯，并预祝你们明年更大的丰收。”

大家忙说：“我们的丰收是党的英明领导，请您代表党委接受我们的敬酒吧。”

党委书记连声说：“好！好！大家干一杯吧。”

说着大家忙站了起来，我虽不怎么会喝酒，也跟着大伙一饮而尽。

党委书记喝完酒，眼睛往四下转，手指着小姚说：“这位同志是在苦战时抢旗子摔跟头的小姚同志吧？”

大家听说摔跟头三字，都笑起来。向党委书记点头说：“是她！”

小姚把嘴一撇说：“在‘乐战’时摔跟头的才是我
呢，我没参加过苦战！

小姚说参加“乐战”没参加过苦战，在我们小组来说，这到是件真事，就拿前几天夜班的情况来说吧，因为要缩短停停时间，我们小组落纱工就展开了左右两面抢红旗子的竞赛，看那一面落纱落的快，生头生的快，那一面的落纱工人先出去，早抢到旗子，到下班时把每台车所抢旗子的总数加起来，那一面抢的次数多那一面就为先进。我代表左面抢，小姚代表右面抢，小姚摔跟头是为抢旗子摔。

那天，在一条弄堂里，小姚落完纱刚出来，见我还没出去，她就忙去抢旗子。其实呢，我们早拿了纱，我虽然身子没出去，但胳膊早就伸出去，把旗抢到手了，小姚扑了个空，当下摔了个跟头，大家都笑起来了。我也笑了，刚好正遇党委副书记给大家送茶水，见小姚摔倒，忙去扶她。小姚忙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的，就指着我说：“你别笑，下次车要再叫你抢去我就不姓姚！”

我们俩竞赛了一夜，到下班算抢旗子的总数时，闹了个平手。

小姚看了我一眼说：“我早摔了个跟头，怎么一个旗子也没比你多呢？”

虽然事情过去了，可是，只要大家想起来还是笑呀笑的止不住。

党委副书记见小姚说话有趣，端起杯来非再敬她一杯不可。
党委书记走后，李嫂说话了：“别光你俩玩，出个主意大家玩玩。”

d大伙都同意。有的说：“咱轮流着唱歌吧。”也有的说：“抓阄唱歌吧。”

我说：“咱找一个人去敲鼓，大家拿条手绢，手绢传到谁手，鼓点要是停了，就让他唱一个歌。”

大家说：“行！有意思。”

小姚听说找人敲鼓，就忙说：“我去。”

当手绢传过一圈后，小姚看看又传到李嫂那儿，就把鼓停了。

大伙拍手笑着说：“李嫂唱个歌吧。”

李嫂指着小姚说：“这个孩子顶坏了，你怎么偏到我这就停呢？”

小姚早笑得直不起腰来，两手拱着李嫂的膀子叫李嫂唱歌。

李嫂说：“我可唱不好啊。”说完果真唱了起来，她唱的是：“社会主义好。”

聚餐散了之后，李嫂还不住地向大伙说：“今年可真过了个快乐年！”